

临沂城市名片

LINYICHENGSHIMINGPIAN

全国文明城市

东夷文化发祥地

战争年代华东暨山东解放区首府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

中国市场名城

中国地热城

中国书法名城

国家园林城市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图例

-  省、自治区、直辖市界
-  县(市、区)界
-  乡、镇(街道办事处)界
-  铁路
-  高速公路及编号
-  国道及编号
-  省道及编号
-  县道及编号
-  设区市界
-  县(市、区)界



2014 · 05, 3

主 办：临沂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秦鸿伟 刘广阔
李洪彦 赵建民 王长利
赵宗远 王培栋 刘兆东
李凤军 刘耀华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钱 进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伊永航 段 洪
于 芹 王卫东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贾 梦
孟玉玉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为国费苦心
——忆刘瑞龙 杨国选 04

【峥嵘岁月】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蛟龙汪军政大检阅 周之同 10

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怀念沂蒙红嫂——刘烈 艾鲁林 12

“利尖崮暴动”亲历记 张玉启 15

【名人素描】

追思薛亭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焦裕禄精神的重要指示所想到的 魏贤胜 17

忆我的父亲晚清翰林王景禧 王迺泗 20

【史海撷萃】

沂蒙匪事（下） 李存葆 26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33

【探索发现】

临沂钩沉之李全一家（下） 高 雷 39

【蒙山沂水】

祝邱（即邱）城与历史名人文姜、管辂 刘聚兴 43

【文化掇英】

梁元帝萧绎的变异人格 淮上湖畔 47

	临沂出土文物之水晶神兽	高 昂	49
【影像沂蒙】			
	解放战争时期沂蒙略影——		
	潍县战役：胜利日（下）	本 编	50
【诗画赏析】			
	从《王琳墓志》看“颜体”演变形成（下）	佚 名	52
【史料辑存】			
	抗战期间全国汇集山东根据地的干部名录（四）		56
【百家渊流】			
	姓氏百家漫谈——周姓（上）	赵丹峰	58
【沂蒙名医】			
	从医年代的记忆与遗忘		
	——沈兆波三、五事	惠东波	64
【文史论坛】			
	试论徐建寅与中国近代兵法		
	徐 泓 包正义	顾敏立	68
	临沂市旧志考述（下）	解修丽	74
【沂蒙乡亲】			
	中国“摩擦学金奖”第一人：薛群基	高雪萍	77
【史志动态】			80

封面：水晶神兽

（封面文物介绍见本期《水晶神兽》）

封底：明·傅国《登马鬃山》/胡石 书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为国费苦心

——忆刘瑞龙

杨国选

1921年，刘瑞龙转入南通城北高等小学读书，14岁考入通州师范。此间寄宿在他表哥葛松亭家中，表姐夫恽子强是恽代英的胞弟，中共党员。受恽子强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国民党在上海、武汉等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疯狂镇压，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的血雨腥风之秋，刘瑞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通州师范党支部书记，他组织顾民元、江上青（江泽民的养父）等革命青年开展学生运动，并吸收他们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

1929年，刘瑞龙任南通中心县委书记。11月，刘瑞龙和东海中心县委书记李超时去上海参加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省委专门召开常委会议，省委常委罗迈（李维汉）、李富春、陈云、廖慕群（何梦雄）、李硕勋（李鹏之父）和党中央代表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等，听取了李超时和刘瑞龙关于通海如泰地区工作和游击运动情况汇报。他们对通海如泰地区的情况，特别是确定在通海如泰地区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很感兴趣，当即决定调何坤、余乃诚、黄火青、张爱萍等一批骨干参与红十四军的创建。李超时和刘瑞龙根据会议的决定，当即在上海草拟了红十四军的编组计划。同年冬，红十四军军部组成，由何坤任军长，李超时任政治委员，薛竟衡任军参谋长，余乃诚任军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腹地带正式组建起一支工农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

1930年6月14日，红十四军面对驻黄桥的“剿共总指挥部”的“八路围剿”，在六甲桥西头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将敌先头部队一个连大部歼灭，敌军慌忙撤退。8月3日，红十四军在“苏北剿共总指挥部”所在地黄桥发动了总暴动，由于负责攻打南门的李吉庚和攻打东门李洽平已暗中降敌，关键时刻突然撤兵，把敌人引到红军后面，以致北门和西门的红军向纵深发展时，腹背受敌，伤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战斗。



刘瑞龙（1910.10—1999.12）

在国民党疯狂“清剿”下，红十四军被迫化整为零，分散进行艰苦的游击活动。

二

红十四军化整为零之后，刘瑞龙调入江苏省委，在陈云任书记的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担任副书记及省农委书记，并在李硕勋任书记的军委任委员。1932年秋，因为出现了叛徒，刘瑞龙不能继续留在上海，中央让他选择去苏联学习或者到东北工作。虽然他一直向往能到苏联学习，但想到灾难深重的祖国，毅然决定留在国内工作。当时红四方面军刚进入四川，急需干部，他被派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在中央交通员崔逢云的护送下，他化装成商人，多次与敌人巧妙周旋，历经千辛万苦，翻越悬崖绝壁上的栈道才到达陕西汉中。

到达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刘瑞龙先在红二十九军工作，不久任川陕省委委员、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又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时，由于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关押杀害了党的许多优秀干部，对于知识分子干部，更是打击迫害。刘瑞龙是“白腿子”（知识分子），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冒着极大的危险，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了不少同志。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了艰苦的长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红四方面军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走过草地。刘瑞龙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策骑攀北麓，晨雾冷阴浓。嘘气成冰滴，奋力登顶峰。政雾晴万里，红日浴絮云。万山回吟啸，举首揽太清。”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翻越金山遇到的艰难险阻，也抒发了一个革命者勇于战胜困难，对未来充满信心情怀。42年后，当刘瑞龙的小孙子出世时，他给孩子起了个名叫“草地”，以此来纪念那段永世难忘的历程。

1936年春天，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了四川北部的藏区甘孜。刘瑞龙利用工作间隙，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并亲自参加领导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为了更好地与少数民族群众沟通，他挤出时间学习藏语。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总结部队开展民族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刘瑞龙把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和做群众工作应注意的事项归纳起来，制定了《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简明易行的工作守则，推动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全军的贯彻执行。刘瑞龙十分注重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拜访了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向他表明了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经过多次友好交谈，彼此十分融洽，格达活佛认为刘瑞龙博学多识，值得信任，对刘瑞龙宣传的我党政策极为赞赏。在紧要关头，格达活佛带领白利寺的僧俗群众，征集了青稞134石，豌豆72石和许多骡马、牦牛来支援红军。

1936年10月，刘瑞龙奉命参加西路军西征。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西路军惨遭重创，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在与敌军的浴血奋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刘瑞龙也被国民党马步芳匪部关押在狱中。后经党中央驻兰州代表谢觉哉、王定国同志的营救，才和其他同志一起回到延安。

三

刘瑞龙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后，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与胡乔木、冯文斌等同志一起担任领导与教学工作，培养了大批抗日青年干部。1939年9月，他随刘少奇同志到河南确山竹沟镇。11月份到达了新四军第六支队所在地——豫皖苏边区涡阳县新兴集，在那里刘瑞龙担任了中共豫皖苏区区委副书记。

1940年，刘瑞龙调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1941年9月，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后，刘瑞龙又担任了行署主任。

在抗日战争时期，按照党中央的要求，根据地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地处淮北的新四军得到发展壮大。根据地政府发动和领导群众减租减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壮大了抗日力量。为了保证军民的物质供给，淮北区党委健全了政府的财政机构，积极发展经济，发行边币，稳定金融，和法币、伪币作斗争。区党委还提倡实行开源节流，严格财经审计，杜绝贪污浪费，边区政府被群众誉为“最廉洁的政府”。刘瑞龙曾经说：“那时，我和彭雪枫同志一个铜板也要掰成两半花。”

在这段时间里，刘瑞龙创作了一批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诗歌，著名的有《农民歌》、《革命三字经》、《阶级划分歌》等。这些诗歌传播苏维埃政府的公告，启发劳苦大众的革命觉悟，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地主豪绅残酷剥削农民的本质，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造就“世界平等”的新社会。

四



1944年刘瑞龙与夫人江彤在淮安

解放战争时期，刘瑞龙历任华中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豫皖苏分局财经办事处主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委等职务，在苏中、涟水、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和进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以及淮海、渡江、上海等重大战役中，直接指挥和组织后勤支前工作，为前方战斗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华中《新华日报》的战地记者徐熊同志风趣地说：“刘瑞龙这位战勤司令实际上是一位‘空军司令’，他手下只有一位秘书、两位警卫员、两位副手，他当时主要参与抓了三件大事：一是进行土地改革，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有力地支

援战争；二是把支前后勤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建立了支前后勤机构——北线战勤司令部和基层支前组织；三是有预见地协助华中分局、华中军区组织敌后武装，就地坚持斗争。”

1949年元月初，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前委的领导下，经过66天激战，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在战役中，就是这位“空军司令”直接组织和指挥了浩大而复杂的战勤与支前工作。在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中，要保证由数百万民工和民兵组成的支前队伍能够及时地把枪支弹药、后勤补给送到前线，把伤员转移到后方，必须建立一个自上而下、运转灵活的后勤指挥系统。刘瑞龙为此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虚心向广大干部群众请教，找到了战勤支前工作的关键所在，从而悟出了发动群众、指导工作的要诀。在

淮海战役和横渡长江两大战役中，刘瑞龙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后来电影《车轮滚滚》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民工支前的感人情景。

元月10日，刘瑞龙随粟裕代司令员驱车来到陈官庄战场。明亮的月光下，打扫战场的汽车车灯发射出耀眼的光芒，战士们忙着搬运战利品，一群群的俘虏被押出战场，三三两两的敌伤兵正等待我军收容，四处都洋溢着胜利的欢乐与喜悦。刘瑞龙立即写下了《庆淮海战役全胜》的诗篇，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激动不已的心情：“徐宿萧永大战场，自古兵家决兴亡。蒋贼陈兵六十万，妄图顽抗逞强梁。主客攻守时已变，解放军威势大张。百万军民齐协力，长围猛击力如钢。贼军饥寒日交窘，我军从容气昂扬。总攻聚歼同捣蒜，贼军技穷终败亡。一战全胜定江北，整装待发渡长江。”

1997年出版的《淮海战役支前后勤日记》中，刘瑞龙多角度、多层面、系统翔实地记录了整个淮海战役特别是渡江作战期间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张震同志曾高度评价了这部日记，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光辉历史的重要见证，其中所总结的战时后勤工作的经验，在今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

解放后，刘瑞龙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等职。1953年2月，调任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刘瑞龙这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62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

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后，刘瑞龙经常下乡蹲点，进行实地调查，认真总结农村工作的经验。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亲自参与并组织起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初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建设方案》（初稿）的工作。为了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他悉心钻研《威廉士土壤学》等专著，虚心向专家学习，向农民学习。刘瑞龙的诗集中，就有一首是总结老农秧田除稗经验的即兴之作。

1955年，毛泽东主席接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他提笔批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毛主席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刘瑞龙。

据专家调查统计，当时中国大约有22亿只麻雀。麻雀究竟是不是害鸟？为了慎重起见，刘瑞龙特地找到动物学家钱燕文。钱燕文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长期和动物打交道，在他看来，麻雀是吃植物种子的，植物种子多半不是粮食，况且麻雀还吃害虫。钱燕文没有系统研究过麻雀的食性，定夺22亿只生灵的生杀大权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思忖再三，提笔在报告下边写道：“我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在那个年代里，这份没有科学家定论的报告，最终也没有改变麻雀的命运。

刘瑞龙在参考古代和近代农业著作的基础上，旁征博引，撰写了《农业增产的八项措施》，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遭到残酷的迫害，在狱中他用捡来的烟盒当稿纸，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农业八字宪法浅说》一书的提纲。因此，刘瑞龙在农业界不仅是公认的有建树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基于刘瑞龙在农业专业技术方面的造诣，北京农业大学曾授予他名誉教授。

“文革”中，刘瑞龙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1967年11月，刘瑞龙被非法关押在上海监狱，直到1972年11月才释放，他整整五年的囚禁生活，身体受到严重地摧残，却没有摧毁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

他在《回忆我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情况》一文中写道：“五年中折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危害最大的是夏天用车轮战连续审讯的办法让我白天挨高温，夜里喂蚊子。有两年冬天到了11月份还不让家属送棉被，冻得腰都直不起来……他们用尽手段，可是没有结果，只好把我放出去，但在所谓‘解放’我的结论中捏造了许多不实之词，后来我在中



央组织部抄件中看到‘四人帮’控制下的审委所作的错误结论时大吃一惊。经申诉才得到新审委彻底平反。”

刘瑞龙在狱中重新通读了《资本论》等马列原著，同时也没有忘记他挚爱的农业事业，构思并详细列出了《农业八字宪法浅说》的写作提纲。没有纸，就利用放风的时间，从垃圾堆里捡来破烂的烟盒纸，他用芝麻大的小字，工工整整写下了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和诗词。在《刘瑞龙诗稿》中，有十五首诗词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

六

粉碎“四人帮”后，刘瑞龙重获解放。他用诗欢呼“清除四害，大快人心”，颂扬“周邓度艰危，为国费苦心”，歌颂“四五运动起，十月换乾坤，千钧摧枯朽，‘三全’始复春”。刘瑞龙重新回到农业部工作，当选为五届政协常委和六届人大常委，以饱满的热情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作为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农林口整党工作指导小组组长，他高度负责，一丝不苟，旗帜鲜明，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刘瑞龙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关注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商品经济以及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等问题，向中央和全国人大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他亲身体会到党的改革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他欣喜地赋诗：“神州风光好，江海喜奔腾。四化责任重，战绩日日新”。

自1984年起，已是古稀之年的刘瑞龙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他对这两部大百科全书编纂方案、总体设计、内容规划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组织专家、解决经费困难等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历时16年，编撰人员达到6200多人，汇集了全国一流的学科带头人和专家学者，包括农业经济、农业历史、生物学、农业气象等共25卷，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令人钦佩的是，作为总编委主任的刘瑞龙，不顾年迈多病，不仅为推进全书编撰作出了重大决策，而且事必躬亲，参加各种会议，作出具体部署，对全书的成功编纂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常常对他的子女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民，就是不了解中国。要把中国建设好，就必须发展农业，就必须做好农民的工作。”

1988年5月，78岁高龄的刘瑞龙到广州参加全国农史学会的会议。此前，刘瑞龙的心脏病已经十分严重，曾因心脏衰竭多次住院。了解他病情的同志，劝他不要到外地去，但刘瑞龙坚持要去，谁也拗不过他。到广州后，刘瑞龙没有住进本已安排好的高级宾馆，坚持要和会议代表们一起住在郊区华南农学院招待所。他不顾天气炎热，坚持参加会议的全部活动，认真听取与会代表的发言，还按照老习惯，认真地做笔记。会议快结束时，刘瑞龙抽出时间与从事农业专业的年轻学者们座谈，鼓励他们要献身祖国的农业事业，还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的撰稿人交换意见。5月24日，他亲笔修改会议的总结报告，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多钟。这种连年轻人也难以承受的工作负荷，终于引起了心脏病严重发作，由于病情危急，刘瑞龙被送到附近的大学附属医院抢救。5月25日晚上7点钟，刘瑞龙终因抢救无效，不幸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他眷恋的大地。

七

刘瑞龙一生艰苦朴素，克己克家，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他最反感的事，莫过于请客送礼、吃吃喝喝。不论什么人送礼，他都是一概谢绝。“文革”前，刘瑞龙在华东局农办



刘延东参观父亲刘瑞龙纪念馆

工作时，一次去苏州视察，苏州地委的同志托司机送他一盒百合。他知道后发了脾气，对司机说：“怎么拿来的怎么退回去！”司机只好将百合送回了苏州。

刘瑞龙一向公私分明，公家的东西分文不沾，公家给他配备的专车，家里人是不能使用的。夫人也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身患严重的肺心病，但每次去看病，都是转乘好几路公共汽车到医院。像这样“不近人情”的事例的确太多了，以至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里人也都习惯成自然，都自觉地遵守他为大家立下的规矩，有了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绝不利用他的地位和威信办私事。

刘瑞龙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小时候，碗里的米粒没有吃干净，他就教育他们一定要爱惜农民千辛万苦种出来的粮食。延淮、延东当年独自在北京上高中，家里每月只给20元钱，其中包括寒暑假回上海的路费。那时家里人口多，经济负担重，但刘瑞龙总要省下钱接济生活困难的烈士亲属。刘瑞龙还将朱文英烈士的母亲姚老太太接来生活在一起，孩子们都尊称她“婆婆”。1961年，刘瑞龙调到华东局农办工作，婆婆也随到上海。刘瑞龙对婆婆就像儿子对待母亲，下班回家后，只要有时间总要陪婆婆下一会儿五子棋，让婆婆高兴高兴。“文革”中，造反派强迫婆婆揭发刘瑞龙的“问题”，年近九旬的婆婆就装耳聋，说：“你们说什么？我听不见。”20世纪60年代，一位烈士的女儿到上海治病，生活无着落找到了他家。刘瑞龙跟夫人商量，腾出一间房让她住，还为她提供生活费用。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受到冲击被关押时，她才离开。刘瑞龙说：“他们的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活着的人，就一定要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来看待。想想死去的战友，我们生活艰苦一点又有什么呢。”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蛟龙汪军政大检阅

周之同

这几张照片是我在1941年八九月间得到的，它真实记录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历史上的第一次军政大检阅。在我的记忆里，拍摄者是苏静、郭士保同志。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于1941年的6月28日进驻山东滨海地区蛟龙汪（今临沭县），8月1日为纪念建军14周年举行了一次军政大检阅。

8月1日拂晓，第一一五师召开大会纪念建军14周年并进行阅兵。大会主席团成员有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萧华，有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还有山东参议会、战工会和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代表李澄之等人。会议由萧华主持。当雄壮的八路军军歌演奏后，全场肃穆，向建军14年来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解放光荣殉难的先烈们致哀。朱瑞、黎玉、李澄之等先后致辞，最后由陈光代师长致答词。随后进行了阅兵。受阅的部队有师机关、教导大队、特务营、通信营，教导二旅三个团的各一个营，共三四千人。

我当时任师司令部五科队列股股长，参与草拟受阅部队的序列工作。

这次大检阅还进行了军事体育竞赛。项目有：赛跑、投弹、实弹射击、刺杀、跨越障碍、单杠、双杠。

我是组织竞赛的成员之一。军政大检阅之前检查竞赛设施，我在测试超越障碍项目中通过架在壕沟上的木棒时，因木棒被雨水淋湿滑倒，胸部受伤咯血。大家随即动手培土加固，保证了这项竞赛的安全进行。

作者简介

周之同，山东沂南人。1937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顾问。





会后，大家参观了“八一展览会”。

走进写着红色大字的“八一展览会”的大门，便看见墙上贴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院中央耸立着高大的纪念墙（是在一个七层砖砌的烟囱的基础上改造的），每层写着一个大红字，组成“中国共产党万岁”，象征着有充足的改变世界的创造力。

展览会布置有10个具有丰富的政治性、战斗性、创造性和教育意义的展览室。

第一展览室是军事教育训练展览室，陈列百余种军事教材和教育图表、兵器模型。我在这个展览室做过解说。第二展览室展出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图表，反映一一五师自建军14年来的重要战役经过的历史。第三展览室是供给展览室，陈列着自己染织的布匹，自制鞋袜、服装、子弹、手榴弹等。第四展览室是卫生展览室，迎面墙上挂着国际友人白求恩大夫的画像，陈列着30多种自制的药品和图表。第三、四展览室显示了自力更生粉碎敌人封锁的巨大力量。第五展览室是教育展览室，一进门就能看到干部教育的辉煌总结。其中有原教导大队长李梓斌、教二旅副旅长张仁初等学文化的情况。有近千种的干部和战士的政治、文化教材等。第六展览室是民运工作展览室，也有许多有意义的图表、教材等。第七展览室是敌军工作展览室，特别有创造性，令人有新奇的感觉。八座表现敌寇内部困难的雕塑都很精细、生动、逼真。还有原苏联军队打退日军进攻，在张鼓峰战斗中用飞机散发给日本士兵的宣传品、日本反战小说等。第八、九展览室是宣传展览室，有用诗和画配合的“铁流两万五千里”巨作，是八路军14年来斗争史的缩影，是血和生命的结晶。还有10多件红军时代的文件和照片，以及11年间出版的《战士报》，陈列着宣传教材、图表、木刻、绘画作品、剧本等。还有红军时期的歌曲、剧本等。第十展览室是战利品展览室。这里有平型关、梁山、陆房、白彦等战斗的缴获品，有迫击炮、九二步兵炮、机关枪、高射机关枪、掷弹筒和各式各样兵器与军用品，表明以敌人的装备武装我们自己。

展览会充溢着政治性、创造性、战斗性。在留言簿上，赞扬的话写得满满的，其中李澄之写道：“在这个展览会中，表现了时间和空间的伟大革命与创造的奇迹，有革命的重要意义。”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看着这些泛黄的照片，依旧能感受到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部队宣传思想工作为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的促进作用。

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

——怀念沂蒙红嫂——刘烈

艾鲁林

我叫艾鲁林（临），1940年出生在山东临沂。我的父母都是陕北人，1939年随山东纵队从延安到山东开辟革命根据地。我妈妈叫刘锦如，我还有一个娘叫刘烈，妈妈在战争年代生下了我，而娘在艰苦的岁月里抚养了我和我的弟弟们。她就是人们熟悉的抗战时期的老地下交通员“沂蒙母亲”王换于（于大娘）的外甥女。

娘是山东省沂南县马牧池乡东波池村人，生于1905年6月19日。她的个子挺高，有着山东人特有的豪爽性格，淳朴善良，裹着一双小脚。她19岁嫁到沂南县依汶乡王家，原本有一个平静美满的家庭。但在1939年日本鬼子的一次大扫荡中，他们全家正坐在屋里吃饭，突然一颗炸弹落在了她家的茅草屋上，把她的两个孩子、丈夫、公公、婆婆全都炸死了，只剩下了遍体鳞伤的她。她因背对着门口被爆炸的气浪掀出了门外，侥幸活了下来，左手只残留着两根断指。她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了仇恨，孤身一人回到娘家后，由于受到王换于的影响和教育，经常帮助于大娘做一些抗日工作。她曾协助看护了于大娘救治的大众日报社的白铁华同志，自称刘烈为大姐，解放后白铁华只要到北京就一定会去看望她。娘兄弟姐妹四人都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大弟弟刘章厚1939年入党，1940年入伍，是甲等甲级残疾军人；二弟刘来厚1941年入党，抗战时他在大众日报社，解放后在山东省粮食厅工作；妹妹刘桂兰1938年入党，几十年里一直是乡、镇的妇女干部。他们家可以称得上是革命之家，也是于大娘抗战时期最可靠的堡垒户。

1941年，我妈妈担任山东省妇救会（妇联的前身）组织部长，每天都要到各村做发动妇女支援前线的工作，不能把我留在身边。经于大娘介绍，把我送到了刘烈的娘家，于是刘烈就成了我的娘。从看我那天起，这位“沂蒙红嫂”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跟着部队离开了家乡，踏上了漫漫而艰苦的革命之路。

我娘干了一辈子保育工作，抗战时期曾在山东分局托儿所、山东省立托儿所工作，看过的孩子不计其数。抗战时期的托儿所与现在的大不相同，组织很简单，只要时局比较稳定，每行军到一个地方，各家的保姆就带着各家的孩子凑到一起，就组成了一个临时托儿所。遇有紧急情况，各家带着孩子回各家，托儿所也就解散了。经常有的领导的孩子



刘烈



山东分局托儿所
的孩子们

一时找不到保姆，就临时送到我娘这看着。如罗荣桓的女儿罗南霞、萧华的女儿肖雨，我娘都曾给看过。要是遇到情况特别紧急，来不及疏散时，就由托儿所的叔叔、阿姨背着小的、领着大的“跑鬼子”。每当这时我娘也跟其他人一样，背着孩子一跑就是几十里。有时当走在前面的人休息完又要出发了，我娘才好不容易赶上来，她根本不能休息，只能背着孩子继续往前走。她一双小脚要比常人多付出许多，尤其到了冬天，就更艰难了。可她从来不叫苦，到了宿营地她又忙着做饭、烧水，给孩子和同志们洗脚。凡是和她相处过的人，都受到过她的关心和帮助，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为“热心大嫂”。

父母在世的时候，经常教育我们不要忘记老解放区的人民，是她们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我们，如果没有她们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我和我的四个弟弟：鲁沂（在沂水生的）、鲁滨（在滨海生的）、鲁生（鬼子扫荡时在逃难的路上生的）、鲁群（1945年在庆祝抗战胜利的群英大会上生的），都是她看大的，我们都亲切地叫她娘。我们始终牢记这一点，和娘一直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甚至有时连我妈妈都有些嫉妒了。

解放后，娘随我们来到了北京。我和弟弟们陆续上学了，都在学校住宿，组织上就把娘安排到机关托儿所做保育员工作。先是在财政部托儿所，后又调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托儿所，一直干到退休（后改为离休）。她把所看的孩子都看成是革命后代，她虽然没有文化、不识字，但她用那大公无私，勤劳朴实，任劳任怨的实际行动，去影响、教育他们，



刘烈与白铁华

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他们。她从来没有想过要从革命中捞取什么，退休时她每月只有29.50元生活费，而且一拿就是30多年。她却感到十分满足，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整天乐呵呵的，逢人便说这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我才能过上幸福生活。因此，每到节假日或有重大活动的时候，她总是积极参加街道组织的活动，不顾自己已80多岁高龄，仍天天带着红袖标起早贪黑参加巡逻，认真维护首都的治安。她是用自己的朴素的感情和生命在保卫今天的幸福生活，为此曾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我娘自从看了我们之后，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抚养革命后代的工作，从没有想过自己再组织家庭。直到1954年，她都50岁了，经我妈和钱希均阿姨（毛泽民的前妻）介绍，才和她的勤务员王文兴叔叔结了婚。因为年龄大了不能再生育，所以一直没有自己亲



艾楚南、刘锦如（作者的父母）的五个子女为刘烈老人祝寿

生的孩子。但她却十分豁达，非常满足，常对别人说她比谁的孩子都多、都好，她感到很幸福。的确如此，她除了在托儿所看的孩子之外，经老同志、老熟人介绍和看大院的孩子就不下几十个。现在大学毕业的有20多人，还有十几个人获得了高级职称或到国外留学、工作。她以一个母亲的博大胸怀，为革命养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

她特别善良，特别宽厚，特别热情。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她仍然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助人为乐的传统。无论是谁有求于她，她都满口应承，也不管自己能不能或有没有能力去做，只要对方愿意，她都乐意帮忙。她的家可以给别人当仓库，存放别人搬家和动迁没地方放的东西；楼里双职工上班，孩子中午没地方吃饭，可以到她家来吃；各家的钥匙也都愿意往她家里放；还主动帮助别人到很远的奶站去取牛奶……。而这一切她从不要回报，有的人实在过意不去，过年过节给她送点东西表表心意，她也总像欠了人家，想方设法还给人家。她是解放前的老党员，90多岁时，仍不忘记参加组织生活会，总是按时交纳党费。她数十年如一日，依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老传统，生活非常简朴，家中除了一台14寸的彩色电视机外，几乎没有其他的现代化家用电器。有时我们劝她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可她总觉得已经很满足了，总说“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能到北京城来享清福吗？我一个大字不识的老妈妈谁还管我。”

2004年娘因病住进了医院，我匆忙从哈尔滨赶到北京，一直守候在她身边。12月30日，娘在十分安详平静中与世长辞了，享年99岁。她的一生是一个母亲既平凡又伟大的一生。她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她那平凡而高尚的品格和无限忠诚于党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相关链接：

艾鲁林 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黑龙江省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艾鲁沂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海军信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艾鲁滨 大连工学院毕业，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第三工程公司高级工程师。

艾鲁生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天津电子计算机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艾鲁群 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北方工业公司项目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 利 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毕业，现在加拿大科研电信（TELUS Communications Inc）任程序开发分析师。

“利尖崮暴动”亲历记

张玉启

1946年古历四月初七夜里，在费县城南约12华里处的利尖崮山上，发生了一起反革命暴动——“利尖崮暴动”。

暴动之前，我是费县城关原官庄村公安员，并参加区农救会工作。其任务就是斗地主、分田地、搞反霸斗争。

暴动之前的形势，正处于日本鬼子将要投降之际，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积极推进，抢占战略要点”。因此，蒋介石在抢夺胜利果实的同时，积极准备内战，因而国民党时常向我根据地派遣特务，同根据地的还乡团、被斗地富分子勾结，秘密串通在一起，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破坏我们革命的成果。“利尖崮暴动”就是其中一例。暴动分子成立了伪组织名称叫费县保安第一团。伪团长是张传印，张传印曾干过伪班长，是国民党部郭资明的部下，以做生意为名，进行反革命联络。当时听说张传印是在济南领的保安团的名册，他与俺村（费县城关官庄）地主陈五哨的儿子和侄子串通在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伙暴动分子主要的成员有：张传印的三弟浑名叫“张三”，陈五哨的大儿子陈保森和他的侄子陈保山、陈保瑞，富农分子



王金修、李凤和、赵元成、赵元亮等人。还有一个王学臣，曾是共产党员，也是暴动成员。敌人封他的官是营长，还有原来是民兵的郝石头、梁茂德、郝死鬼等。因此这些家伙对我们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我们的衣食住行他们也是比较清楚的。

四月初七这天，城关派出所干事夏中元在俺村召开了保卫麦收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开完后时间就不早了，我就没回家，就住在民兵队部。到了夜间十二点钟，以张传印为首的暴动分子就把俺村包围起来了。暴动成员有二三十人，带有二十多支枪，把我们七名干部先后逮捕了。这七名干部是：支部书记朱化清、自卫团长程玉桂、农会委员大老王、副农救会长闫廷勤、宣传委员崔玉存、农会成员相明法。那天夜里，陈保森、陈保瑞、王金修、李凤和等暴动分子首先冲进民兵队部，先用棍砸，后用大刀砍，当时我身上被这些家伙砍了五六处，接着又绑上弄到姚令芳和李付杰门口处，敌人想去逮朱化清同志，当时姚令芳是民兵队长，他手中有一支枪，这时朱化清想去找他要那支枪，对敌人进行反击，但没想到姚令芳投降叛变，并把枪交给了敌人。朱化清同志不但没找到枪对敌人进行反击，反而被敌人逮捕。天明之前敌人就把我们七人用绳子绑着来到利尖崮山顶上，关在一个破屋框子里，几个暴动分子看着我们。利尖崮山顶上北门竖着两杆“青天白日”大旗。当时暴动分子恶狠狠地对我们讲：“共产党完蛋啦，我们上来啦，你们活到头啦”。可我们在敌人面前没有一个向敌人屈服的。到了四月初八早上，县公安局知道反革命暴动后，当即决定以公安局为主力，又调了一部分民兵协助，向山上出发平息暴动，解救我们。十点钟左右，战斗打响了。公安局的同志带领民兵发起攻击的时候我还清楚。心里想：非把你们这些坏蛋打成肉丸。可是由于敌人占领山头居高临下，公安局攻了三次都没有攻上去。我记得向敌人发起第二次进攻的时候，虽然没攻上去，但敌人已人心慌慌，就象热锅上的蚂蚁，总觉得据点难保了。因此在第三次进攻时，暴徒就开始对我们下毒手了。开始砸我第一石头时我还看得见，后来我就被砸昏死过去了。事后听同志们讲，战斗在公安局长刘琦同志指挥下，打得英勇顽强，最后一举平息了利尖崮反革命暴动，逮捕了首恶分子。以后经过审讯逮捕的暴徒和调查，搞清了这伙反革命暴动分子的罪恶事实。这次暴动不是孤立的，是有计划、有预谋的，直接由国民党特务策划。暴动面涉及范围比较广，西到平邑县的天宝山一带，南边到苍山县的堂林、青山湖一带，东到探沂、尚庄、英家町一带，北与薛庄沙沟峪一带道会门有联系。这次暴动共有一百多人参加（其中也有受蒙蔽的群众）。

暴动分子的罪恶事实搞清楚以后，1946年3月间在俺村召开了几千人的大会，县长王林秋到会讲了话，会后枪毙了罪恶累累的张传申、陈保森、陈保瑞、王金修、王学堂等罪犯，以后又在费县城东河滩里枪毙了邢秀双、葛兴和、赵元成、齐效忠、陈三麻等十二人，彻底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其余的罪犯，根据罪恶大小和认罪态度分别作了处理。

事后听说，平息暴乱后，公安局的同志和民兵把我们从山上抬下来，朱化清同志伤势过重，于当天晚上就牺牲了。闫廷勤同志经抢救无效几天后也牺牲了。不久，程玉存、大老王因伤势过重，在蒙山部队医院（也就是现在的上冶镇兴国村处）牺牲了。我被敌人砸了十几处伤痕，至今头部还留有多处伤痕，其他几个同志都是敌人用石头砸的头部。我们七人就剩下我和相明法同志。



追思薛亭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焦裕禄精神的重要指示所想到的

魏贤胜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17日他来到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禄同志事迹教育成长起来的，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5年前我到兰考参观了焦裕禄同志事迹展。今天来再次深受感动，引起心灵的共鸣。焦裕禄同志是县委书记的榜样，也是全党的榜样。他虽然离开我们50年了，但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他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在听取兰考县汇报会上，他回忆24年前曾填词追思焦裕禄。他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读了《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填写的念奴娇词。

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上述这段话内容和这首词以后，我想到，2013年11月25日，他来临沂视察时饱含深情所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一来到这里就想到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我们通过习近平总书记这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指示，也很自然地追忆起在沂蒙精神哺育下和焦裕禄精神激励下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涌现出来的成千上万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而原中共临沂地委书记薛亭就是其中一员。

薛亭同志是山东莱芜人，1924年出生，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滨海银行发行科科长，临沭县委、莒南县委组织部干事，区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副书记、书记，临沂地委副书记兼郯城县委书记，临沂地委书记，山东省水利局局长等职。1979年7月21日不幸逝世，终年55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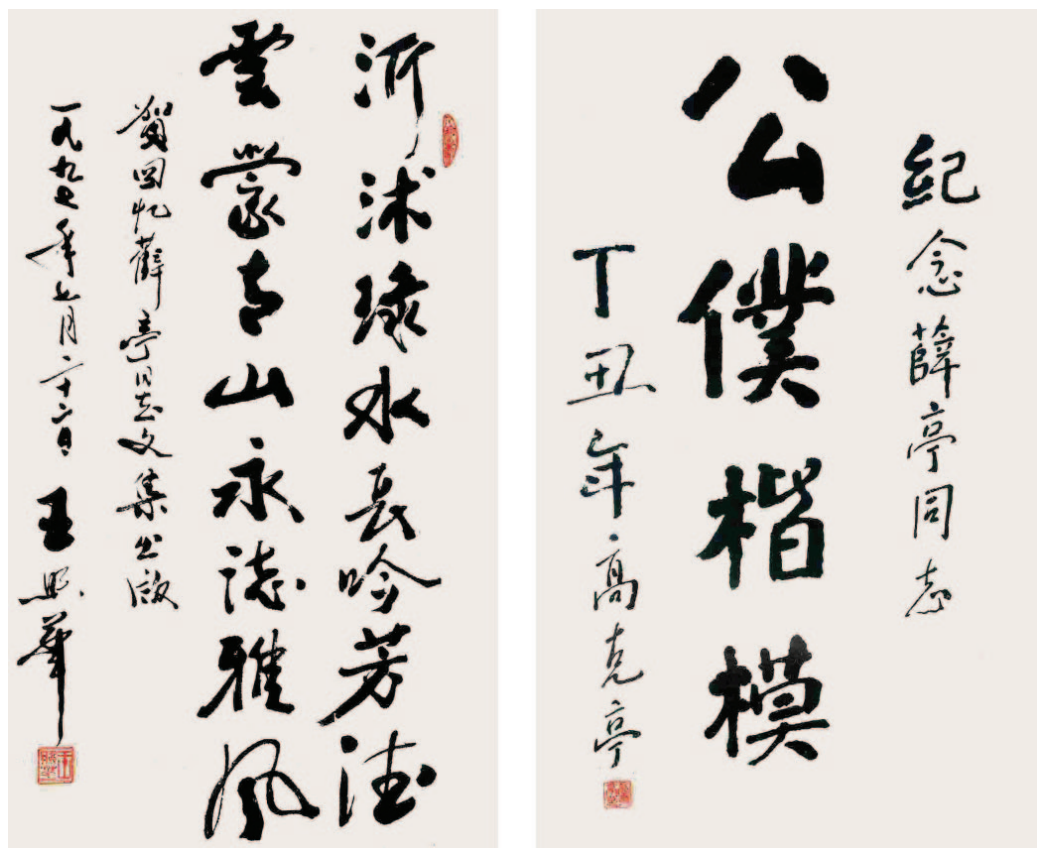
薛亭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

了党和人民。他在40多年的工作中，为临沂地区的解放事业和经济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1年10月至1956年10月，他担任莒南县委副书记、书记期间，他和县委“一班人”发扬革命老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搞试点，树样板，全县先后涌现出的一大批先进单位中，厉家寨、王家坊前、高家柳沟三个先进典型荣获了毛泽东主席的批示。1959年2月，薛亭同志任临沂地委书记处书记，1960年初主持地委工作，1963年任地委书记。这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和地委“一班人”带领干部群众迎难而上，埋头苦干。为了迅速恢复、发展生产，薛亭同志带领全区干部群众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掀起了大规模的治山治水、改变穷山恶水面貌的高潮。经过几年鏖战，建成大中型水库30多座，小型水库1000多座，并在沂沭河上修建拦河坝、开挖引河灌溉工程和田间排灌配套工程。1964年全区有效灌溉面积达291万亩，整修水平梯田320万亩，筑台田、条田190万亩，改种稻田120万亩，治理山头3500个，封山造林300多万亩，使全区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农业生产逐年增长。1964年全区粮食总产量达到41.6亿斤，比1963年增产51%，棉花总产量增长25.8%，支援惠民、德州、聊城灾区，接受安置了聊城、惠民灾民5.2万余人，大牲畜1.5万多头来临沂度荒。临沂地区成为当时全省产粮大户和外调粮食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外地灾民最多的地区之一。

对临沂地区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当时《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大众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评论、报道文章、照片等，赞誉临沂地区的人民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愚公。”中共山东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干部群众学习临沂地区愚公移山、改变自然面貌的经验。国家农业部和山东省委、省人委分别授予临沂地区“农业先进地区”荣誉称号，并将临沂地区的辉煌业绩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展览。1964、1965两年来，从中央到全国各地，从地方到部队的领导人和各界人士，来临沂参观的络绎不绝。在一片赞扬声中，薛亭同志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展览和介绍全区事迹时，坚持强调宣传党委集体领导，强调宣传基层干部群众，不准宣传地、县领导人个人，更不要宣传自己，整个展览的照片竟找不着他一个镜头。

薛亭同志不仅为改变临沂地区穷山恶水面貌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作为党委的一把手，在搞好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心各条战线上的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在带头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长期蹲点总结经验，在保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都起到模范带头和表率作用。他一年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从不事先告知要去的单位，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和大家一起到食堂或招待所就餐，从不要单位领导人陪同，更不要烟酒茶果招待，临走前总要结算饭账，交足粮票、菜金，从不欠下边的伙食账，更不借故到下边吃请、受礼。在农村，他有老党员、老干部固定联系户，在机关、单位，农业技术员、水利技术员、教师、医生、演员、作家、工商业者都把他当作知心朋友。他家乡弟兄们多、亲戚多，但他从没利用职权安排一人。他对子女管教很严，不准他们有特殊感，不准用公车办私事，不准托人要求上好学校、选好专业，毕业后，不准找人安排好工作，坚决服从统一分配。由于薛亭同志清正廉洁，严于律己，正直善良，胸怀宽阔，表里如一，宽以待人，磊落大度，受到了干部群众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淡中”。1999年4月，在薛亭同志逝世20周年之后，岁月的流逝并没有冲淡临沂人民对薛亭同志的怀念和爱戴之情，在众多革命前辈和干部群众的热心关怀、支持、参与下，由谭启龙、王照华、谢华、葛洪升、王众音、周星夫、朱永顺担任顾问，由于湘、张清波、刘兴武、李福崇、张洪荣、于兴和、杨



宝玺、孙成顺担任编委会正副主任，由薛宁东、魏贤胜担任主编的《怀念薛亭》文集由齐鲁书社出版。在这部纪念文集中，上至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和省、市、县委主要领导工作的一些同志，下至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多达一百多人欣然命笔，抒发自己的胸臆，书写自己的感慨，倾吐自己的心声，题写赠言，撰写诗文，以寄托自己的怀念之情！

从《怀念薛亭》文集的饱含深情的一幅幅题词、一篇篇文章、一首首诗词中，可以看到人们仍在追忆党和人民群众那种血肉相连的鱼水亲情，仍在呼唤那种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仍在怀念那一时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焦裕禄式的人民好公仆！

忆我的父亲晚清翰林王景禧

王迺泗



我的父亲王景禧，字燕泉，号石荪。他曾做过史官（翰林院编修和国史馆协修），人尊称他为“太史”，晚年也字号薊园旧史。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生于滋阳县（今兖州县）。我祖父王薪传，原籍费县，系同治丁卯科举人，做过河南襄城县知县。祖母牛氏系乾隆年间名进士牛空山先生玄孙女，通经史，重视教育子女。我父学业有成就，与她是有很大大关系的。

我是父亲的第三子，兄二人，姊四人，我最幼。现在他们都已去世。我是在父亲四十二岁时出生的。父亲生前的著述、书札、笔记等，在“文革”时期已大部毁失。所幸还存有烬余的一些断简残篇，从中可以搜寻到他生前的零星事迹，引起我不少的回忆。

一、青年时期

父亲自幼聪敏好学，15岁（清光绪八年，1882年）即中秀才，入沂州府郡庠。光绪十年（1884年）赴河南我祖父任所省亲，沿途遇名胜古迹，随行随记，赋诗志感，写了一本《游程纪略》（残本尚存）。当时其诗文已见功夫，深受士林的赞誉。友人旭为作序，文中称：“观其丰度，霁月光风，有潇洒出尘之致；玉树在侧，不觉自惭形秽，生相见恨晚之思。”赞其诗文：“七步才不让陈思，八叉手更推庭筠”。虽有过誉之嫌，但可想见

他少年时，诗文书法的基本功已臻佳境。该游记是从费县至开封，记了十六天的旅程。路经泗水、兖州、济宁及定陶等县。途中所见古迹、名胜，均记其历史典故及传说。该书有游记十余篇，诗四十余首，用行草书写。

那时父亲年方十七岁，是一位县官的“大少爷”，但却无纨绔子弟习气。他刻苦用功，随时随地追求学问。在这方面，他的子孙——我和我的子女，同他相比，可说是“问心有愧”了。

他科举一帆风顺。光绪十四年（1888年）考中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中恩科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年）朝考一等，授翰林院编修。

翰林院编修是个闲职。过去科举取士，秀才、举人、进士都是学位名称。翰林院编修就是职位名称了。翰林院实际是个储才备用机构，没有固定业务，不须天天上班，有时召去抄写点文书。只要不离开京城，随时听候召唤就行。从他在光绪二十二年写的《省斋日记》中，就可以看出这些情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得到了学习机会，研究了金石文字，读了不少书籍，还学会了照相，而且结识了不少知名人士。

他授编修后的次年，我祖母去世，丁忧回原籍，守墓三年（清朝制度，父母丧，给假回籍，称为“守制”），期满后，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返回北京销假。

听长辈人谈，当时京中学部的官员，多喜欢罗致翰林这类人物在他们门下，备作顾问，以增加自己的声望。从日记中看出，父亲那时被罗致在国子监祭酒盛伯羲的门下，经常被召进谈古论今。我父亲每月只有八两银子的薪俸，是带不起家眷、安不起家的，吃住都在丁级臣翰林家。盛和丁都是有名的金石收藏家，父亲得以看到他们的藏品，进行研究，后写成一部《金石释文》（稿已丢失）。兹摘录日记中有关金、石、书、画等的记载。

《省斋日记》甲申年（1884年）第一册中写道：

一月三十日，晨雨，旋作雪珠，午后大雪。午间同芾臣观所藏《吉金全形拓本》巨帙，灯后始毕，约二百余器。

三月初六日，早仍阴，晚霁。晨读《两般秋雨》一卷。午后偕绂丈（系指金石收藏家丁级臣翰林）至厂肆访古铜，无所得。阅伯羲师得秦印一，汗砖一，约数十字，亦巨观也。回寓已上灯，饭后清谈无事，翻《恒轩吉金录》、《金石存》各一册。

三月初八日，阴。晨起，林木清润，竹石葱郁，朝烟渐散，花气袭人。读《两般秋雨》一卷，阅《诵菜书屋会课》。食际，王琴生孝廉来谈。午后，吕廷辅医来，陪至内室。邵择叟来。晚拓“白田敦加卣”共六张。加卣廓外花纹左右皆有字作“”，不类文饰，疑古人制器纪识之字。遍阅昔人藏器皆无此识，惟吴平斋两罍轩所藏“京黑卣”有之，其文仍作两出，亦未释其所以然。余则绝未见也。

三月十二日，晴，有风。晨读《调燮类编》卷余。午见厂贾携来《金石屑》一本，是近人所刻，而刻手尚好。随意翻格致新书数卷。晒迪庵、琴生像片并绂丈自晒者八片，洗出尚有可观。晚学切粘各事。

三月二十二日，早晴，午后阴霾，晚东南风。晨读《金石录补》，是纯学欧阳笔墨者。午见厂贾携来“虢季子盘”拓本，索值太昂，窘无以易，且亦不值许多也。又晒自照像。晚看赵子昂画马，有鲜于伯机、沈石田、文寿承等题跋，精妙。同观者绂臣贤梁孟、迪庵、宾阳。又观黄灵山樵山水卷子，贗品也。绂丈新得高宗时仿“澄心堂”纸，皆当时画苑名手描金画出山水花卉，精妙绝伦。内有仿云林画法一幅，尤佳，皆用巨帙装成。昔贤谓“澄心堂”纸不敢作书，恐损纸。予于此纸



亦云然。

三月二十四日，晴暖。晨至意园，周览亭、馆、池、沼。三年别矣，殊有恋恋故人意。至西平台，与陆荒斋手谈（即下围棋），为书条幅。午见盛伯羲师，即留吃饭。以新获“散氏盘”拓本进质，以为极美。谈约时许，闻彰德新出“魏山体石经”，已为潍贾辇至黄县及都中出售。行当致书伊处地方官，密查访购，置之学宫为妙。又见单于和亲十二字砖，皆反文而篆法浑古，神似“嵩山三阙”字。午后至贵五桥师处，在病假中不见客，见师兄谈片刻。至云石同年处，园亭亦极优雅，为写摺扇二段。读东坡《教坊致语》，是词臣极无聊文字。

四月二十九日，晴。午后写吉金释文。读《捃古录》、《文勤彝器款识》。到幼丹侍御所，注《恒轩吉金录》。

五月初三日，晨晴。早诣盛师（盛伯羲）、翁师（翁同和）、汪师、廖师、徐师、麟师（丁麟年）、孙师（孙家鼐）、贵师（贵五桥）处拜节。

五月三十日，月内写钟鼎二种，《全形释文》告竣。约百余器。

从以上摘抄的几段日记中，可以看到我父在研究金石文字方面确曾下过一番功夫，并有这方面的著述；同时，也可了解到他当时接触交往的人物。

二、中年时期

父亲中年正处于国家动荡时代。清政府腐败无能，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订立了屈辱的《辛丑条约》。

“戊戌政变”，清廷内部“帝党”与“后党”斗争激烈。后来，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民国成立。这些，他都亲身经历了，并且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影响。清政府的屈辱求和，举国愤激，朝野有识之士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无不忧心忡忡。因此，新学书报一时风靡海内，我父亲也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新文化。回忆我幼年曾见到家中藏有《天演论》、《扬州十日记》、《盛世危言》、《新知报》、《强学报》、《时务报》，还有抄本《新学伪经考》、《日本政变考》等许多这方面的书报杂志。

我父亲赞成康有为变法维新的主张。他认为以皇帝为首变法维新是一条救国图强的捷径。在“戊戌变法”前两年，他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兼国史馆协修时，就同康有为有联系。我家过去存有康有为的书信数封（现已丢失）。民国三年，康还到兖州看望过我父亲，并住了几天，为我家的小园题“邁园”二字。上题“砚泉贤兄高蹈隐居之所”，下署“南海康有为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帝颁布了新命令，废科举、兴学堂。这时，我父亲被派任八旗官学教习（即教员）。不久，“变法”失败，恢复旧制，“教习”的差使也就随之结束了。次年他恐受到株连，躲了起来。其实他只是思想倾向维新，并没有见诸言论和行动，仅仅当了不长时间的官学教习，算不了“维新党”。再者，政变后，“北京形势混乱，顽固派畏惧各国借口护侨，调兵入京。谕称：‘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以示明慎用刑至意。得免屠杀。’”（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这也是他没受株连的原因之一。此后，他不被重用，调出京外到济宁主讲南池书院。这很可能是当权者认为像他这样年轻有学识的人，必然倾向维新，不宜留在京城。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清廷为了缓和舆论，又拾起了“戊戌变法”时被他们扼杀了的新政，也提出“废科举，办学堂，派游学”的口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父亲被调回北京，任直隶学校司总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任普通教育处兼编译局总办及官印局



邁園旧景

会办，当年还被派赴日本考察教育，并护送二十二名留学生入日本宏文学院学习。回国后，任直隶学务处参议兼直隶高等学堂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调任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及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监督。宣统元年（1909年）又兼任山东咨议局副局长，中央教育会会员及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等职。在这些年里，他致力于教育事业，以为办好教育可以挽救中国的危亡，是强国富民之道。他亲手拟定学校章程及各科课程，聘请品学兼优的教员，还约请美籍、日籍人士来校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他办学采用“学用结合”的方针，主张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他办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时，重视试验，每年出版一册《农场试验报告》。

兹将他在辛亥年（1911年）第六期《农场试验报告》上写的序言抄录于下：自庚戌报告书印行，忽忽光阴又一年矣。此一年度，国之主持农政者，何苦？士之研究农学者，何苦？社会之改良农业者，又何苦？环顾默察，如饥渴。即本场试验所得，堪以贡我农界者亦殊寥落。然则报告之设，影响殆鲜，区区一编，几等废纸，是亦不可以已乎？虽然，犹有说：博大精深、委屈繁重之学理、之事业，其不能一蹴几也，固也。即日用寻常之细，所谓小用则小效者，殆亦无微不信，不信弗从之原因在。夫既有此原因，而欲于数千百年积习相沿之会，俾之舍旧而谋新，原因每每涌起与人，殆非浅尝小试可能几矣。本场试验孤诣苦心，有屡试而屡验者，有屡试而始验者，有初试而未验者，具载编内。薪将以信而可徵者，备实业家之采择；而益望任提倡劝导之责者，急从事乎政策之扩张也。民国初基，建设方始，务本大计，首在于农。神洲沃壤，冠绝寰瀛，稍事改良，丰饶立致。邦人君子，或有取斯！

从上述序言中，可以看出，他对农业改良十分重视，而且是认真负责的。当他到日本考察，看到彼强我弱的事实，忧国忧民的心情非常沉重。这种心情散见于他的一些诗文中。所写诗集《瀛谈剩语》，是用讽刺、对比的笔法，大胆地揭露了在清政府统治下，社会上的腐败落后现象，并呼吁国民“速起直追，奋发图强”。兹摘录如下：

序言：“孔子曰：‘夫諫有三，吾取诸讽矣。’事有正言庄论、垂膺涕泣而道之，而听者或从而厌倦，且非笑之者矣。吾非敢誉外而自薄也。耳目之所触接，形

容之所对照，有不能终闭其言者。薪不倍乎婉而多讽之旨，聊以谈诤之辞，挥洒其热泪云尔。”

杂诗（录二首）

我爱东瀛地，图强果自强。有人皆教育，无处不胶庠。
会社新株式，衣冠半古装。交通尤利便，左右太平洋。

新诗三十首，吟罢雪盈颠。对照方知愧，庾词敢浪传。
精神真教育，关塞惨风烟。不敢闻鸡舞，恐将三岛翻。

忆否十首（录六首）

三千经弱水，倏已到吴淞。船主殷勤别，车夫拉杂迎。
见人皆作揖，对话忽如聋。忆否东游地，本乡伊势荣。

长春名客栈，襁被且勾留。室暗浑如夜，人贫悍似囚。
煤烟薰突突，厕味送悠悠。忆否东游地，雏鬟正上楼。

夙闻四马路，乘兴一相过。鸦片吞如象，雄煤倭似鲈。
卖书翻译少，摄影妓伶多。忆否东游地，人人爱国歌。

此间号开化，学校转荒唐。男服但如鬼，女装酷肖娼。
仰天唯一哭，大地更微茫。忆否东游地，雍雍共一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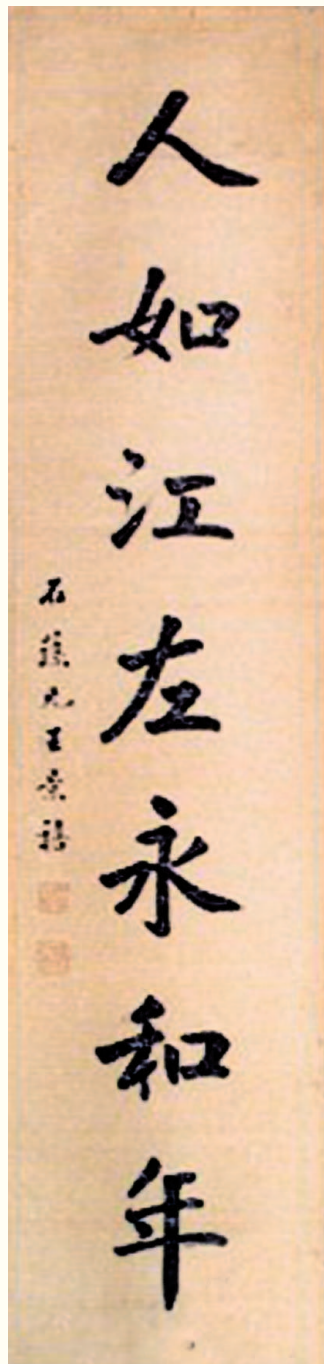
乡音忽入耳，望见我家山。贫情犹如此，文明尚渺然。
贪狼谁饲虎，驱爵孰为鸢。忆否东游地，人歌太古天。

同胞四万万，听我语无哗。学以实为贵，国之本在家。
富强唯教育，时代尚萌芽。不惜词多讽，挥戈日已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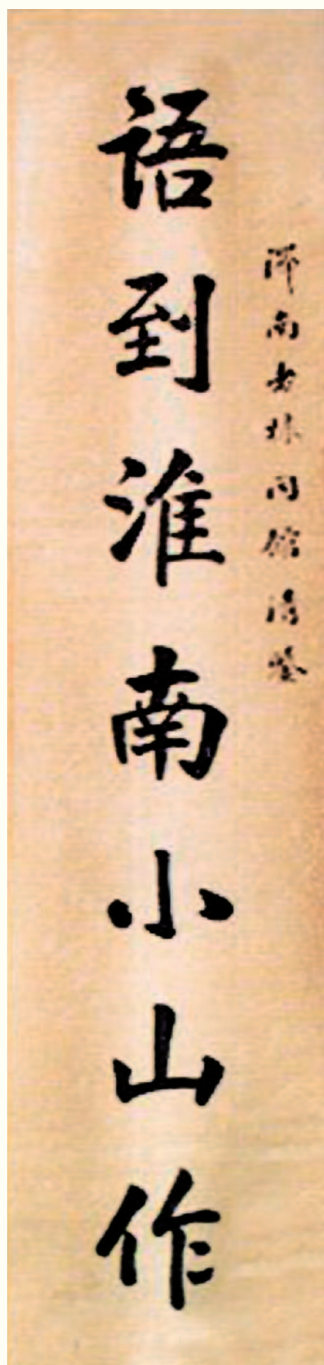
三、晚年时期

民国肇始，父亲仍主持山东优级师范及高等农业两校。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后，他离开学校回兖州闲居起来。是被罢免，还是托故辞职，原因不详。查《中国近代史》可知，袁世凯那时已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当上了大总统。当“戊戌变法”时，袁出卖维新党人，父亲对之是视若寇仇的。他的去职，很可能与袁的上台有关。至此，父亲就结束了他从事教育的生涯。他的“教育救国”的梦想也就随之破灭了，蜇居兖州家中，甘当一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逊青遗老。

我父亲对家务很少过问，田产也全靠母亲管理。父亲每天除看书写字外，就是养花育桑。我家在兖州的住宅原是我舅舅的。我舅舅姓张，是个坐吃山空的落魄子弟，无子女，房子就是他廉价卖给我家的。我家有田数十亩，是我母亲陪嫁的地。我们靠地租度日，虽不太富裕，但也可称小康。可是，那时军阀割据，各自为政，苛捐杂税繁多，搞得家中并不宽裕。我母亲是个省吃俭用很会持家的妇女。记得有一次，我父母发生争执，原因是父亲要买蜡烛晚上看书，母亲不同意。只听父亲高声说：“凭我这个人连点支蜡烛看书都不配



王景禧先生赠与孟繁骥之父孟庆棠的对联，内容为“语到淮南小山作，人如江左永和年”。孟繁骥是孟子七十四代孙，王景禧是其岳父。



吗？”他向来没对人发怒高声吆喝过，这次真的发火了。这说明他内心并不甘心蛰伏家园。

民国八年（1919年），徐世昌当了总统，靳云鹏为国务院总理，慕名邀我父亲到北京任国务院秘书长。当时，他欣然应聘前往，并写诗一首，用以言志抒情：

匀沧泉水怒涛声，浊世如斯忍独清。

但使出山能润物，何须泾渭太分明。

三年后，徐世昌下台，靳云鹏也随之下台。靳干过多年督军，很有钱，下野后，在天津英租界作了寓公，仍留我父亲当他的私人秘书，给他讲古籍，并教他的儿子读书，每月给薪资百元。父亲还曾习过医。那时租界里住着一些下野官僚、富翁等，他们很相信“儒医”，父亲给他们看病，也增加了不少收入。可在天津租界里居住花费是很大的，父亲靠本人脑力劳动换得的一点微薄收入，与达官、富翁相比，自然显得寒伧，交往应酬又免不了，每每苦于应付。所以，每遇经济拮据时，就产生感慨。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在灯下给人赶写寿屏，疲劳不堪。投笔长叹，吟了两句诗：“谁到砚田无恶岁，却怜心血有枯时。”有一年过春节，手头不宽裕，到街上买了一株梅花，回家后写了下面这样一首诗：

买醉曾无贳酒钱，老来何事不随缘。

岁除莫道荒寒甚，栽树梅花便过年。

他老年失意的悲观情绪，常表现于诗词中。在天津观“菊展”后，曾有诗志感：

江东罗隐旧知名，皂帽风神拟水清。

太息已无栽柳地，此间聊可着渊明。

生怜此日不须开，醉眼相看共举杯。

事事逊人一头地，九秋盛会忆蓬莱。

这两首七绝诗，前一首他自比陶渊明，叹息国内混乱，竟没有他安居“栽柳”之地。后一首想到他盛年在日本考察教育时，曾被邀请到皇宫观看菊花会，那时他风华正茂，抱负不凡，如今事事低人一头，大有今不胜昔之感。

他曾梦想过当个资本家。在天津时，曾集股办过炼盐制碱公司。可是，由于帝国主义资本的侵入，民族资本无法发展。后来因资金不足，靠借债周转，终于被债主利上滚利全部吞没，结果股本赔净，以失败告终。

他晚年仍对光绪帝惓惓不忘，在和朋友的谈话中，常常称赞光绪是个英明有为的皇帝，惋惜他的遭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于次年三月在长春扶持溥仪当“执政”。当时，卖国政客郑孝胥写信给我父亲，劝他离津去长春任职。他撕信大骂郑是无耻汉奸。不料，当年冬，他竟被急性心脏病夺取了生命，与世长辞了。

我父亲逝世后，灵柩运回兖州。费县族人要求运至原籍坟地安葬，我母亲则主张葬于兖州，因而发生争议，暂厝于兖州城内永安街宅后小园内。直到1955年我回家，才迁葬于兖州城西北七里铺。

我父亲的遗著有《金石释文》（此书手稿在日伪战乱时期丢失），《汉瓦当文字》，《瀛谈剩语》（石印本），《日游日记》（该日记在“文革”中已焚毁），《宫井词》—燕巢小草之一（铅印本），《省斋日记》，《适园诗录》等。其中《宫井词》一诗叙述八国联军入侵时珍妃被害事，曾在京津传诵一时。

沂蒙匪事 (下)

李存葆

五

解读沂蒙匪事，我们不能不把目光瞄向“人”的自身。

在人类社会，人的各种欲望的实现，既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更受法律与道德的框范。在社会动荡的年月里，由土匪构成的团体，无疑是一种极度扩张个人欲望的组织。人生常有两种悲剧：一是欲望难遂，二为欲望得遂。人一旦踏入匪的轨道，两种悲剧便会集于一身。欲望的种子播入土匪心灵的城堡，长出的必然是罪恶的野草。

土匪以劫钱掠财为业，绑架“肉票”是土匪获得钱财的惯用伎俩。一般说来，土匪绑架“肉票”有其选择性，然而在二十年代末，刘黑七匪部却阎王不嫌鬼瘦，采用的是拉大网的方式。黑七对于有大刀会员、敢于反抗的村镇，一律破围屠村，大开杀戒。对于束手就擒的屯落，先是把阖庄财物抢劫一空，然后再把村中男女老幼，统统解到“囚票点”。这种囚票点，刘匪部在沂蒙设有多处。

蒙山中有个秋子峪，是黑七手下一郭姓头目主掌的囚票点。我们仅从这个囚票点里，便可知“肉票”们身置虎吻后的九死一生。

1929年隆冬的一个深夜。郭姓头目率匪徒将费县西柴城村的二百多名老幼绑架到秋子峪。在囚票点寨门前的空地里，摆有几张桌子，匪徒们先逐个登记“肉票”的家产，凡报半亩、一亩、二亩地者，土匪认为没油水可榨，均当场击毙。中有一家境稍好的中学生见状灵机一动，谎称家有土地百亩，且在青岛、济南开有店铺。土匪闻听大喜，便将这中学生羁押于“阔票棚”。后面的“肉票”，为暂免一死，也纷纷或多或少的虚报了家产。匪徒根据“肉票”所报财产的多寡，分别囚于“阔票棚”、“穷票棚”。阔、穷票棚中的“肉票”，一律五花大绑，只给少许瓜干菜团和凉水维持生命。匪徒们狮子大张口，信天要价，这可苦了“肉票”的亲友，他们变卖家产，四处讨借，亦很难达到匪徒所索数目。对“穷票”，匪徒一般是榨干油水即击毙；对“阔票”，匪徒们采用的则是零刀削肉般的折磨，非让你倾家荡产、油尽灯枯不可。今天先割一只耳朵，送其亲友催赎；明天再剁一只



手，给其亲属下最后通牒。阔票棚里，整日哭天号地，鲜血淋漓……当时，秋子峪囚票点里，有两个“小肉票”，一是十岁的男童叫小捻，一是九岁的女孩叫小琴，他们的亲友砸锅卖铁，磕头作揖，求爷爷告奶奶，总算凑足了赎身钱。然而，小捻回家后，冻烂的下肢从膝关节处脱掉，成为终身残废；小琴那冻坏的双手，也从手关节处脱落。其母见状，泪水和面，包了加进砒霜的猪肉水饺，母女同食，双双而亡……

冥冥中，有一把最能衡度人与动物分野的界尺，她的名字叫良知。良知飘忽于天地之间，匿藏于肉身之内，人类对她最熟悉也常常将她遗忘。良知，是人的心匣中最为宝贵的珍珠。我们常从没有语言、没有意识的小猫小狗乃至刺猬的眼睛里，读到温和友善的目光，那简直是一首首柔情的诗。然而，刘黑七们竟这般对待“肉票”，土匪们在获得钱财时，早已完全摒弃了“良知”这个作为“人”的标识。

就这样，刘黑七从一个“掷石牧羊”的穷光蛋，一跃成为鼎铛玉石的暴发户。他用贪心金、狠心银、昧心钱、黑心财，不仅在济南、青岛、南京、上海购得公馆别墅，还在天津租界里买下洋楼华寓，就连在他的老家锅泉庄，他也耗费巨资修起一座五个大院构成的“八卦”庄园，石砌的围墙既高且宽，墙头之上可操兵跑马。金玉满堂的地主，驷马高车的官宦，很难与之比肩。一人成魔，鸡犬升天，贼母王大脚也行有轿，食有鱼，呼奴唤婢，俨然草头太后……

那年月，土匪一夜暴富，实为司空见惯。曾协同赵嬷嬷血洗八里巷的徐大鼻子，不过是个有着五六百人的中小匪首，可在1924年，当某团官军清剿他时，仅从其个人的窝赃点里，就搜出20多万块银洋，足足装了五大牛车……

在人类心灵的城堡里，有爱有恨，有善有恶，贮满各种情愫，“报复”即是其一。报复心理不一定是个人品行上的缺陷，实为人性中的通性之一。人在内心中很少不存有报复心理者，只不过有人直露于外，有人深藏于内，有人在这种心理闪过后很快消除，以德报怨，表现出一种豁达宽阔的胸襟。无法无天的土匪总是将报复心理化为血淋淋的行动。刘黑七们的“大破坏”、“大屠杀”是对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蔑视，已大大超出报复的范畴。土匪们为匪前，多有个人恩怨，一旦成匪，即行报复，他们常从这种报复中，寻找某种满足与刺激。

制造过临城劫车大案的孙美瑶，在抱犊崮一带为匪时，所架“肉票”，多为富户，对待“肉票”，也不像赵嬷嬷、刘黑七那般惨无人道。某日，一地主被从孙美瑶的囚票点里赎出，放行前，突有一匪持枪将其拦住，让其摇头给众匪看。这地主



孙美瑶（左一）

年过六旬，学小孩摇头未免难堪，见持枪匪满脸怒气，且刀逼胸口，又不敢不摇。地主将头摇摇，群匪捧腹大笑。但持枪匪对地主那货郎鼓般的摇头，不予认可，让其再摇。地主复摇后，又未通过。原来，这土匪与地主同住一村，十年前因岁不丰登，这土匪奉母命至地主家借粮，并主动提出春借两斗高粱，夏还二斗小麦。坐在太师椅上的地主听罢，双目微合，手握念珠，似轻风过耳。借粮童再三哀求，询问借还是不借，地主方将头似摇非摇的动了动。借粮童悻悻而归。地主的摇头状深嵌进他的记忆……此刻，持枪匪做了个地主当年摇头的样子，又逼地主再摇，地主连摇十余次，方获准下山。

蒙阴县那个世代忠厚、力大如牛的石增福，沦为土匪之后自然不会忘记仇人石二麻子。当年，因趁饭时怀揣两张煎饼哺育饥儿而被东家视为贼的羞辱，令他耿耿于怀。当上匪首重返蒙阴，他即把地主石二麻子绑架上山。石增福喝令土匪，用铁丝刺穿石二麻子的两只眼皮，再在眼皮上各挂一铜钱，遮其视线，石增福问看到的是啥，石二麻子答曰：“是钱。”石增福仰天大笑：“知道你就认钱，限你七天交足一万大洋！”石二麻子的家人变卖所有家产将人赎回，一户地主遂成为赤贫……

在人类社会中，有些团体和个人，即使天良丧尽也会大念其《圣经》。似乎只有土匪这种组织形式，才敢于把一个“恶”字，明目张胆地书写在自己的旗幡上。他们公开背叛伦常理念，贸然颠倒人生法则，常常用人性之恶，作为呼朋引类，凝聚团伙的粘合剂。

巨匪孙美瑶麾下，有一自成系统的匪帮。匪首名刘守庭，自幼卖馍馍，绰号“馍馍刘”。他驭匪的基准是：放纵匪徒人人把坏事作绝，个个公开行恶；惟有坏事作绝，才消放下屠刀之念；惟有公开行恶，才能引起民众公愤；有了公愤，匪徒们才会死心塌地，抱伙成团。馍馍刘帮中，“架票”、“催票”、“撕票”也与其他匪帮有所不同；架票时，七狼八虎一齐上，兔子要吃窝边草，越是百姓熟悉你的地方，越是让你充当马前卒；催票时割下的耳朵，剃下的手腕派匪徒轮班去传送，让你人人手上都沾血；撕票时，诱逗匪徒创新招，或刖或刖或磔或剿或骸，手段愈残忍愈有赏……

在行恶方面，馍馍刘常给属下做“示范”：1920年夏的一天，馍馍刘率匪攻破滕县山外民寨时，阵亡一匪。破寨后烧杀完毕，馍馍刘说：“这个兄弟跟我跑了这些年，还未成家就土了（死亡之意），我给他找个媳妇吧。”他在准备掳走的青年妇女中，亲自挑选了一位俊俏的处女，抓鸡般的活活的放入棺中，用粗钉牢牢将棺木钉死，与亡匪一起埋葬……

我还是要重点剖析一下惯匪刘黑七这个畸形的社会怪胎。刘匪杀人手段之残，聚集匪徒之多，活动范围之广，怙恶时间之长，可谓全国匪首之冠。当时，不少沂蒙百姓把黑七鬼化、妖化、魔化乃至神化。然而，只要剥去黑七的层层匪衣，一个涌动着无尽欲望的贪婪的恶魔形象，就会现形于世人面前。

黑七为匪时，在8个结拜的匪兄贼弟中，岁次第七，众匪让其执牛耳，是因其胆大泼天，枪法超群。那是黑七做羊倌时的一年，锅泉庄窜来十余土匪，土匪仅鸣三枪，村人皆吓跑，惟黑七藏于卧牛石旁，静观动静。土匪劫财离村时，一持枪匪徒后尾压阵，黑七从怀中掏出石块，以掷石击羊角百发百中的本事，对准几十步开外的那压阵持枪匪的后脑勺，嗖的掷去，打个脑浆迸裂。黑七纵身扑上，夺得“马连匣子快枪”一把。黑七率匪首次破坏时，他手持双枪，左右开弓，一枪一个，两个圩上守护人应声而倒。小鬼崇拜阎王，黑七先是以操枪的奇技淫巧，折服了众匪。

刘匪麾下之徒，成分淆乱，可谓鸦集兽聚。黑七为匪后半期，连国民党中失意的政客，士绅中的利欲之辈，也如蚁附膻，如蝇逐臭，甘居刘麾下为“高参”。黑



七目不识丁，胸无点墨，却将万匪之众玩于股掌，招之即来，挥手即去。他统匪诀窍是紧紧抓住了人性中的致命弱点。

凡为匪者，一是爱钱，二是贪色。黑七将钱当作拢匪的圈套，以色作为“美丽”的诱惑。

匪幡初举时，枪弹是土匪的命根。深谙枪杆子里面出钱财的黑七，尤为重枪。凡在抢劫中夺得枪弹者，除按黑市高价给以赏赍外，还让匪徒以枪入股，再次分赃时，便可分得人、枪双份。此举使匪徒夺枪时往往如鼠斗穴，施勇逞狠。每当铁杆匪徒家中有困难时，黑七总是施以银元，让铁杆更加铁心……

破圩劫村，刘匪部总能掳得大批青年妇女，黑七总是让匪徒们恣意淫乱。后来，刘匪部几度被军阀招安、被日寇收编，亦匪亦军，亦伪亦顽。黑七属下大头小脑，也都闹得了师、旅、团长的名份。黑七着人四处搜罗美色，不断给他们配备小妾侧室……

黑七为匪时间一长，也渐次摸准了军阀政客们欲望的脉搏：有的志在南面称孤，有的意图雄长一方，谁都想扩充自己的实力。黑七的万余人马，对谁也不能不是一个可以增重的砝码。此时的黑七，通过金钱铺路，早已买通各路诸侯中的要员赃吏，他们常常为黑七通风报信，黑七对各派系的明争暗斗，嫡庶亲疏，了然在胸。狡诈的黑七自然明白，他身率的是一支匪伍，早已播臭千里，不管哪派收编他，仅是一时借用，一旦成就大事，必会卸磨杀驴，过桥抽板。于是刘匪不管哪派哪系，凡给奶者，猛啖一口即窜。军阀割据的年代，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社会空隙。滑得不能再滑的黑七，瞅准了这缝隙，像巨蟒一样拿云播雾，钻游于半个中国……

有些口碑资料称，黑七其人坏归坏，恶归恶，但对其母王大脚却极尽孝道，常将母言当“圣旨”。1928年7月，刘黑七第三次大劫费县城，把商号店铺抢拿净光后，又大得一笔横财。这时，黑七派心腹用四人轿把王大脚从锅泉庄接来，并强令全城人出门迎接。黑七亲临轿前以示孝敬，见其母的大脚露在轿外，忙拉轿帘遮盖。王大脚掀帘下轿，当众斥骂黑七：“儿不嫌娘丑，狗不嫌家贫，我脚大给你丢人啦！实话告诉你，你能当上师长，就是我这双大脚带给你的福气！”黑七不顾体面威风，当众给母叩头作揖，诺诺认错。有些被黑七部所绑“肉票”的亲属，几经周转，求到王大脚门下，大脚也常令黑七放人……这就是人说的黑七孝母的依据。然黑七孝母的衣食均沾满百姓鲜血，多少慈母幼童残死在黑七屠刀之下。孽子为匪，母不以死相劝，早已枉为人母，黑七孝从何来？！

剥去黑七某些虚伪且带有欺骗性的匪衣，这个魔鬼的心旌上写的全是“恶”字。

较之韩复榘麾下那个“朝朝美酒，夜夜新郎”的色狼旅长李占标，刘黑七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采花大盗。李占标用搜刮的民膏，以每夜50块大洋的价码专寻民间处女“破瓜”，而黑七猎艳则全仗暴力。他把玩女人称作“换衣裳”。不管是流窜还是打仗，每到一处，黑七总是遣匪徒捉来仨俩女人陪宿，以发泄兽性，不管肥瘦妍媸，玩完即弃。黑七荡南扫北，所掠美女做妾充小者，多以地名冠之：在莒县，黑七巡街时见一卖大饼少女姿色出众，便遣匪抓来，称“莒县太太”；在热河慈县，他骑马撞见一已婚女子觉有塞外风味，便当即让匪擒来，称“慈县太太”；在胶东平度，匪徒们于驻地搜出一地主家庭出身的女中学生，黑七见其玉容花貌，便千方百计使其屈从，封为“平度太太”……天津租界的洋房，是黑七放荡形骸的淫窝，除多藏美姝丽媛外，还常从妓院里拉回路柳墙花。

衣冠禽兽的黑七，所蹂躏糟践的女子无计其数。这羊倌出身的匪梟，玩女人常常“土法上马”，变换花样。黑七为恣意取乐，有时竟让喽啰捉来几个肤白乳大的

青年妇女，凌逼她们将衣服剥得精光，再将铜铃铛系于她们的乳上，让她们擀面条给匪首吃。擀面杖在面桌上来回滚动，系在乳上的铃铛也随之叮当乱响，匪徒们淫笑不止。黑七称这叫吃“响铃面”……

1933年8月底，黑七率匪部流窜至察哈尔省南口的山峪里，被宋哲元的部队围困，眼看堵截峪口的兵马将至，黑七部面临全军覆没之灾。黑七急命众匪人人身上绑上干草秫秸，准备怀抱枪支从峪顶滚滑下山，夺路逃窜。见一切就绪，黑七召来旅、团长们，命令说：“坠脚东西统统甩掉，马匹要打死，老婆孩子一个也不留。”要女人不要命的匪徒们沉静有时，无一动手。黑七凶狠狠劝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窜到山东、河南，每人再给你弄个女学生，年轻漂亮的。”说罢，黑七先砰砰两枪将自己两个老婆打死，又命手枪队、机枪连一齐摆开杀势，噼里啪啦，一阵扫射，部中所有家眷、孩童及骡马，统统呜呼哀哉！

黑七率众匪滚滑山下，狼狈逃遁。南口山峪里，那刚刚被击毙的骡子的头还在轻轻地颤抖，那刚刚被枪杀的战马的腿还在痛苦地抽搐，那奄奄一息的女眷们的身上的弹孔里，还在涌流着殷红殷红的血，那尚存一丝二气的孩童们的细手嫩脚，还在微微地颤动……这惨景，这惨状，与刘黑七当年用活鸡蘸煤油点火破圩大屠村的惨烈，何其相似乃尔！不过，这次匪徒们的枪口，对准的是他们自己的妻妾和儿女。虎毒尚不食子，人恶如此，天道宁论！

……

六

良知，也如同深藏人体内的燧石，它迸发的火花，可随时燃亮人的心灵。当土匪们用罪恶之水将燧石之光全部浇熄后，心灵的枯井里便盛满了灰烬。尽管这些走肉行尸仍以及时行乐去打熬岁月，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死魂灵便在恐惧中日夜颤栗。他们心中自有一份罪恶的清单，他们应该知道生命的幕帘该怎样降落。

凶狠的土匪，实则神经极为脆弱。惯常，他们不敢使用正常人的语言，多用黑话。

土匪最怕暴露姓名：如姓杨的呼爬山子，姓黄的唤槐花子，姓郭的叫盖口子，姓于的呼顶浪子，姓马的唤高腿子，姓王的叫虎头子，姓孙的呼兔辈子，姓刘的唤顺水子，姓赵的叫走俏子……

土匪行恶，也多用贼语：如抢掠称“使钱去”，屠村谓“打旮旯”，烧房称“烧红窑”，绑票谓“请客去”，割耳称“送山风”，剜眼谓“取照子”，剁手称“拿耙齿”，割鼻谓“去闻香”，砍头称“凿母子”……所劫财物，土匪也自有称谓：牛叫“春子”，驴叫“条子”，马叫“高风子”，猪叫“黑毛子”，金叫“蛋黄子”，银叫“白雪子”……土匪自称“山马子”，谓官军是“花腰子”，呼“大刀会”是“槽肚子”……

土匪黑语几乎泛及各方各面：山叫“老硬子”，河叫“大横子”，阴天叫“上慢子”，下雨曰“摆浆子”，酒叫“火山子”，筷叫“对方子”，鞋叫“踩壳子”……

因“茶”与“查”、“饭”与“犯”同音，土匪最为忌讳。他们把吃饭称作“上传子”，喝茶叫作“上泉子”。土匪对“网”更是讳莫如深，若遇上网鸟、捕鱼者，他们认为是自投罗网，非将对方打死不可。有些特别迷信的土匪，遇见网后，常常三五日不敢出门……

人类社会制造的怪圈，永远圈不住正直的历史老人。历史老人用良知的丝线织



成的天网，终将沂蒙匪事中的大头小脑，一一擒获。

女匪赵嬷嬷用八千块大洋，从赃官李森那里买了条生路后，率两匪女及贴身的干儿潜逃威海，躲进一家小旅店里，准备乘船取道大连下关东。因盘缠不足，赵嬷嬷派一干儿秘回临沭县一个窝赃点里取银，被八里巷幸存的几位村民侦知，飞报当地驻军及省当局。赵嬷嬷及其匪女、干儿被临沂警备大队擒获归案。当赵嬷嬷及两匪女被押到临沂法场那天，临沂城里人山人海，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沂蒙百姓，莫不拍手称快。刀斧手手起刀落，匪婆匪女便身首异处。切齿愤盈的八里巷的幸存者，索回三颗人头，回村后用桐油炸成“炭球”，悬诸高杆，示众多日……

也曾欠下八里巷血债的徐大鼻子，自知罪不容诛，携爱妾“小白鹅”潜逃苏北，整日杯弓蛇影，惶惶如丧家之犬，遂吞金自尽。“小白鹅”被官军缉捕后，供出徐匪在郯城的窝赃点，20万块银元即被起获。当徐大鼻子的尸体被牛车拖着游乡示众时，那满当当的五大牛车银元，徐匪不仅不能带至阴间挥霍，反倒成了他渔夺乡里的血证……

制造“民国第一案”的巨匪孙美瑶，招安后所辖一旅人马驻扎在枣庄城外的某镇。孙部匪性难移，经常三五成群，溜进枣庄，声色犬马，寻欢滋事。是年秋日，孙的部属与驻枣庄的吴团在街上发生冲突，孙部的人被殴打败归，孙美瑶闻之大怒，即率手枪队蜂拥进城。孙手提盒子枪沿街叫骂，手枪队也剑拔弩张，一个个宛如市井无赖，把吴团团部包围。闹得当街商家打烊谢客，满城百姓关门闭户。新任兖州镇守使张某老谋深算，孙美瑶被招安后，张某将孙收为门生，表面上视孙为嫡系心腹，实则早感到招安孙部是开门揖盗，便暗存杀机。孙部与吴团发生抵牾后，张某一面急告吴团闭门不出，一面星速赶来枣庄，在下榻处设华宴对孙美瑶好言抚慰。并择一吉日，再开盛宴，特邀枣庄士绅军要相陪，为孙、吴两部调解。“鸿门宴”举行那天，枣庄中兴煤矿俱乐部里，悬灯结彩，人到熙熙，马到攘攘。当孙美瑶喜孜孜步入酒楼的第一道门时，孙的随从被侍者极为客气地请进酒楼一厢。孙美瑶在要员的陪同下兴冲冲进入二道门过堂，这时，潜伏在过堂内的两个便衣骤然向孙扑来，一便衣将手攥的白石灰向孙的双目一拍，孙顿成“瞎子”，这便衣就势将孙半按在地，另一便衣举起“鬼头刀”，噌地朝孙的脖颈砍去。孙还没反应过来，便脑袋搬家。这个被招安后仅过了四个月旅长瘾的一代匪梟，就这样匆匆奔上了“奈何桥”。

孙美瑶麾下那个“以恶治匪”的馍馍刘，闻凶讯化装潜逃至枣庄车站，被吴团的士兵查获，在滕县民众的强烈要求下，由官兵解到当年馍馍刘把一少女活活钉进棺材与亡匪同葬的村寨，将其就地正法。那花季少女的冤魂若九泉有知，当会涕泗滂沱……

曾血洗瞭阳固并把固顶当作屠场淫窝的悍匪李殿全，在官军、民团围固两个月后，水断粮绝，众匪被犁庭扫穴，一网罗尽。周围数十里内的百姓纷纷拥上瞭阳固顶，对李匪鞭尸三百，仍难消心头大恨，又将其尸泼油火焚，撒骨扬尘……

给“肉票”眼皮上串两个铜钱的匪首石增福，曾被鲁南民团招安。在当上营长，移防胶东后，身在官军仍行匪事，被逮捕枪决……

惯匪巨奸刘黑七的下场更为可悲。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黑七再次投日，被委以“皇协军前进总司令”，三度窜回山东，继续祸国殃民。刘匪先鲁北，而胶东，于1939年春又返回沂蒙。刘部协助日寇，合同各路伪顽，对我抗日根据地日骚扰夜扰，为鬼为蜮。我鲁南军区老三团、老五团，与刘匪黑七几经交战，黑七部损兵折将，大败亏输。黑七悬心吊胆，惶恐如惊弓之鸟。他找来五六个替身，扮作假黑七，以避不测。晚上睡觉，黑七有时宿在羊圈，有时眠于马厩，连随从也难知其

所在。1943年11月15日深夜，我老三团、老五团，对黑七部的穴巢柱子山发起攻击，经三小时激战，刘匪固守的明碉暗堡，全被摧毁，大围小圩，悉被攻破，匪兵贼马，折戟沉沙。清扫战场时，在黑七居住的小圩子内，我老三团主攻连的战士们仅在正房内擒得黑七小妾，打开东西两厢房，房内堆满铁箱，箱内全是金砖、金条、金元宝，惟独不见黑七踪影。原来，大围墙被炸塌时，黑七趁混乱带一副官一警卫从小圩子的围墙上坠绳而下。慌不择路时，副官被俘，警卫被毙，黑七只身踉跄逃窜。我潜伏在坟地等待打“出水”之敌的一战士，见一黑影短、胖、矮、粗，认定是黑七，便穷追不舍。一颗仇恨的子弹出膛，正中黑七头颅。这个横行半个中国长达二十九载，屠杀无辜百姓多达二十余万人的混世魔王，终于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因“黑七乃乌鱼精下凡，刀枪不入”之说，在沂蒙流传甚盛。初时，百姓皆不信黑七亡命。民兵只得抬其尸体，四乡示众。当百姓“验明尸身”后，不由想起黑七破圩屠村杀人如麻的那一桩桩一幕幕不堪回首的往事，藏怨衔恨的乡亲，愤难自持。人们有的拿剪子，有的握锥子，有的攥斧头，有的挥菜刀，恨不能将黑七碎尸万段……

几年后，乡亲们终于从山旮旯里搜出刘匪母王大脚，不由分说，便一阵乱棍将其打成肉饼。生下孽种且有纵子行恶之罪的王大脚，同其子黑七一样，受到了永恒的诅咒！

天地浮浮沉沉，春秋来来往往。过去了，那狗吠鸡跳的霜晨；过去了，那冤魂啾啾的寒夜；过去了，那村村白骨收于一坟的悲惨；过去了，那百里禾田无颗粒的凄凉；过去了，那灌满泪珠的沂河；过去了，那枯草汪血的蒙山……

对于昨天的世界，曾有人满足也曾有人淡漠过它的野蛮与荒疏；面对当今的时代，有人沉湎也有人追逐它文明里包裹着的自私和冷漠。既然，“人”的躯体内或多或少潜有“恶”的元素，那么，抑恶扬善，惜爱释怨，便永远是一部人类常读常新的大书。

善良的人们啊，请不要忘记：只有对历史的苦果进行痛苦的咀嚼，才能举起未来欢乐的杯盏。



刘黑七被
击毙处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破迷信智胜妖道 巧算卦瓦解伪军

日寇侵华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其特务更是无孔不入。它一面收买无耻的汉奸，同时还利用道会门及反动僧道，让他们散布谣言欺骗群众。新泰的天齐庙有一个道士自称是纯阳真人附身，胡说什么“东岳大帝显灵，红日当复兴，白日运尽，见机而作，荣华富贵”（红日指日本，白日指中国），一时间这庙中香火甚旺。

当地的抗日民主政府为了破除迷信，决定揭穿这道士的真相，于是就派张寿民带人先去调查。时值农历三月二十八，正是天齐庙的庙会。会上人山人海，张寿民一行好不容易才挤到庙内，只见一个身穿道袍的道士正装神弄鬼，操着一口东北口音胡说八道。找了个庙内的老道士一打听，才知道此人是最近云游挂单的道士。打听完毕走出庙门，只见从南面来了一骑马之人。马跑得甚快，路人皆向路边躲闪，忽然间此人从马上跌下，口吐鲜血，不醒人事。众人齐来围观，庙内道士亦前来救治。半个小时后此人苏醒，面向庙内长跪不起，口称有罪。别人问时方称：“奉主人命前来烧香，因怀疑东岳大帝的灵验，欲将经钱私吞，谁知刚有此念，即遭到了跌下马来报的报应。”众人皆信以为真：“东岳大帝显灵了！”调查组马上派人跟踪此人，发现他烧完香后向泰安方向奔去，便派人将他拦住。经过一番说服，此人说了实话。原来他是一个杂技演员，是庙内那个东北道士收买的他，让他作此表演，口吐的鲜血也是假的，他根本没受伤。抗日民主政府马上决定肃清日特，由公安部门到庙中将伪装成道士的日特抓捕，从其房间搜出日本电台一部和枪支子弹。人赃俱获，就在庙会中先让杂技演员现身说法，揭穿“东岳大帝显灵”的骗局，接着将日特进行了公审法办。从此广大群众认清了日本特务的阴险毒辣。

为了实现全民抗战，解放区军民进行了总动员，各阶层群众都投入了神圣的抗日战争。山东战工会更是做了详细的规划，其中有一条就是发动盲艺人参加抗战。这项任务十分艰巨，既要懂政策又要懂业务。经过一番筹备，在沂源县的东里店举办了盲艺人培训班，负责人就是张寿民先生。其内容除了政治课要讲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外还有业务课。一个是说书。这要教育艺人说些抵抗外侵的故事，像“杨家将”、“精忠说岳”，编好唱词教育艺人说唱。最难教的是教盲艺人算卦，通过算卦瓦解伪军。为此张寿民先生研读了《易经》，对六十四卦全部背熟，对于卦词既要给伪军指出出路，又不能

太露骨，如解放区在东方，就说向东去大吉，当伪军心神不定时，就指出一月内有血光之灾，只要更换地方就逢凶化吉。如有汉奸和鬼子有矛盾时，就说有小人暗算你，赶快离开可消灾星，如此等等，让盲艺人对伪军通过算卦来瓦解伪军。

而且让盲艺人到敌人据点去说书算卦，还能暗中刺探情报。由于敌伪对盲人是不警惕的。通过算卦掩护，他们很快摸清了据点的人员、武器情况。这些盲艺人为抗日救国做出了贡献，有的还立了功。其中有名的盲艺人侯洪康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郯城县人，善弹三弦说唱。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到处说书算卦，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滨海军区战士文工团，建国后被分配到临沂县文化馆负责曲艺工作，直至离休。

以上这段历史当时是保密的，现在可以公之于众了。

（以上内容由张寿民先生提供）

捉俘虏预知胜利 庆寿辰书家挥毫

1944年的秋天，从济南来了一批日军，在汉奸队的配合下向莱芜解放区扫荡。解放区军民早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首先主动撤出了部分村庄，诱敌人长驱直入，然后引至一个山区将敌人包围。四面山头枪声大作时，鬼子方知已被包围。这时八路军只围不打，等到天黑才发起进攻，杀得鬼子和汉奸鬼哭狼嚎。敌人千方百计想突围，但四面皆是铜墙铁壁，无法逃窜，敌人只好用无线电向济南的日军求救。时至夜半，果然来了一架敌机，在空中投了几枚照明弹，日伪军这才找了条路，逃走了部分残兵败将。八路军则乘胜追击，又消灭了不少日伪军。

参加反扫荡的民兵和地方机关及学校学生这时来打扫战场。张寿民先生则带领民兵收集日军丢下的武器，这时忽然发现草丛中有一日军尸体，只露着两只脚。民兵扯出后，他马上站立起来举起了双手，吓得浑身发抖，口中说着听不懂的日语。用灯笼照着一看，原来是一个少年日本兵。这时张寿民先生用手势告诉他不要害怕，八路军优待俘虏。押回驻地后，让他用铅笔在纸上写出名字。原来他叫川本，16岁，由于被围，已经一天未吃饭了。这时，给他送来面条，他当即表示感谢。吃完饭后，张寿民便和他“笔谈”，他用“平假”和“片假”写出了家中还有父母，他正在上初中就被征兵征来了，他还有一个



晚年的张寿民先生

哥，在东北战死了。他说他很想回家，希望不要杀他。后来将他交给八路军正规军队，后他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表现很好。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同其他日本战俘一同住在临沂城，后来被遣送回国。这就是张寿民活捉日本兵的故事。

1941年春天还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随政府转移各地的抗日老人范铭枢，75岁大寿，解放区民主政府曾给爱国人士万春圃庆过寿辰，于是大家皆主张也给范老祝寿。1月27日，当时省委机关和部队皆驻在沂水的王庄，于是寿堂就设在教堂内。正中由张寿民先生书写了一个大寿字，两旁对联由高赞非先生撰，由武中奇书写在大红纸上。其对联是：抗日战士皆英雄，爱国老人兆吉昌。此联撰写皆佳，范明枢老人非常满意，因为范老也是书法爱好者。张寿民、武中奇、高赞非、范明枢四位文化名人的聚会并留下了书法名联，一时传为佳话，可惜这些墨宝没有保留下来。如今张寿民、武中奇的墨宝还在社会上受到追捧，而范铭枢老人只留下了一件墨宝传世。那就是1944年他为沂南县万松山革命烈士陵园的题字：“倭奴逞凶乱中国，黄帝子孙扬其辉。民国三十三年范明枢题时年八十又一”。

张宗昌泰山建庙 张华辰撰联讽贼

张宗昌本是绿林出身，号称“狗肉将军”。此人曾去东北投靠张作霖，后在军阀混战中当上了山东督军，史称“张宗昌祸鲁”。此人不学无术，识字也不多，但好在人前卖弄，假装斯文。一次他去杭州开会，众军阀头目各夸各自地域的名胜古迹，这张宗昌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博雅”，他向大众言道：“我们山东的名胜更多。俗话说济南府的人全，泰山上的神全，我们泰山上什么神都有，故泰山上庙最多。”这时老军阀吴佩孚讽刺他道：“武大郎也是山东人，泰山上有他的庙吗？”众人哈哈大笑。张宗昌马上答道：“你们少见无知，泰山上就有武大郎庙。”众人又一笑了之。

晚上张宗昌的秘书对他言道：“散会后若有人去泰山可怎么办？”张宗昌道：“马上拍电报让泰安地方政府在山上修武大郎庙”。泰安地方政府接电后，马上研究怎么修建武大郎庙。由于时间紧迫，只好在壶天阁后的空地上建了一座像农村土地庙大小的一座小庙，庙内正中塑了武大郎的泥像，东侧塑了一个潘金莲，西侧塑了个武松，庙门上题着“武大郎庙”。这时有人建议还要有楹联，可巧这时在泰山的老教育家张华辰先生答应给撰写楹联。

张华辰先生是山东莱芜人，前清拔贡出身，甚有文才，一生从不当官，只办教育。这时他正在泰安教学，他思索后撰了两幅楹联。其一是：身矮偏有打虎弟，人丑却娶美貌妻。其二是：炊饼狗肉本一味，千户督军命同归。此两联刻在庙门两侧，游人看后无不发笑。张华辰先生怕张宗昌报复，很快就离开了泰安。从此泰山给张宗昌留下了笑柄。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楹联却成了预言，张宗昌的命运果然和西门庆的命运相同。西门庆被替兄报仇的武松杀死了，后来张宗昌被北伐军打败，逃往日本。1932年他回山东图谋东山再起，这时正是韩复榘在山东主政，哪能容他。他离开时，在济南火车站被一个替父报仇的郑继成打死了（另有一说是韩复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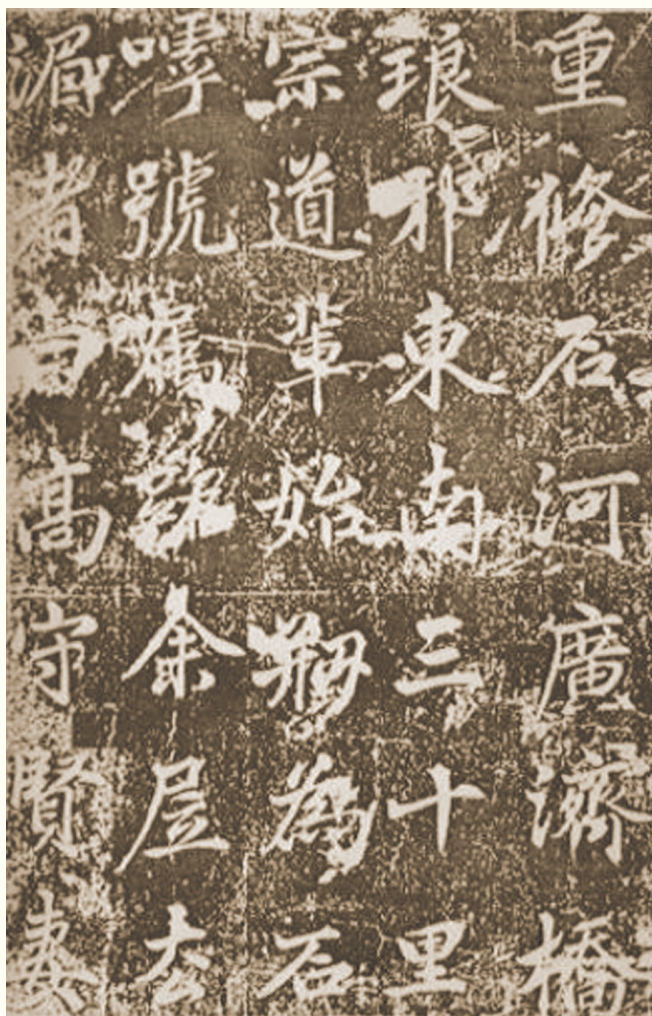


张作霖（左一）与张宗昌（左二）

派人所杀)。所以说张宗昌和西门庆是同样的命运，皆被复仇的人杀死了。再说泰山上的那座武大郎庙，也在解放后被拆除了，如今只留下了这段故事，成为张宗昌的笑柄。顺便一提的是，张宗昌在泰山还修了一座庙—无极庙，这是他大老婆在泰山出家修行的住所，至今此庙尚存。

明大义捐金建桥 献秘方振兴中医

明朝嘉靖年间，临沂有一名女子刘氏，曾捐金修桥便利行人。进士周京曾为此书《重修石河广济桥记》碑文，碑文载于《续修临沂县志》艺文篇。刘氏的义举和周京的书法广



《重修石河广济桥》
碑文

为流传。而400年后又有一刘氏妇人捐金建桥，书法家陈允升先生书写桥名的事却鲜为人知了。

古城南门外原为一吊桥，每天五更时放下，晚上起更时拉起。民国后为方便行人始建石桥，废除了吊桥。但这石桥很窄，很不方便行人，1958年时又改建成一座宽桥。这座宽桥就是由刘氏夫人捐金建造的。夫人名刘宋氏，娘家乃今兰陵长辛桥宋氏名门，查其族谱乃明末大儒宋鸣梧的后裔。她嫁到南关西园刘氏家中。刘氏家族本经商起家，在西大围门里南侧建有一座庄园，为防止日后天灾人祸族人变穷，便埋下了一批白银，埋银地点只准长子知道。至刘宋氏时，其公婆发现这个儿媳比儿子更可靠，于是她公公临死前将藏金之处秘密告诉了刘宋氏。后来丈夫多次追向她坚不肯吐。亦曾有人在刘家大院到处探测，

但始终未找到藏金。解放后，刘宋氏住在城内魏家巷的刘家院内，她辛勤劳动供其子女上学，大儿、二儿皆在部队，大女、二女、小儿子皆上学，刘宋氏深明大义，虽生活不富裕，但从未想将藏金为己所用。她主动向街干部冯培兰、街长赵佑民提出她要献金一事。街道干部当即向城关镇镇长邓开栋（人称邓跛）作了汇报，邓又逐级向上作了汇报。上级便让民政、银行和民主街派人前去挖宝。原来藏金根本不在西园刘家大院（此时大院已是建设街小学），而在城内南门里东侧魁星阁汪南沿的一处破旧的草房内。此处是刘家的一处小民房，一直借给穷苦人家居住。由民主街民兵开挖，挖至一米深处，始挖出了藏银，共有50两一个的元宝100只，全场人员皆十分兴奋。这些银元宝卖给了人民银行，所得现金作何使用呢？刘宋氏首先提出要贡献给政府用于有利于民生的福利事业，她征求其子女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母亲的做法。最后商定用在修建护城河上的两桥，即现在沂州路展览馆南的大桥和沂蒙路东方红影院南的大桥。两桥的命名，东桥是“劳动桥”，西桥是“新建桥”。桥名由书法家陈允升先生所书。后来两桥再次加宽，桥匾就看不见了。西桥上不但有陈允升写的桥名，桥面上还有拆西门时拆下的门匾“瞻蒙门”，现在也埋在路下了。

中医是我国的国粹，远自上古“神农尝百草”。但是自从西医的逐渐推广，就开始有人怀疑中医不科学，特别“五四”以来的人写文章否定中医，但中医依然为广大国民所接受。解放后1950年代初，为了振兴中医，临沂县医院即开始设中医门诊。当时设在城内并神楼北路西，有名的几位老中医皆被请来坐堂问诊，其中有老秀才刘宪邦、陈伯熙，名中医沈桐华、姚子扬等。

1959年5月，为了更好地推广中医，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县政府卫生局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由副县长陈法言主持，新老中医都到会。大家发言积极，最后决定搞一次献秘方展览，让每位中医将自己多年有效的秘方贡献出来。展览地点在职工俱乐部（今王羲之故居东院），每位献方者皆将秘方抄写在宣纸上，因这些老中医皆是书法家，故此又等于一次书法展览。姚子扬先生还在处方上画了花卉，更是为人欢迎。陈允升先生应邀用隶书写了一副治妇科病的秘方，很多妇女皆去传抄，很多秘方被抄去后马上试用，立竿见影，药到病除。广大市民皆道政府做了一件大好事。各乡镇的卫生院皆派人前来传抄。县卫生局还为此油印成册，广为流传。笔者当时抄录了几个处方：

姚子扬治牙痛方：石羔30g、公英30g、细辛3g、防风9g、升麻9g、白芷9g、芦根30g、竹茹7g，水煎服。

沈桐华治腰疼方：当归、车前子、麻黄、毛江、荆芥、甘草各3钱，用黄酒4两为引，水煎服。

陈伯熙治气管炎秘方：川贝3钱、甜杏仁5钱、冬瓜子4两，先用4小碗水煮冬瓜子成米汤状，再加舂碎的川贝及甜杏仁（分先后分下）煮沸即起，加冰糖随意，分3杯就热饭服，此方甚效。

刘宪邦治皮肤过敏处方：当归15g、川芎10g、荆芥10g、防风10g、羌活10g、独活10g、白鲜皮12g、苦参10g、龙霄花10g、黄芪10g、甘草10g、水煎服，3服即生效。

此次共献出秘方近千种，后择其精华500方汇编成《临沂市中医验方汇编第一集》。

马培卿“土遁”脱险 张秋帆越狱遇难

临沂的两个教育界名人，一个是马培卿，一个是张秋帆。他们两人皆从事教育多年，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却走着不同的道路，也有着不同的命运。

马培卿抗战初期即参加了抗协，担任苍马办事处主任。但他从未忘记教育事业。在解放区他还从事办学。一次他到河东王桥去参加游击队的一个会议，被坏人告密，引来了鬼子和汉奸。马培卿开枪与敌人战斗，掩护同志们安全撤退，最后他一人被围在一个地主

家的大院里，和敌人相持了一段时间后，他退到了后院的堂屋里，外面汉奸喊着“抓活的”引着鬼子进入院内。一个汉奸向鬼子报告说“亲眼看到他进入了堂屋”，领着鬼子进屋抓人。但进屋却不见人影。内室有一桌一床，别无他物。鬼子指着说“床下的”，汉奸趴到床下也未见有人，鬼子又用刺刀在床下乱刺了一阵，也未见有人。这鬼子便骂汉奸：

“你的撒谎欺骗皇军。”汉奸怕受惩罚，对鬼子言道：“土八路会土遁，他通过土遁逃跑了。”鬼子汉奸走后，马培卿从屋中走了出来。一个看院的长工李二，亲眼看到他出来后从前门走了。从此八路军“土遁”的传说在社会上就传开了。

日本鬼子不懂什么是“土遁”，回临沂后在新民会召开了一次有关“土遁”的座谈会。请了几个年老的教师和社会名流进行座谈。会议由日本顾问加藤主持。鬼子的无知令人可笑，但大家也只好发言应付，他们告诉鬼子，“土遁”是《封神演义》中的神话，是军事家姜尚的兵法，称作《六韬》，其中还有“水遁”等遁法。从此八路军会“土遁”的故事在广大群众中传开了。它既振奋了群众的抗日情绪，同时又给汉奸扫荡时抓不到八路找到了借口，只讲是八路都“土遁”了，以此免遭鬼子的责骂。

到底马培卿是如何“土遁”的呢？还是听听马先生自己的讲述吧。解放后马培卿担任了临沂行署文教科长。1951年他到临沂师范中学部去看望师生，有同学问他当年是如何“土遁”的，他笑着说：说“土遁”是不科学的，真正科学的讲是“木遁”。原来他进入屋后，发现只有床下可以藏身，但趴在床下定会被敌人搜出，他急中生智，挺起身子紧贴床板，双手抓住床穿，双脚勾住床牙，所以鬼子汉奸看见床下无人，进去的汉奸也不会仰脸向上看，他才躲过了这场大难。所以“木遁”脱险还是比较科学的，说得大家都笑了。

张秋帆却有着不同的命运。他是临沂南关人士，燕京大学毕业一直从事教育。抗战初期，他留在城内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担任过模范小学校长和临沂中学校长。他自称身在曹营心在汉，经常流露抗日的言论，不但有言论还有具体行动，他暗中鼓励进步学生去参加抗大分校和游击队。他的言行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当时任临沂中学教官（顾问）的鬼子名叫加藤，他和他老婆加藤美子专门负责监视教育界的，加藤美子在模范小学任教官，他们负责教日语课和教唱日本国歌，实际上他们都是特务。日特还在学生中安排了几个内线，所以张秋帆的言行早被日特侦知。日本宪兵队伍长高桥带领几个宪兵将张秋帆抓去了宪兵队，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百般审问，张秋帆从未招认一字，既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也未供出任何人。于是将他看押在宪兵队西北角的岗楼里，由两个宪兵看守，另外日特又在中学中对其他教师进行了审问，企图找到目标。

一个偶然给张秋帆带来了越狱的良机。临沂城的发电厂因事故停电，晚上一片黑暗。鬼子在岗楼上点上了蜡烛。两个鬼子乘机喝酒，喝醉后就睡着了。这时张秋帆乘机逃出岗楼，爬墙逃到宋家。宋家不敢藏他，让他出来逃跑出城。他从小巷奔向西北角的城墙，从城墙上跳下去，不顾腿跌伤，艰难地沿着涑河河道向西逃去。两个鬼子醒来后发现了张秋帆逃走，连忙报告出城去追，在大岭附近便将他抓了回来，将他百般折磨，最后将他处死，死后暴尸示众。鬼子集合了临沂中学的部分教师，曹介安、徐景翰等皆在场。加藤向他们训话：“这就是共产党抗日分子的下场，你们中若有他同谋，应赶快向皇军自首，否则下场和他一样”。

张秋帆死后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1945年解放后，抗日民主政府经过调查并未找到他是共产党员的根据。1947年国民党中统和军统也未找到他是国民党员的依据。他的真实身份一直是个迷。

临沂钩沉之李全一家 (下)

高 雷

李璡，乳名松寿，李全的儿子。也有人说李璡原本姓徐，祖籍衢州，他的父亲做扬州司理参军时，与李全关系很好，李璡被李全收养。《齐东野语》中说：“其雏（李全的儿子）松寿者，乃徐希稷之子。贾涉开阊维扬日，尝使与诸子同学。其后全无子，屡托涉祝之。涉以希稷向与之念，遂命与之，后更名璡云。”1227年（《元史》作元太祖十六年，即1221年），李全被蒙古兵困于青州，粮尽投降。元朝太师、国王孛鲁承制任命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并将他的哥哥李福提拔做副元帅。“由是郡县闻风款附。（《续资治通鉴》）”“太宗三年（1232年），（李）全攻宋扬州，败死，璡遂袭为益都行省，仍得专制其地。朝廷数征兵，辄诡辞不至。宪宗七年，又调其兵赴行在，璡亲诣帝言曰：‘益都乃宋航海要津，分军非便。’帝然之，命璡归取涟海数州。璡遂发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元史》）”“杀官军几尽，淮阳大震。（《宋史纪事本末》）”李璡因袭的职位来源于家族内部杨妙真的辞让，蒙古人移花接木，李璡亦表现不凡。

“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加璡江淮大都督。璡言：‘近获生口，知宋调兵将攻涟水。且谍见许浦、射阳湖舟舰相望，势欲出胶西，向益都，请缮城堑以备。’诏出金符十、银符五授璡，以赏将士有功者，且赐银三百锭，降诏奖谕。蒙古、汉军之在边者，咸听节制。璡复扬言：‘宋吕文德合淮南兵七万五千，来攻涟水，且规筑堡以临我。及得贾似道、吕文德书，辞甚悖傲。知朝廷近有内顾之忧，必将肆志于我。乞选将益兵，臣当帅先渡淮，以雪慢书之辱。’执政得奏，谕以‘朝廷方通和议，边将惟当固封圉。且南人用间，其诈非一，彼既不至，毋或妄动’。璡乃上言：‘臣所领益都，土旷人稀，自立海州，今八载，将士未尝释甲，转挽未尝息肩，民力凋耗，莫甚斯时。以一路之兵，抗一敌国，众寡不侔，人所共患。赖陛下神武，既克涟、海二州，复破夏贵、孙虎臣十余万之师。然臣岂敢恃此必敌人之不再至哉！且宋人今日西无掣肘，宜得并力而东。若以水陆缀涟而遣舟师遵海以北，捣胶、莱之虚，然后帅步骑直指沂、莒、滕、峄，则山东非我有矣，岂可易视而不为备哉。臣昨追敌至淮安，非不能乘胜取扬、楚，徒以执政止臣，故臣不敢深入。若以枣阳、唐、邓、陈、蔡诸军攻荆山，取寿、泗，以亳、宿、徐、邳诸军，合臣所统兵，攻扬、楚，则两淮可定。两淮既定，则选兵以取江南，自守以宽民力，将无施不可，此上策也。’因上将校冯泰等功第状，诏以益都官银分赏之。”

中统二年正月，璡言于行中书省，以宋人聚兵粮数十万，列舰万三千艘于许浦，以侵内郡，而宣抚司转输不继，恐一日水陆道绝，缓急莫报。请选精骑，倍道来援，表里协攻，乘机深入，江淮可图也。既而来献涟水捷，诏复奖谕，仍给金符十七、银符二十九，增赐将士。庚寅，璡辄发兵修益都城堑，且报宋人来攻涟水。诏遣阿术、哈剌拔都、爱仙不花等悉兵赴之，仍谕度宜益兵赴调。璡遂请节制诸道所集兵马，且请给兵器，中书议与矢三万，诏给矢十万。”（《元史》）



民国时的
益都西门外

“自蒙古主蒙哥卒，忽必烈立，璩始蒙南归之志，前后所奏凡数十事，皆恫疑虚喝以动蒙古，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宋史纪事本末》）”元朝大臣密奏忽必烈：“璩假都督之重，拥强兵至五、七万，日练习整厉，名为讨宋，而实不出境。士卒，惟知璩之号令，不复禀朝廷之命。平章王文统故璩参佐，倘中外连构，窥僻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又大驾前岁北征，郡臣躬捍牧圉，而璩独以御宋为辞，既不身先六军，又不遣一校以从。及驾还京师，诸侯朝觐，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国家去岁遣使聘宋，实欲百姓休息，璩独不喜，方发兵边境，下窃兵威，上失国信。又如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而璩方散遣其徒于别境，高其直以市马。王文统与璩缔交于此尤著。又中统钞法，诸路通行，惟璩用涟州会子，所领中统钞顾于臣境贸易，商人买盐而钞不见售。又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为三千五百锭，近年互为欺诳，省为二千五百锭，余悉自盗，属法制初新，宜复旧额，而欺盗仍前。又前岁，王师渡江，宋人来御，璩乘其隙取宋涟州，辄留岁赋为括兵之用，而又侵及盐课。诚使璩绝淮向南，去杭尚远，方今急务，政不在此。而徒以兵赋假之，不可不虑。（《新元史》）”忽必烈洞若观火，引而不发。《元史》评价李璩说：“其谋亦深矣。”岂不知忽必烈更高一筹。

中统二年（1261）冬，李璩“闻帝（忽必烈）自将讨阿里不哥，料内难非旦夕可平，反意遂决。”（《新元史》）

南宋朝廷对待李璩叛降纳款，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究竟李家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宋理宗认为：“逆雏一再纳款，情伪难凭，不可苟目前之小安，贻他日之大患。切须审处。”（《宋史全文》）

权臣贾似道奏曰：“当与之要约，如能归涟、海之地，始足取信。”（《宋史全文》）

李璩“初以其子彦简质于（元）朝，而潜为私驿，自益都至京师质子营。至是，彦简遂用私驿逃归。璩遂反，以涟、海三城献于宋，歼蒙古戍兵，引麾下具舟舰，还攻益都。甲午，入之，发府库以犒其党，遂寇蒲台。民闻璩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元史》）”以此换取了南宋“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路军马，封齐郡王；复其父全官爵。升涟水为安东州。（《宋史纪事本末》）”现代学者黄宽重认为：李璩虽叛蒙，却未必真心投宋，献涟海等城，旨在取得宋朝的信任，避免腹背受敌，专心应付蒙古。《牧庵集》之《姚枢神道碑铭》述：“闻李璩

召其质子彦简窃归，反有迹矣。帝（忽必烈）问：卿料如何？对曰：使璘乘吾北征之衅，留后兵寡，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令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贼将何出？对曰：出下策。”

“癸卯，帝闻璘反，遂下诏暴其罪。甲辰，命诸军讨璘。己酉，以璘故，戮中书平章王文统。（《元史》）”

王文统当过李璘的幕僚，又是李璘儿子彦简的老师，同时还是李璘的岳父，“军旅之事，咸与谏决。”李璘反元，王文统深陷其中。“蒙古主（忽必烈）召文统诘之曰：‘汝教璘为叛，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书毕，蒙古主命读之，其间有曰：‘蝼蚁之命，苟能存全，保为陛下取江南。’蒙古主曰：‘汝今日犹欲支词旁说耶？’会璘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洛水至，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蒙古主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曰：‘李璘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璘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蒙古主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续资治通鉴》）

李璘“景定壬戌二月三日，离涟水，带涟水、西海、东海及金军五万余人入里。二十七日，抵济南府。三月五日，小捷。三月，离济南五十里老仓口。十八日，大捷于清河。四月三日受围，离城三十里开河筑城，凡三河三城，而围起十七路人马。高丽国兵亦来。（《前闻记》）”

“五月，蒙古主命诸王哈必赤总诸道兵击李璘，璘兵势甚张，复命丞相史天泽往，仍诏诸将皆受天泽节制。天泽至济南，谓哈必赤曰：‘璘多谲而兵精，不宜力角，当以岁月弊之。’乃深沟高垒，遏其侵軼。初，行军总管张弘范临发，父柔谓曰：‘汝围城勿避险地，险则己无懈心，兵必致死。主者虑其险，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范营城西，璘出兵突诸将，独不向弘范。弘范曰：‘我营险地，璘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来袭，谓我弗悟也。’遂筑长垒，内伏甲而外为濠，开东门以待。夜，浚濠加深广，璘不知也。明日，璘果拥飞桥来攻，未及岸，军陷濠中；得升濠者突入垒门，遇伏皆死。（《宋史纪事本末》）”

“六月，戊子（宋）朝廷闻李璘受围，给银五万两，下益都府犒军，遣青阳梦炎帅师援之。梦炎至山东，不敢进而还。”（《续资治通鉴》）

八月“癸酉，命史枢、阿术帅师赴济南。璘帅众出掠辎重，将及城，官军邀击，大败之，斩首四千级，璘退保济南。”（《元史》）

“蒙古命宋子贞参议军事。子贞至济南，观形势，说史天泽曰：‘李璘拥众东来，坐守孤城，宜增筑外城，防其奔突。彼粮尽援绝，不攻自破矣。’议与天泽合，遂筑环城围济南，璘自是不得出城。西南有大涧亘历山，史枢一军独当其险，夹涧而城，竖木栅于涧中。淫雨暴涨，木栅尽坏。枢曰：‘贼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苇炬数百置城上。三鼓，贼果至，飞炬掷之，风怒火烈，弓弩齐发，贼大溃，蹂躏死者不可胜计。董文炳知其势蹙，乃抵城下，呼璘爱将田都帅曰：‘反者璘耳，余来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绾城降，璘犹日夜拒守，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不足，则家赋之盐，令以人为食。”（《续资治通鉴》）

“至是，人情溃散，璘不能制，各什伯相结，绾城以出。璘知城且破，乃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浅不得死，为官军所获，缚至诸王合必赤帐前。丞相史天泽言：‘宜即诛之，以安人心。’遂与蒙古军官囊家并诛焉。”（《元史》）

祝允明《前闻记》另有一番记述：“七月十三日，结阵而出，人已无力，复被杀入。由是诸军间有出投拜者，云昨夜天文见，当主兵败，郡王曰：‘俺每也无理会。’自是日



大明湖老照片

逐兵出投拜。十八日，子出投拜。十九日，夜壹鼓，有大星坠于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璿死于此。’于是坐于庭中，以镊摘去长髭。二十日早，分付众出，各讨路去。王下小舟入海口，投于水，止及其腰。有一老子姓黄曰：‘相公为天下不平，做出这事，何故自陨？’引而登岸，至孟权府。

千户治所密报，张相公差人缚出，严相公首问曰：‘此是何等做作？’王答曰：‘尔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尔处？’王曰：‘尔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斫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令其子提其首以下山东诸郡。……李王之死，身无滴血，惟是黄脓浆，尸无蝇蚋，亦可怪也。其受围之日，作《水龙吟》一词曰：‘腰刀帕首从军，戍楼独倚阑凝眺，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叹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世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干戈烂熳，无时休息，凭谁驱扫？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首平燕赵。’”

李璿逆历史潮流而动，自以为得计。实则遗臭千古。起兵百姓躲避，儒士遁去；战时众叛亲离，身败名裂。鲁南大地生灵涂炭。“初，璿兵有沂、涟两军二万余人，勇而善战，哈比赤配蒙古诸军，使阴杀之。”（《宋史纪事本末》）

中统癸亥，山东兵欲起时，李璿劫持名士孟珙参与，“甲者三至，珙不肯，遂被害。”其有《猛虎》诗一首，一言中的：“猛虎被束缚，皮肉不相保，人生到错迕，天地亦草草。古来割据何代无，可怜百万殉匹夫，渔阳突骑如风火，青州城门铁作枢，丈夫好在识时务，座上赤龙公莫舞，沙海荒荒魂不归，莫说青州泪如雨。”

“史臣曰：‘明张溥史论，亟称李璿能盖前愆，跻之忠臣孝子之列。璿世受蒙古豢养，辜恩反噬，欲乘时微利，自为帝王，非忠于赵氏者也。君子一言，以为不知，其溥之谓欤。’”（《新元史》）

元朝人于钦对李全一家的评价更加精当确切，引录在此，作为本文的结束：“不幸残金之乱，李全父子盗据此方，户编为兵，人教之战，父叛于南，子叛于北，衣冠之族变为卒伍，忠义之俗，染以恶名。全起群盗，的不知何人。养子璿，本徐希稷之子，又出异类，非齐氏族，客乱山东，劫民为逆，自速诛夷。然败俗污善，不可不辨。或曰：然则王著何如？曰：著盗杀权臣，盖刺客聂政之流，恶则恶矣，岂璿畔逆之比哉？”（《齐乘》卷五）

祝邱（即邱）城与 历史名人文姜、管辂

刘聚兴

临沂市河东区汤河镇西部，现存一处古城遗址，尚留一段长300余米、宽50余米、高10余米的古城墙。这就是史称的祝邱城，又称即丘县。《寰宇记》里解释祝邱与即邱这样说：“祝与即，齐鲁之音也，其实一焉。”

祝邱城的最早记载见《左传·桓公五年》：“夏，齐侯，郑伯如纪。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葬陈桓公。城祝丘。”现今祝邱古遗址东北角尚存一大墓，据说是郑王墓。由此可见，近2700年前的祝邱应是临沂境内最早的城邑之一。

史载，我国的郡县制始于秦，郡下设县，祝邱城改为即邱县史料始见于西汉初期。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即邱改名就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琅琊国辖临沂、开阳、即邱等十余县；西晋灭亡，东晋南迁后，刘裕执掌朝政时北伐，建刘宋，设置了徐州琅琊郡，下设即邱、费县；北齐与北周时期，州、郡、县废置，临沂县并入即邱县；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即邱县并入临沂县，翌年将临沂县治所从今汤河镇四故县村移到今天的临沂城。后几经战火，祝邱城垣倒塌，故城逐渐消失，仅留下一段古城墙。1973年，在文物复查工作中，曾在该遗址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鸟啄形鼎足、骨箭头、黑陶残片；春秋时代的鬲足、印纹硬陶片、三棱铜箭头；汉代的罐形鼎、铜鼎、博山炉、铜剑吞口、陶博山炉盖、铁锄、“大泉五十”铜币等物。

祝邱古城虽然已经消失于茫茫历史之中，但这座古城留下了诸多美丽的传说，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数两个历史名人。

一曰文姜。

文姜是齐国国君齐僖公的次女，她和祝邱城有两处历史记载：一是文姜滞祝邱。《列女传·卷之七·孽嬖传》称，文姜与其兄齐襄公有私情，被父亲嫁给了鲁国的鲁桓公。桓公十五年的春夏之交，齐襄公已经即位为齐侯三年了，尚无正妃。此时他决定向周王室王姬求婚，邀请和周朝宗室同姓的鲁国国君桓公来代为主持。文姜闻讯，便要求和丈夫一起去齐国，鲁桓公不顾大臣反对，答应了她的请求。在齐国，文姜和齐襄公旧情复燃，留宿齐宫彻夜不回鲁侯居住的驿馆，鲁桓公为此大为恼火并斥责她。文姜转而向襄公告状，襄公为情起了杀心。他设宴款待鲁桓公，令大力士齐公子彭生在送鲁桓公回驿馆的路上将其杀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曾有这样的记录：“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诗经·南山》讥讽这桩有违道德的兄妹情：“南山崔崔，雄狐



文姜

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葛屦五两，冠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鞫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文姜自鲁桓公死后羞于回鲁而留在了齐国。《诗经·载驱》描述文姜留齐曰：“载驱薄薄，蕞茀朱鞮，鲁道有荡，齐子发夕。四骖济济，垂辔沘沘，鲁道有荡，齐子岂弟。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鲁道有荡，齐子游遨。”

另据史载，鲁桓公与文姜的儿子鲁庄公继位后，鲁国派使臣至齐迎文姜回鲁。怕世人议论，齐襄公不得不放文姜回鲁。文姜怀着留恋其兄、羞见其子的复杂心情，既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缓缓向鲁国进发。当时齐鲁之间群山连绵，出齐入鲁多靠车马舟船。据专家推断，文姜从齐国出穆陵关西行入鲁，进入鲁南平原应是改乘舟船沿舞阳河行走（《水经注》里记载，舞阳河流经祝邱）。船到了一个叫禚的地方，文姜感叹道：“这里既不是鲁国，也不是齐国，我该在此安身啊！”于是，派人回复鲁庄公说：“我性爱闲适，不愿意回宫。如果非要我回宫，除非我死之后。”鲁庄公当然明白母亲无颜回国的缘由，就在祝邱这个地方为母亲建了馆舍，文姜便住在了祝邱城。另据《春秋左传》记载：“鲁庄公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这年，齐襄公带领大军袭击了纪国，占领了三个城池。凯旋的时候，专门经过祝邱城看望文姜。文姜盛装出祝邱城迎接，以国君的盛大礼仪相见，并大摆宴席，招待齐军。有文献记载说，文姜在祝邱居住了多年，直至齐国发生内乱，齐襄公被杀，才决定离开祝邱城回鲁国。回到鲁国之后，文姜一心一意地帮儿子鲁庄公处理国政。她才思过人，做事细密，手腕灵活，迅速让儿子鲁庄公大权在握，在列国间更折冲樽俎，处置得宜，提高了鲁国的威望，迅速积蓄了国力，并帮助鲁庄公在长勺之战中打败了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鲁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73年），充满传奇色彩的文姜去世。

二曰管辂。

管辂（209—256年），字公明，三国时魏术士。据历史记载，他精通《周易》，善于卜筮、相术，习鸟语，相传每言辄中，出神入化。体性宽大，常以德报怨。管辂被后世奉为卜卦观相的祖师，一生著述甚丰，有《周易通灵诀》、《周易通灵要诀》、《破躁经》、《占



箕》。《三国志·方技传》将管辂之术筮与“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周宣之相梦”相提并论，认为“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

管辂的父亲叫管丘，山东平原人，当时在即邱任即邱长。管辂幼年由平原随父来到即邱城，整个童年时代是在即邱城度过的。

《三国志·管辂传》记载，管辂幼年读书十分刻苦，有过目而不忘的才学。他最大的嗜好就是最喜欢读《易经》，八九岁时就已熟能成诵。虽是小小的年纪，却对人文、历史及世间的发展变化有着独到的见解。

管辂不仅酷爱《易经》，还潜心研究天地、日月、星辰，夜深人静之时常独自凝望着夜空，细察星月升落，分析记录天际间的星相变化。父母见他如此痴迷，惟恐荒废了学业，就对他进行批评和劝阻。然而，管辂对父母的劝教总是不以为然，依然我行我素。他认为：“就连地上的家鸡，天上的野鸽，都知道自然界的发展变化，何况人乎！人非家鸡野鸽，不是更应该知道世间未知而应知的这一切吗？”

放学之后，管辂常常和小伙伴玩游戏。他在沙地上画上八卦，以草棍为爻，为孩子们占卜算命；绘成日月星辰，将天文、地理、易经融进孩童的游戏中，让一起玩的孩子在欢愉中一起感受到易理的精深和博大。管辂这些不同凡响的做法常让周围的孩子称奇，连即邱城里的大人们也惊叹不已，都说管辂这个孩子有出息。

小小的管辂在即邱城里的名气越来越大了，成为城中妇孺皆知的少年奇才。

时间不长，少年管辂的轶事便传到了即邱城西三十五华里外的琅琊郡，街头巷尾传说着即邱城里的管辂。太守单子春听说以后，将信将疑，便很想见见这位少年才子。他把约见管辂的想法写信告知即邱长管丘。管丘不敢怠慢，立即让管辂到琅琊郡拜见单太守。

为了验证管辂的才华，单子春当日招来郡中能言善辩、学识过人的宾客百余人于堂上，嘱咐他们各展才华与管辂相对，以此考问和检验管辂的才学。

面对满堂的名人英才，管辂对太守说：“府中诸君皆世间名士，气质形态个个雄贵。而我却年轻胆子小，在此理论惧怕有失常态呀。管辂不才，为了壮壮胆子，请太守先让我喝上三升美酒，然后再于堂中辩论可否？”太守对管辂的这一要求并不责怪，立即吩咐下人为管辂满酌上三升美酒。管辂见到美酒兴奋异常，连连称谢，对着满堂的人逐升饮之。

酒尽之后，管辂问太守：“大人，今天和我为对的，是不是府君四坐之士呀？”太守告诉他：“今天，在座宾客皆欲领教你的学识。不过，我想先与你旗鼓相对。”管辂谦虚地说：“我开始的时候读诗经、论语、易本，才学实在是浅薄，既不能引说法家之言、儒家之道，也不能陈述商、周、秦、汉之争，定然比不上太守您在座的大家呀。”看看满堂人诧异的目光，他接着说：“我只是希望在这里论论金木水火土、阴阳学说、鬼神之情耳。”子春说：“你所不能的那些，应该是最简单的事情，你所要论述的这些应该是最难的。舍去容易的，咱就当堂交谈辩论最难的吧。”管辂点头称是后，满堂人就开始与他论辩起易理来。

在与单子春的辩说之中，管辂对阴阳八卦的阐述，言语精奥，娓娓道来，文采葩流，枝叶横生，内中却很少引自圣人儒学，多以世间的自然发展变化为佐证，件件事都说得无懈可击。子春虽反复辩难，管辂却始终对答如流。四坐能言辩士见此，也纷纷对管辂的论说提出种种质疑，并分别进行了面对面的论辩，管辂从容面对，有问必答，条条侃侃而谈，毫无难色。就这样，众人对一人的辩论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晚上，大家虽然一天都没有进食酒饭，然子春及众宾客却并无一人难倒管辂，满堂人无不对管辂的学识所叹服。

辩论结束之后，太守对众人说：“管辂年少，却很有才器。听他的言论，一言一语都像是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那样的精美华贵，一字一句磊落雄壮，真的是英神以茂，这样的孩子有谁能不服呀。他的天文地理、阴阳变化言之精行之良，真的是名不虚传。”于是，单子春将管辂的奇人异事上报给徐州牧，遂被号之为当世的小神童。管辂小有名气



管 輅

之后，父亲对管輅的嗜好也不再指责，而且千方百计帮助儿子发挥好特长，不仅专门在即邱城的东南角为管輅修筑起了观象台，还为管輅遍请名师，让管輅深造。

当时，即邱城里有个叫郭恩的名士，非常有才学，特别擅长《周易》、《春秋》的研究，精通天文地理，极有名气。一天，管丘带着管輅来到郭恩家，让管輅拜郭恩为师学习《周易》。管輅跟郭恩才学习了仅仅几十天，就很快学会了郭恩所掌握的易学知识，他的易理言谈比老师郭恩还要高明许多。郭恩十分叹服管輅的学识，自觉与管輅有了很大的差距，便反过来跟着管輅学习《周易》，心甘情愿地拜自己的徒弟为老师。

关于管輅善术数、神机妙算的传说很多。据传，曹操南征，恰与怀遁甲、凌云飞步之术的左慈狭路相逢，被左慈布成的黑风、群尸惊吓成疾，服药无效。于是差人到即邱城召管輅卜之。管輅为曹操卜后说：“此乃幻术，不必为忧，数日之内必转好。”曹操听后，随之心安，身上的疾病也渐渐痊愈。曹操病好之后，欲封管輅为太史。管輅相曹操，多奸诈、凶残、贪婪之态，深恶。于是借故坚辞：“我本穷像命薄，不称此职，不敢受也。”曹操问其缘故，管輅说：“我额无主骨，眼无守睛；鼻无梁柱，脚无天根；背无三甲，腹无三壬；只可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也。”

管輅此后离开即邱城，远离曹营，于世无争，融入民间占卜算命。他处事为人没有贵贱高低之分，一律平等相待。做人大大厚道，心胸开阔，对自己好的人不过分亲昵，对恨自己的人也不会心里记恨，总是以德报怨，与父母、兄弟以及亲戚朋友相处得非常得体。因此，管輅名留几代，事迹广为传颂。



梁元帝萧绎的变异人格

淮上湖畔



梁元帝萧绎（508—554），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552年11月在江陵即皇帝位，在位仅三年，554年西魏攻陷江陵，被俘遇害。

在中华文化史上，有几位著名的父子文人，前有三国时的“三曹”，后有北宋的“三苏”；南朝时的梁氏父子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是梁武帝萧衍与他的三个儿子——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与梁元帝萧绎，而萧绎又是“四萧”中的佼佼者，其文学成就堪称翘楚。据《梁书·元帝本纪》记述：“既长好学，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其生平著述多达20种，共400多卷。最重要的著述是《金楼子》，《隋书·经籍志》录有十卷，后存六卷入《四库全书》子部。现代作家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引用他的《采莲赋》描述江南采莲的情事。在历史上，他向来就有“才子皇帝”之称。

他喜欢藏书，更是痴迷读书。他经常让左右侍从读书给他听，而且“昼夜不绝”，即使熟睡，但若有读错或故意欺骗，他总是立刻惊醒。在江陵的时候，借抄私家藏书一直不辍；平定侯景之乱后，收取文德殿藏书及其他公私典籍七万多卷，到他在江陵即位的时候，其藏书已达十四万卷。

但就是在江陵城破之夜，他命令高善宝一把火烧掉这些非常不容易辑录聚集的十四万卷古今图书，从而造成自秦始皇焚书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化史上的浩劫。当有人问他为何焚书，他回答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胡三省感叹“帝之亡国，故不由读书也”，清人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直言梁元帝是自取灭亡，并且强调“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

萧绎在其父萧衍驾崩之后，人性中的残忍又暴露无遗。

曾经担任过湘东王长史的刘之遴，在萧衍驾崩之后“剃发僧服”逃出建康要回归江陵，而萧绎一向就妒忌他的才华，于是在549年6月刘之遴到达夏口的时候，他派人秘密地“送药杀之”，但为了遮人耳目，他亲自为刘之遴作墓志铭，并且赠送刘家很多财物用来风光地办丧事。

549年7月，他怀疑竟陵太守王僧辩坐等观望，就随手用刀砍杀，结果砍中王僧辩的左大腿，“闷绝，久之方苏，即送狱”，直到王僧辩的母亲“徒行流涕入谢，自陈无训”，他才消了怒火，赐以良药，王僧辩才“得

不死”。而后来王僧辩还替他立下汗马之劳。

平定侯景之乱，已是阶下囚但却是侯景之乱最大的谋划人王伟在监狱中给萧绎写了“五百言诗”，萧绎读着王伟的诗特别爱惜他的才华，就忘了王伟是他萧绎杀父亡国的罪人而想赦免他。有人就告诉萧绎，王伟的讨伐檄文也写得特别好，当他看到檄文中“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其意是：湘东王只有一只眼睛，还想着普天下的百姓归附他吗！）的时候，便从心底升起一股强烈的怒火，他就让人将王伟的舌头钉在柱子上，然后剖开他的肚子，又一片肉一片肉地碎割直至王伟死亡。

553年7月，他一道密旨让樊猛杀掉八弟武陵王萧纪，赐萧纪后人姓氏为饕餮氏（意为贪财贪食），并且将他的两个侄子萧圆照与萧圆正活活饿死在监狱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为“至啮臂啖之，十三日而死，远近闻而悲之”，饿到啃咬自己的手臂，整整十三天而死！他又杀了他的不少兄弟子侄。萧绎残忍也可见一斑了！

我们在读有关萧绎的历史记载时，无法理解他的为人与治学。

读书应该明智，读圣贤书更应懂得亲情的重要与治国安邦的原则。但藏书那么多、读书那么多、援笔立就的萧绎却显示出政治上的昏庸甚至弱智、伦理上毒狠异常的人格分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读书与行事如此分离？原因可能有四：

其一，他读书未能怀有济世的伟大理想。王夫之感慨为：“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其意是萧绎读书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向人夸示自己读书读得多。我们在读唐宋八大家的文字时，明显感觉到那些读书人有一种积极出仕的人生奋斗理想，他们确实在强调“文以载道”的文字及其在宦途中的积极用世；也只是在自己遭受打击或贬谪之时才生发出一些“独善其身”的感慨。就萧绎本人而言，即位前担任一方诸侯的时候，还是有些作为的，他15岁到19岁担任丹阳尹期间，与三五好友诗歌唱和，并积极推动文学改革，为政上有“良政之名”，当地百姓还给他立“善政碑”，由大才子裴子野撰文；但一旦登上权力的峰巅便任意杀戮，遇上战事也不会识鉴并重用贤能之人了。

其二，他只是死读书，读死书，而未能行万里路，去采民风察民情，体验黎民稼穡之苦，最起码经历一些旅途之艰险和劳苦，尝试一些苦的滋味。他只会在其哥哥萧纲的倡导下，做个文坛副领袖创作些与百姓无关联的宫体诗甚至艳体诗。他只知这十四万卷书是自己

的私有财产，一旦城破自己不再能拥有的时候，便肆无忌惮地让人绝情地焚毁殆尽。

其三，可能与他的生理缺陷有关，他从小就失去一只眼睛，而且还多少受到了不少人的奚落和暗讽。他的正妃就是历史上闻名的所谓“徐娘半老”的徐氏，这位徐妃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被写成一个“丑而妒，又多失行”的女人，而且还乐意给贵为湘东王的萧绎戴绿帽子。萧绎也是三年“一至其室”，每当徐妃闻知萧绎要来，便以“半面妆”等待萧绎，所谓“半面妆”就是因为萧绎瞎了一只眼而徐妃只化好半面脸的妆，因此萧绎只能愤怒而出，但就是这样，徐妃还是与萧绎生有一子一女，但很可惜，其子萧方等却因为其母的原因得不到萧绎的欢心，甚至最后被萧绎故意安排去讨伐骁勇善战的河东王萧誉，而在意料之中的战败中淹死。这些遭遇应该给萧绎造成严重的心理阴影，使得他多疑懦弱，遇事不果断；而真正大权在握便无情地肆意杀戮了。甚至西魏大军围城的时候，还要让人棒杀那些在监狱中的几千死囚犯。

其四，萧绎不仁，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据《金楼子》自述，萧绎非常喜欢写诗作文，他的母亲对他说：“夫政也者，生民之本也。尔其勸之！”希望他作为王侯要首先重视学习为政之道，而不是急于诗赋著述。年轻时的他还能想到他母亲的谆谆教诲，年长后便沉浸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而忘却这些良言了。韩愈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心中充溢爱心并能施爱于人才称为“仁”，而萧绎“舍侯景之大仇，而亟戕其骨肉”，这都是他心中据有不仁之情，难怪王夫之感慨“不仁者，未有能保其地利者也”。儒家向来提倡并践行仁爱精神，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萧绎连家人都不爱，就不能指望他去爱天下之人了！



临沂出土文物之

水晶神兽

高 昂



汉朝水晶神兽，1972年12月临沂县（今罗庄区）吴白庄东汉画像石墓出土，高2.3厘米 长4.0厘米。质地为水晶，为圆雕卧式神兽，兽头前伸，缩颈拱背，四肢屈踞，腰部钻一小孔。

1972年11月27日至12月26日，临沂地区文物组组织专家对吴白庄汉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墓葬属半地下建筑，地面起冢，封土高于地面约1米。墓葬东西长15米，南北宽9米。整座墓葬由墓道、墓门、前室、中室、西墓室、东墓室、回廊、西两耳室和东一耳室组成。出土有画像石49块，早年损坏4块，现存有45块。画面65幅，分布在墓门、前室、中室、横额、支柱、立柱、过梁等处。采用浅铲地平面阴线刻、深剔地平面阴线刻以及高浮雕、透雕等雕刻技法。画像内容主要有羽人、四神、伏羲、女娲、神农氏、东王公、西王母、玉兔捣药、仙人云车出行等神话故事，以及庖厨、乐舞、宴饮、车马出行等生活场面，表现墓主尊贵豪华的现实生活和对未来的追求。其中捣鸟窝图与夸仙药图独具特色，在全国画像石墓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该墓早年被盗，随葬品遗失殆尽，仅剩有虎形水晶神兽1件、松绿石兽3件、部分碎青瓷片及大泉五十、五铢、剪边五铢等300余枚钱币。由此断定墓葬为东汉时期。

水晶神兽是汉朝谶纬之学的表现，寄予了当时人的理想，所以无需考证它究竟是老虎，还是狮子，它是世俗与神话的完美的结合。

神兽的材质虽来源于当地，但因通体晶莹剔透，光润无瑕，在那个时代不失为上乘玉石。因腰部有垂直小孔，可以确定是饰玉。

水晶神兽的艺术特点有三。一是造型准确，既是生活积累的提炼，又是典型化了的的作品；二是技法粗犷有力，刚劲雄浑，带有时代的风格；三是推、琢、磨、刻运刀手法巧妙娴熟，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所以此水晶神兽不愧国之瑰宝，也属于珍稀之物。

潍县战役：胜利日_(下)

本 编



英模大会开幕部队通过胜利门



民乐伴奏



向英雄献花



首长在英模大会上宣读奖状



潍县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在城外清点战果



敬献贺幛



到会全体指战员向牺牲的烈士致敬、默哀

从《王琳墓志》 看“颜体”演变形成_(下)

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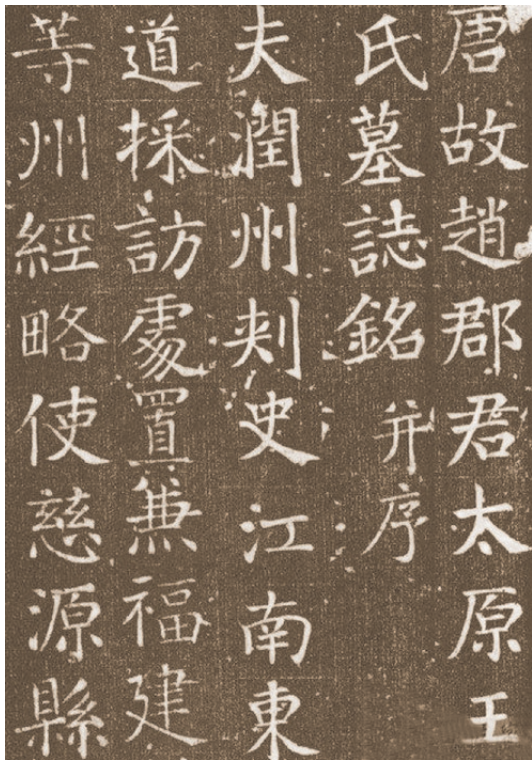
三、颜真卿书法演变过程

颜真卿早期作品自始至终，一无懈笔。诚如王澐《虚舟题跋》所称：“腴不剩肉，健不剩骨，以浑劲吐风神，以姿媚含变化，正是年少鲜华时意到书也。”

在颜真卿楷书作品中，《王琳墓志》、《郭虚己墓志》、《多宝塔碑》和《颜勤礼碑》最有代表性。四者风格有所不同，体现颜真卿创立颜体所经历的从摸索到成型的过程。

（一）从唐楷而出的《王琳墓志》

《王琳墓志》是现存的颜真卿40岁前的唯一作品。从碑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琳墓志》书写时，个人的风格虽然还不浓厚，但已渐趋精密腴劲，取势迥异二王家法。从《王琳墓志》到《东方朔画像赞》以及后来的《多宝塔碑》



《颜勤礼碑》等。颜真卿这一书体的创立，到历史上颜体的形成，当是从此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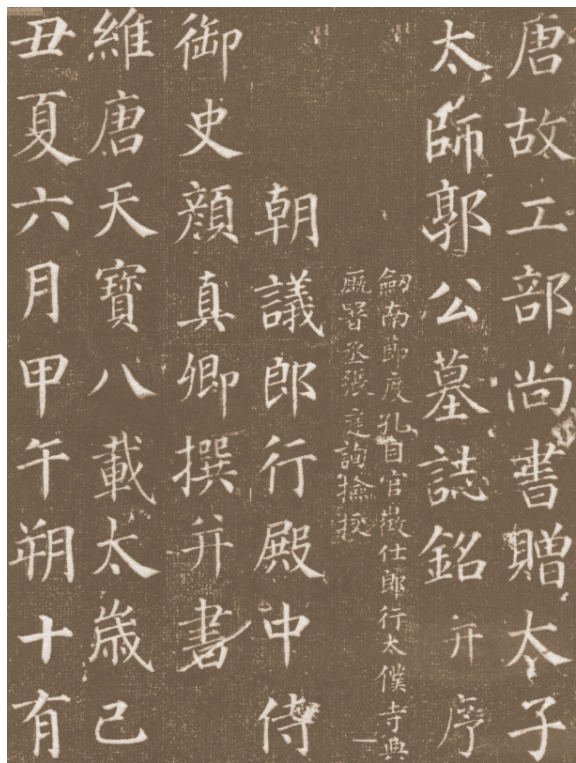
颜真卿的《王琳墓志》从初唐而来。许多笔画、字形出自一代宗师褚遂良。米芾《跋颜书》中说：“颜真卿学褚遂良。”今人也多有印证此说者。沈尹默就说：“颜平原书出于褚河南，其楷书结体端严，往往犹有伊阙佛龕碑之风格。”论者或谓从《麻姑山仙坛记》、《靖居寺题名》、《宋广平碑》等笔画较瘦的作品中，更易发现褚遂良的用笔、结体以及清瘦、圆润相沟通。如《王琳墓志》“文”“大”“夫”等字撇画，线条曲动，柔中

寓刚，道媚潇洒。也有少许出自欧阳询，如“氏”“仁”以方笔为主，使转分明，劲峭严整刚健清秀。然碑中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有“颜体”的影子。从作品的分析中可知，颜体楷书蚕头燕尾的特征在横、捺笔划中已经初步显现，大开大阖的趋势也隐然其中。如“司”“尚”“国”“使”等字。颜真卿所追求的是用笔上沉着、雄毅，以健力立骨体，敷以较厚之肉彩；结体上整密、端庄、深稳。

（二）过度转型期的《郭虚己墓志》

《郭虚己墓志》全称《唐故工部尚书赠太子太师郭公墓志铭》，系颜真卿早期的楷书作品。

该墓志1997年10月在偃师市首阳山镇出土，现藏偃师商城博物馆，2003年10月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颜真卿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撰文并书丹，时年42岁。墓志青石质，长104.8厘米，宽106厘米，厚16厘米；盝顶盖，篆书“唐故工部尚书赠太子太师郭公墓志铭”16字，四边线刻瑞兽及花纹；志文楷书35行，满行34字，共1150字，有浅线界格，字体端庄工整，刻工十分精细，墓志内容涉及唐朝和吐蕃的关系，可起补史之作用。天宝五年颜真卿到洛阳请教张旭，“自此得攻书之术，于兹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按颜真卿的生卒年



限推算，天宝八年（749年）颜真卿41岁，其书法艺术已有相当深厚的功底。

这方墓志书写恰在师法张旭、真书可成的时间段内，因而可代表他早期楷书的瘦劲风格，与后来成型的丰腴楷书有明显不同。原先发现的颜真卿最早的楷书代表作，是他44岁时书写的《多宝塔碑》（晚于《郭虚己墓志》两年），现在所知最早拓本捶拓于北宋，距天宝十一年刻碑已200多年，其间经过风雨侵蚀和捶拓损坏，其效果远不及刚出土的《郭虚己墓志》能体现原作风貌。《郭虚己墓志铭》整篇布局疏密合度，字体大小匀称，字迹端庄秀丽，笔划肥瘦适中，棱角分明，筋骨挺拔，墨迹浓淡相宜，笔势刚柔相济，气韵不凡，既流露出颜氏效法褚遂良、张旭的痕迹，又透露出自己成熟风格的端倪。

这时颜氏的书法与他成熟期的作品《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颜勤礼碑》等还有较大差距。如果把唐代“草圣”张旭在天宝元年（742年）书写的楷书《善仁墓志》和这方墓志的书法艺术做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两方墓志的艺术风格有许多相似之处，其师承关系显现于点划之间。虽然如此，《郭虚己墓志》仍是颜真卿楷书艺术的优秀作品，其整篇规整统一，单字结构严密，笔道刚劲有力。

（三）从唐楷而出的《多宝塔碑》

《多宝塔碑》的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文》。颜真卿在天宝十一年（752年）写的。

此碑是颜真卿44岁时书，直接二王、欧、虞、褚余风，而又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整篇结构严密，点画圆整，秀丽刚劲，虽尚未形成刚劲雄强、沉雄浑厚、大气磅礴的颜楷风格，但此碑已奠定了颜真卿书风的基本格调，它是留传下来的颜书中最早的楷书作品，结构平稳端正，严谨庄重，是唐代“尚法”的代表碑刻之一。该碑用笔多用中



锋，起笔和收笔有明显的顿按。起笔藏锋为主，兼露锋用，方圆并用，有些横画笔较为外露，多不似柳书的齐头方脚，而是稍存斜尖，并参以含蓄的笔意使之变化丰富；收笔用顿笔和回锋的较多，强调“护尾”，尤其于横画中最为明显，写横行至收笔处，常向右下方重按，顿笔回锋，体现出颜体的雄浑、大气之韵，竖画粗壮，浑厚力强。横、竖笔画粗细对比鲜明，富节奏、韵律美感，也把颜体的一个“筋”的意味完整的表达出来。颜体撇画较轻盈挺健，捺画却粗壮有力，有“蚕头燕尾”之称，给人以刚健的动感，尤其是捺脚较长，顿挫后踢出开衩，含蓄而又有峻利之感。另外，颜体捺画的捺脚多与撇画锋尖持平或稍低，不似柳体的撇低捺高，而呈现出一种舒展沉稳之美。该碑转折变化较多，主要有提笔耸肩顿挫和按笔削肩暗转之法，有方有圆，方圆兼施。具有唐楷“尚法”的典型特征，结体宽博，布白较匀整，字型稍方，端庄平稳，正气饱满，已初显颜体成熟期的正面示人、雄浑豪迈的书风。

《多宝塔碑》书体不似柳书的中紧外放，主笔长枪大戟般舒放。该碑字体笔画间的宽窄收放对比较欧、柳书体要小，主笔相对收敛，短笔相对放

长，因此中宫显得较为疏朗，外部笔画也较规整，较欧、柳书体略显内松外紧、字势宽绰、雄浑平稳。《多宝塔碑》中的点运用灵活，引带顾盼；笔画间时有露锋映带，连贯照应，正斜相生；一些主竖故意偏离中线，而靠长横的斜势及长的“力臂”和重的“垂尾”来获取平衡，使稳活相生，奇趣顿增。书体虽笔力雄浑厚重，却墨酣意足，在笔墨流动处颇显媚秀之姿，也成就了颜楷的“雄媚”书风。

（四）完全成熟的《颜勤礼碑》

《颜勤礼碑》全称《夔州督府长史颜勤礼碑》，是颜真卿为其曾祖父颜勤礼所书的神道碑。此碑四面刻字，现存两面及一侧，文至“铭曰”止，现置于西安碑林。自署立于大历十四年（779年）。楷书，碑文一通。残石175×90×22厘米。碑四面环刻，存书三面。碑阳19行，碑阴20行，行38字。左侧5行，行37字。右侧上半宋人刻“忽惊列岫晓来逼，朔雪洗尽烟岚昏”十四字，下刻民国宋伯鲁题跋。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初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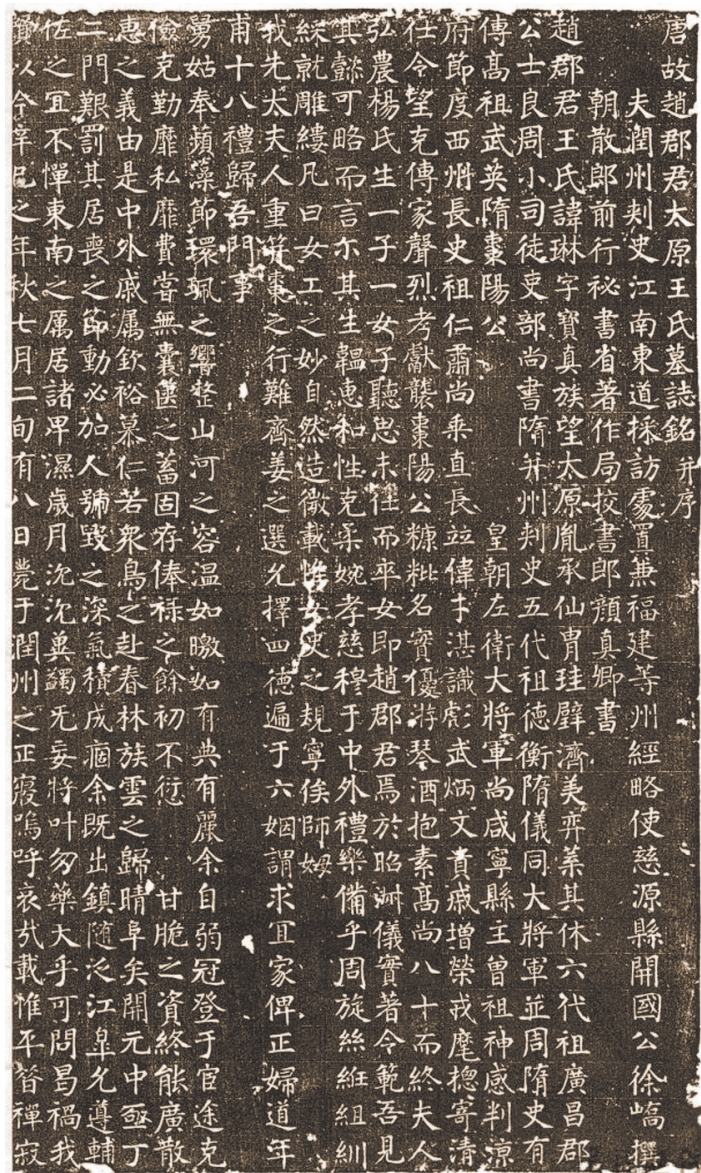
《颜勤礼碑》是颜真卿书法进入完全成熟时期的楷书代表作品，后世评之为：笔法纯熟，端庄伟岸，雍容雄秀，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所谓“颜筋柳骨”之“颜筋”在此碑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此碑是颜真卿晚年精品，已完全脱去了初唐楷法的体态。此碑结字端庄，宽润疏朗，气势雄强，骨架开阔，方形外拓，横细竖粗非常鲜明，方圆转折的笔法清晰。由于入土较早，残剥损毁少，又未经后人修刻剔剝，所以能比较准确地体现颜书宽绰、厚重、挺拔、坚韧的风神。

首先，在笔法上，颜真卿改变了初唐王派书家注重运指，风格轻盈秀丽，以瘦硬取胜的特色，加大了腕力的运用，突出一个“筋”字，为范仲淹所说的“颜筋”。这样颜字就取得了“力透纸背”的效果，表现出了书法艺术的“力量”美。苏东坡对此作了更贴切的说明：“鲁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颜真卿又吸收了篆、隶中锋用笔和藏锋逆入的特点，将此化入楷书。而且“折叉股”、“屋漏痕”、“印印泥”、“锥画沙”等笔法都体现在他的书法作品之

中，写出了独具特色的“蚕头燕尾”的颜楷，丰腴劲健，端庄雄伟，“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另外颜楷用笔横轻竖重，主次有别，气度不凡，使颜字具有一种人为的浮雕艺术效果，颇具特色。

其次在结构上，颜真卿改变了王派书家大多左紧右舒、左低右高、右肩稍耸、字形微侧之势，灵便洒脱之姿。吸收了篆、隶正面取势，浑圆壮重的特色，笔画端平，左右对称，字字都以正面形象示人。改王派楷书的相背为相向，重点的竖画写得略带圆弧形，如饱满待发的强弩，包含了巨大的弹力，使整个字的结构更加圆紧浑厚而富于内在的劲力。在章法布局上，王派书法字小而行宽，具有宽舒静穆之感，犹如一首情深意长的抒情小调；颜体楷书却与此相反，行距缩小，全篇布局具有充实茂密之致，字里行间洋溢着充沛的气势，浑然一体，密不可拆，像一组雄壮高亢的交响曲。

全面考察颜真卿楷书形成的过程不难发现，它确实是一步一步逐渐演变完成的。从32岁所写《王琳墓志》，严谨的格调、重法的理念、循规蹈矩的品质、恪守传统的手法使我们体味到什么是对书法持有绝对信念的态度。到42岁《郭虚己墓志》正处在他的楷书转型期。两年之后44岁时书写的《多宝塔碑》脱出初唐之轨辙，自立一家面目。到《颜勤礼碑》出世，颜真卿书法进入完全成熟时期，后世评之为：笔法纯熟，端庄伟岸，雍容雄秀，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



抗战期间全国汇集山东根据地的干部名录（四）

1940年1月抗大一分校到山东的干部

1939年11月上旬，中央军委下达关于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由晋东南迁往山东的命令。同时任命周纯全为校长，韦国清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长，李培南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出发前，朱德总司令听取了第一分校的汇报，彭德怀副总司令接见了第一分校全体干部。1940年1月5日，第一分校到达山东沂南县孙祖乡。到达山东的第一分校干部有（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冬（女）、于宁、马骏驰、马淑亮、马兴隆、王杰、王玲（女）、王根、王贤、王晓、王虹（女）、王水、王洵、王一萍、王大兴、王千祥、王广福、王文倩、王玉琪、王有守、王芳名、王方名、王央公、王永敬、王洪迟、王怀深、王泮清、王茂德、王奎先、王贤桂、王耕今、王崇理、王承骏（王久鸣）、韦国清、闫捷三、公孙萍、公谭开云、卞卜、毛鹏云、方炽、方宗仁、方定辰、邓鄂、邓泰山、邓乃觉、孔东平（孔迈）、孔繁洲、尹健、尹锡珍（女）、艾力、东鲁、石峰、石理朝、叶荫庭、叶尚志、叶少桥、田一亩、史达、冉虹、白彦、白英和、白桦、包慧（女）、冯史安、冯一战、司迎旭、司东初、邢路、毕达、乔财、乔守愚、乔志学、朱林、朱显辉、朱友生、朱绍武、任鸿泽、任洪泽、伊文（钱一文）、伊洪、向光、向进、刘抗（女）、刘刚、刘万年、刘也凡（尚炜）、刘宗卓、刘希泌、刘浩天、刘岐山、刘智远、刘顺安、刘祖靖、刘建国、刘佩常、刘毓江、齐德、江枫、江学斌、汤任庵、汤仁庵（女）、安田心、安征夫、安鼎铭、关兴林、许国强、许浪旋、阮途、阮若珊（女）、孙红、孙萍、孙敏（女）、孙启贵、孙培琦、孙振钰、孙殿甲、杜平斋、杜重山、杨震、杨霖、杨戩、杨大易、杨文山、杨光明、杨定华、杨廷昌、杨英树、杨德轩、杨德明、芦迪、苏庄、苏伟（女）、苏羽、苏影（女）、苏松亭、李林、李宁、李农、李民、李凝、李书厢、李绍桥、李达孔、李士清、李广祥、李久胜、李文轩、李立知、李志和、李克纯、李宗淮、李永淮、李洪茂、李采璋、李唯一、李挽伦、李厚坤、李振邦、李琼美、严光、严政、严似海、肖云、肖维（魏树槐）、吴毅、吴大成、吴天仁、吴舟平、吴泰如、何侠、何达文、何止了休、余克勤、余松若、季光、谷红（毕御书）、邹起、闵鸿文、冷新华、汪德（王德）、沙洪、沈默予、宋光、宋锡纯、张力、张奋、张明（苏牧）、张达、张骏、张鲁、张勤（张芹）、张霞（女）、张乃芳、张世英、张仲班、张克非、张克彬、张宝堂、张洪书、张致善、张德胜、张致忠、张志涛（张灵）、张培荣、张联库、陈奋（女）、陈灼、陈彤（女）、陈前、陈旭（丁琦）、陈耶、陈去非（陈文奎）、陈久安、陈文高、陈田心、陈华堂、陈羽

逵、陈建刚、陈美藻、陈国璋、陈树仁、陈德先、邵黎（女）、林立（女）、范希才、范传钧（范大因）、郁永言、欧阳挺、卓辛、明昌学、罗文、罗针、罗高、罗义淮、罗伟民、罗庞焕、罗绍卿、罗野岗、岳英、金明、金大力、周贤、周文茂、周政奇、周其章、周纯全、周湘帆、庞焕、郑文、郑大林、郑文卿、郑为之、郑亦贵、郑志生、怡然、官宗礼、房定辰、柳夷、柳逸、胡敬、胡成放（胡呈芳）、胡虹江、胡阴波、郝云虹、郝龙、郭兴林、郭绍仪、郭景成、茹夫一、赵增（赵曾）、赵广恩、赵立苍、赵文学、赵志坚、赵拓真、赵德坤、赵欲樵、钟光堤、钟有煌、侯炳鑫、侯炳章、闻允志、洪波、洪国治、洛林、姜昆、姜斌、姜达生、姜殿富、姚天纵、贺任、贺涤塵、秦诚、秦思平、袁驼、袁以群、袁成隆、贾尤、贾自让、贾若瑜、钱一文、钱抵千、钱春华、徐行、徐峰、徐子荣、徐洪才、徐国夫、殷永胡、高继昌、高磐九、唐廷治、陶彝、黄磷、黄东峰、黄经琛、黄球辉、黄惠芝、黄锡珍、曹辰力、曹洪智、曹秉痕、曹国珍、常振誉、章柯、章连奎、章孤鸿（天外孤鸿）、康彬、梁柱、梁占桂、梁寿山、梁唐晋、韩忠、韩斧、彭圣西、彭金梅（女）、彭旺锡、彭敬夫、彭楚雄、彭德辉、董桂、董金梁、程克、程坦、傅泉、鲁突、曾学纯、楼岱、赖光勋、雷殿远、路光景、詹道吉、窦占玉、蔡奋、蔡光济、廖习仗、廖海光、廖鼎林、谭平川、谭海君（谭松平）黎园、黎元哲、黎有章、颜红、潘人美、潘伯黎、藏杰、戴朋、戴文贤、魏微、魏树环、魏鼎源。

1941—1942年从延安到山东的干部

1941年3月，中共中央从延安的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军政学院、荣军学校，抽调了60多名干部，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其中多半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也有不少抗战初期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干部，还有在平型关等战斗中受伤后在荣军学校学习和休养，伤愈后重返前线的同志。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胡耀邦代表组织指定熊飞为这支东进干部队的队长，欧阳平为政委，赵锡纯为副队长。出发前进行了20多天集训，朱德总司令和曾在山东工作的徐向前，张经武首长，给大家作了报告。这批干部从1941年4月14日出发，越过敌人重重封锁线，走了一年，于1942年到达沂蒙山区。他们这一队出发后，丁秋生又率领一批干部，在途中赶上了他们，一同到达山东。

1984年，欧阳平与熊飞等十几位同志共同回忆，整理出这批60多位同志的名单；曾刊载于1984年第二期《山东党史资料》上，现将这一名单刊载如下：

分配到鲁中区的干部：熊飞、欧阳平、赵锡纯、张海棠、柯邦坤、陈殿元、黄华龙、方明胜、陈德政、刘冠林、陈彪、黄志成、严明、陈启胜、赵得胜、杨甦、杨荫树、李仲久、赵怀玉、石极、贺苏龙、胡桂兰（女）、杨云珍（女）、李剑（女）

到胶东区的干部：朱玉山、张富华、杨家华、全兆瑞、李佐长、钟光国、刘耀宗、何凤池、陈桂林、胡福全、宋惠、于仲淑、李大林、巫金锋（从八路军总部来）、于仲升、秦云、陈政才、侯正芳（女）。

到渤海区的干部：刘国英、牟汉光、范玉荣

到滨海区的干部：李自厚、黄立寿

到湖西区的干部：王子标、杨作磊、林静（女）

到山东分局的干部：刘华南

另外：胡明、赵家齐、伍成都、董玉明、马法廷、王登高、安胜军、刘子明、刘秀清（女）、段××，不清楚分配到什么地区工作。还有途中饲养员刘树林，分配到鲁中区，勤务员徐福贵，分配到山东军区司令部，勤务员陈泽进，不知分配到何处工作。

姓氏百家漫谈——周姓 (上)

赵丹峰

一、周姓源流

作为中华大姓，周氏得姓有两大特点：一是历史悠久；二是族群构成多元。早在远古时的黄帝时代，就有两位叫周昌、周书的将臣。殷商时，还有一位太史名周祉。但如果细检古代姓氏诸典和一批代表性谱牒，我们便可得出如下结论：上述先贤所传后人，只是周姓这一庞大族群中较小的构成单元，而如今周氏族群的构成主体，主要源自姬姓。《元和姓纂》云：“周：帝尝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文王以国为氏。”后稷因喜农事，被时人誉为“农神”。其裔孙古公亶父（即周太王）为狄所逼，率其族人自邠迁至今陕西岐山下的周原，其部族遂以周为号，称为周族。该族以姬为姓，逐渐发展壮大。到太王的曾孙姬



发（即周武王）时，周族便联合其他部族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公元前256年，周朝为秦所灭，周王室族人便迁于今河南临汝西北居住。为怀念故国，遂改姬姓为周姓，后经过漫长时间的繁衍发展，成为当今周姓的主源。除此之外，还有几支周姓族支与姬姓（周朝）有着血缘关系：一是出自姬烈。姬烈系周平王之子，被封于汝南（今属河南），其后裔因系周朝帝王之胄，故时人称其为“周家”。二是出自周公黑肩。东周庄王时，周公姬旦的后裔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改立王子克，此事不慎败露后，黑肩被除，其后人亦称为周氏。三是因避帝讳而改姓。唐代玄宗时，原本姓姬的一大批臣民因其姓氏与唐玄宗李隆基名字中的“基”字同音，遂奉命集体改姓为周。

当今的周氏族群，除以上数支以姬姓（周朝）为其主源外，还有一些由他姓而改为周氏者，如：南北朝时，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次兄普，在孝文帝元宏时改姓为周。同期，鲜卑族复姓贺鲁氏自文帝迁都洛阳后，亦改为周姓。元代，有位原名苏卓周的武将改姓为周，人称该支周姓族人为武功周氏。在当代少数民族中，亦有不少以周为其姓氏的居民。

二、周氏郡望与堂号

周氏族群历史悠久，在其繁衍发展中形成了诸多郡望，较著名者有：汝南周氏、庐江周氏、寻阳周氏、临川周氏、陈留周氏、沛国周氏、泰山周氏、河南周氏等，其中尤以汝南周氏和陈留周氏为显。

周氏族群堂号众多，由于出自周王室之后，周氏族人崇尚忠孝廉爱仁义，故而周氏的众多堂号多以此取名，如：濂溪堂、爱莲堂、植莲堂、清白堂、忠厚堂等。周姓堂号中多带“濂（莲）”字，其个中缘由与宋代哲学家、文学家周敦颐有关。他生于道州濂溪（今属湖南道县），后长居庐山莲花峰下，山下有一泓溪水，颇似其故乡的濂溪，遂于此处建一书堂，取名“濂溪书堂”，用于讲学授徒。此后以“濂溪”命名的书院遂在各地相继建立。久之，“濂溪”一词亦演化成为周氏族群的通用代称。此外，带“濂”字的周氏堂号还与周敦颐的一篇著名散文《爱莲说》有关：文中，作者以凝练而优美的文笔，赞扬了莲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品格，表白了自己高洁正直的人生价值观，受到了当时与后世国人的广泛赞扬与认同。于是，“爱莲”、“植莲”、“清白”等周姓堂号遂应运而生，成为这个族群有别于其他姓氏的标志性人生哲学符号。

三、族群繁衍与分布

周姓发源于今陕西渭河流域，秦、汉时期，该族群主要在今河南、陕西一带繁衍生息。东汉时，为避京师董卓之乱，周氏有一批族人迁往安徽居住。西晋永嘉之乱后，与中原地区的其他望族一样，周氏族人开始渡江南迁，分居于今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唐末，周氏族人开始前往江西、福建等地。至宋元，周氏已广布于南方诸省。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一批居于广东、福建的周氏人士开始迁至台湾，后来又有不少人开始下南洋谋生，成为今日东南亚地区周氏华人的先祖。

在当代中国，周氏居民总人口为2500余万人，在国内姓氏排名中，居于第九位。

四、周姓名人述略

作为中华大姓，周氏族群中先后走出了众多彪炳史册的名人，现择要述之：

汉代，周勃和周亚夫父子二人功勋卓著，名垂千秋。周勃出身于草根，少时以编织薄曲（蚕具）为生计。因善吹箫，遂常参加吹鼓乐队，帮他人料理丧事，以资家用。秦



周勃画像



周亚夫画像

末，随刘邦举义于沛（今江苏沛县）。在推翻秦王朝及日后的楚汉之争中，周勃所部常被作为禁旅前锋，所向披靡，屡建功勋，先为将军，后封绛侯。汉朝立国后，又随刘邦平定韩王信、陈豨和卢绾的叛乱，为刘汉政权的稳定再立勋劳。高祖临死前，吕后询问丞相人选，刘邦认为，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惠帝刘盈即位，周勃以列侯辅佐惠帝，后任太尉。周勃不仅武能安邦，而且善于谋断大事。吕后称制后，欲封吕氏族人，此议一出，即遭到右丞相王陵的反对：“高帝在世时，曾杀白马与群臣歃血盟誓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如今太后要晋封诸吕为王侯，是违反先帝当年与众臣所定盟约的。”吕后听后甚不高兴，又问左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没料到二人竟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当年高帝平定天下后封刘氏诸子弟为王；今太后称制，分封诸吕子弟为王，并无不可之处。”朝议结束后，当王陵责怪陈平、周勃为了讨好吕后而违背当年盟约，日后将无颜去见先帝时，陈平和周勃便郑重地对王陵说：“现在于朝堂之上敢于当面反驳太后，我二人确实不如您，可将来保全社稷，定刘氏天下而不更易，您亦不如我二人。”不久，吕后便任命王陵为皇帝的太傅，实际上剥夺了其丞相实权。王陵于是称病，遂被免职归家。实际上，陈平、周勃和王陵在事关社稷长久安宁方面的政治见解是相同的，陈、周二人之所以在朝堂之上，对吕后欲封诸吕之议采取了“口是心非”的态度，其实是在隐忍等待历史时机，表现出的实则是善于把握事物变化客观规律、以求最佳结果的政治大谋略、大智慧。公元前180年夏，执掌朝政的吕后病逝。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周勃和陈平挺身而出，联合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等宗室重臣发难。周勃手持皇帝玉玺，入北军号召将士拥护刘氏，解除了吕禄的兵权，继而又消灭掌控南军、占据未央宫的吕产，迅速平定了诸吕之乱，史称“周勃安刘”。之后，又迎立代王刘恒登基，是为汉文帝。文帝即位后，周勃升为右丞相。从文帝至景帝，经过70年放权让利式的变革，中国出现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建成后的第一个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历史时期，史称“文景之治”。而文景盛世的出现，与“周勃安刘”有着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

周亚夫系周勃次子，西汉名将。他熟读兵书，智勇双全。因其兄杀人被处死，故得嗣爵，被封为条侯。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兴兵进犯上郡、云中，京都长安告警。时任河内（治所在怀县）太守的周亚夫被任为将军，率所部驻扎细柳（今陕西咸阳

西南渭河北岸），以备胡患。驻细柳期间，周亚夫严整军纪，加强训练，使所部将士军心凝聚，素质精良。一日，汉文帝为鼓舞斗志，亲往细柳劳军。至军营大门时，甲士戒备森严，皇帝一行被阻挡于门外而不得入内，文帝便派随行官员手持符节诏于周亚夫，亚夫见符节后，方令军士打开壁门，请皇帝按辔徐行而入，周亚夫遂以军礼见驾。文帝对周亚夫治军严整之举大为赞誉，称其为“真将军”。不久，文帝将周亚夫迁升为中尉，专司京城治安。从此，周亚夫治军严明的故事便被广为传颂，后人因此称军营纪律严明者为“细柳营”。上世纪二十年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发生过一桩与细柳营有关的轶事：共产党员叶挺治军有方，作战勇猛，在国民革命军中闻名遐迩。叶挺结婚时，一度想拉拢叶挺的蒋介石，便特地书写了一付贺联相赠志喜，联文曰：“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其典即出自当年周亚夫军细柳之故。汉景帝刘启即位后，周亚夫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周亚夫的历史贡献，在于他为保社稷一统而一举平定“七国之乱”。公元前154年，为防诸侯势力坐大而危及中央集权的统治，汉景帝采纳时任御史大夫晁错的“削藩”建议（即呈给景帝的《削藩策》），借故先后削掉了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刘卬的6个县。当朝廷要削夺吴国会稽郡和豫章郡的诏书一到，吴王刘濞（系高祖兄长刘仲之子，据有江东53县，为诸侯王中势力最强者）随即打出“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号召各地诸侯国起兵。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纷纷响应，“七国之乱”于是爆发。消息传到京城长安，一时朝野震动。景帝于危难之时，升周亚夫为太尉，由其率军平叛。周亚夫不仅是一位武艺高强的骁将，而且是一位善于谋划的军事战略家。他认为目前叛军正值勇悍势盛，与其正面交锋难以取胜，遂审时度势，提出并实施了先弃梁国（今河南商丘及安徽碭山一带）之地，尔后断绝吴楚叛军粮道的作战方略，并在战争进行过程中，适时采纳了赵涉建议，率军经蓝田出武关，避开吴楚伏兵，迅速控制了洛阳军械库，从而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由于周亚夫指挥得当，加之民心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所以只用三个月时间，即彻底平定了此次“七国之乱”。平叛结束后，景帝遂趁机收回了各诸侯王国的权力，使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周亚夫作为平叛的主帅，被迁任丞相。周勃、周亚夫父子二人有着基本相同的壮举：他们父子均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为社稷安定、国家一统立下殊勋，并皆因此而出将入相，由太尉晋升为丞相；但父子二人的结局均黯然悲寥：周勃后被诬告谋反而下狱，虽不久即得赦免，但未再受到重用，之后抑郁而终。而周亚夫则因其子私买御物，遭牵连而下狱，当廷尉逼他供认谋反时，亚夫不服，性情耿介的他遂绝食以明志，五日后吐血而歿。父子二人虽皆为朝廷立下盖世伟功，但终究没能逃脱“伴君如伴虎”的悲惨结局。

三国时期，周氏族中出了位家喻户晓的儒将，他就是东吴前部大都督周瑜。周瑜，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公元175年生。周氏家世官宦，乃当地名门望族。孙坚在率部进军中原时，其长子孙策随家人徙居舒县，与周瑜相识，同年出生的孙策和周瑜朝夕相处，遂成少年挚友。后来，原属袁术部从的孙坚战死后，孙策决计趁群雄逐鹿中原时，抢先开辟尚属空虚地带的江南。孙策此举得到了周瑜的鼎力支持：周瑜借助其舅父丹阳太守周尚的势力，率军并携带大批粮秣赴历阳迎接孙策，使孙策的实力得到空前增强。之后，周瑜助孙策一一灭掉江东地区的原有割据势力，奠定了孙氏统据江南的基础。周瑜被孙策任为建威中郎将时，年仅24岁，吴中皆呼其为“周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死，作为孙策莫逆之交的周瑜又与张昭一起，辅佐年仅19岁的孙策之弟孙权继承江东权位，使之成为新的东吴之主。孙权即位后，周瑜任前部大都督。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取荆州后沿江东下，写信给孙权说：“我奉天子之命，讨伐罪逆，旌麾南指，刘琮降服。如今我率领水军八十万众，将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将此信示与群属看后，众人莫不震惊失色，张昭等众臣认为曹强吴弱，力量悬殊太大，故而多力主迎降于操。危难之际，唯有周瑜与鲁肃坚决主战。周瑜认为：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之后

患；曹操舍鞍马而仗舟楫，与我吴越争衡。现正值严冬，战马缺少草料。而且中原军士远途跋涉至江湖地区，定会因不服水土而得疾病。以上诸条皆为用兵之大忌。曹操却冒险行事，不是给了主公您破曹擒贼的良机吗？孙权一向敬重周瑜，周瑜对战局的精辟分析，最终促成了孙权与曹操决战的决心，并采纳周瑜和鲁肃的建议，联合刘备，共同抗曹，迅派周瑜等统领3万水军，与先期到达东吴游说孙权抗曹的诸葛亮一起，至樊口与刘备会和，尔后逆水而上，行至赤壁（即今湖北武汉市赤矶山），与曹军相遇。此时曹军中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曹军不利，曹操遂将部队引次江北驻扎，周瑜则把战船停靠于南岸赤壁一侧，两军彼此对峙。曹军多北方人士，不习船上生活，曹操乃下令用铁索将战船连锁在一起，以减轻风浪颠簸。周瑜部将黄盖遂提出火攻曹军的建议。周瑜认为此建议甚好，遂令黄盖以降计接近曹军战船。时值隆冬，多刮北风，按说居于江南岸的吴军无法对曹军实施火攻。但按气象规律，数日严寒过后，亦常有稍暖之日，风向亦可由北转为东风或南风。果然天有不测风云：十一月十二日甲子日这天天晴稍暖，傍晚后，风向忽然由北风转为东南风。至午夜东南风愈刮愈大，周瑜遂命黄盖将事先备好的载满芦荻（已浇浸油脂）的十艘蒙冲斗舰驶向江北。船借风力，快如离弦之箭。曹军朦胧中见南边有船驶来，以为是黄盖来降，故毫无戒备。待离曹舰不足二里之遥时，黄盖下令点火，被点燃的蒙冲斗舰宛若十条翻滚的火龙直扑曹船，连在一起的曹船顿时被燃起火，因无法散开，转瞬间便在冲天烈焰中化为灰烬。大火顺风势蔓延至岸上大营，江北岸上顿时烈焰张天，曹军被烧死、溺毙者不计其数。周瑜等遂率东吴精锐擂鼓大进，刘备亦自蜀山向乌林进发，盟军水陆并进，大败曹军。此役，孙刘联军扬水战之长，巧施火攻，从而战胜了兵力十数倍于己的曹军，成为古今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周瑜作为赤壁之战中东吴军队的主帅，由此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家的地位，受到历代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广泛赞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用酣畅淋漓的神来之笔，将周瑜风流倜傥、雄才大略的儒将形象，定格于历史长廊的群英壁上。周瑜不仅是一位善谋韬略的杰出军事家，还是一位精通音律的声乐大家。相传有一次周瑜于醉酒之后听乐曲，当乐师弹错了一个音符时，周瑜便抬头看了乐师一眼。故时人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说。

需要提及的是，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周瑜被描写成了一位虽有文韬武略，但却心胸狭窄的人物。一句“既生瑜，何生亮”的台词，成了周瑜嫉贤妒能的性格符号，并说周瑜是被诸葛亮气死的。文艺作品的宣传力量是巨大的，自此之后，众口相传，多数国人竟信以为真。其实，历史上的周瑜是一位颇富雅量气度的豁达君子。当年鲁肃仅率百余人随周瑜投东吴，初时不受重用，欲返江北故乡，正是周瑜识其才华，为了东吴的发展大业，他劝说鲁肃留下，并向孙权力荐鲁肃，说鲁肃可以辅佐王业，对这类人才不仅要留住重用，而且还要多延聘一批有用之才，方可成就霸业。孙权听了周瑜的建议之后，便立即召见鲁肃，鲁肃遂向孙权提出了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进而控制长江流域，创建帝王伟业的方略。从此，鲁肃受到孙权的器重，在日后的东吴建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例足可证明，周瑜是一位唯贤是举、胸襟宏阔的大政治家，与小说和戏曲作品中所描写与塑造的艺术形象相去甚远。故《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性度恢廓”。连效身曹营的蒋干，向曹操汇报他当说客未果时，也称誉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能间也。”至于周瑜是被诸葛亮气死之说，更是有悖于历史事实：赤壁之战后，曹操命曹仁驻守南郡（今湖北江陵）。周瑜和程普则乘胜进军，与曹仁所部隔江相对。当周瑜命甘宁开赴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时，曹仁遂分兵将孤军深入的甘宁包围。周瑜闻讯后亲率人马驰援解围，使甘宁部脱险。但周瑜却在亲临敌阵时，右肋不幸为流矢射穿，遂归还大营。曹仁闻知周瑜伤重卧床后，随即率军进攻东吴大营。周瑜为稳定军心，蒙蔽曹仁，便勉强



周瑜在赤壁

披甲，亲到军营鼓舞士气。曹仁得知周瑜无恙的消息后，便立即撤军。公元210年，周瑜为扩张东吴势力范围，向孙权建言：应审时度势，西取益州，合并张鲁，联手马超，进而图谋中原。孙权认为此议甚佳，遂命周瑜与奋威将军孙瑜一起率军西进。然天不遂人愿，当周瑜行至巴丘（今湖南岳阳）时，不料箭疮复发，乃卒于征途，年仅36岁。周瑜在临终前遗书孙权，建议以鲁肃递补已位。噩耗传来，孙权悲痛欲绝，亲至芜湖迎接周瑜灵柩。至建邺（今南京）后，孙权身着素装，率群臣为周瑜发丧送终。由此可见，周瑜之死与诸葛亮毫无关系。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作此描述，意在将周瑜作为一个陪衬，以烘托诸葛亮的机智大气，所以才违背历史真实，作了如上“艺术性”的杜撰。如此一来，诸葛亮的形象确实得到了升华，但作为一代智勇气宏的名将周瑜，其人格却因此受到了人为地扭曲和损污。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对儿童的启蒙教育。说起儿童的启蒙课本，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千字文》。它的作者亦是一位周姓贤达，他就是南朝梁的周兴嗣。《千字文》的问世，还与东晋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有关：祖籍兰陵（今临沂市兰陵县）的梁武帝萧衍，极为推崇王羲之的书法，称其“字势雄逸，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梁武帝为教诸王子书法，让人从王羲之的书作中拓出了一千个不同的字，每字一张纸。而后命时任散骑常侍的周兴嗣将一千字编成250句的四言韵语，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这就是日后广为流传的《千字文》。周兴嗣颇具文才与渊博的学识，领帝命后，即竭尽全力构思撰文。要将这一千个已选定的王羲之的字，选构组合成韵文，回旋的余地极小，难度可想而知。周兴嗣不负君命，竟一夜成文。然由于极度劳累，致使周兴嗣一夜鬓发皆白。《独异志》记述此事时说，周兴嗣撰成《千字文》后，“归而两目俱丧，及死，开视之，心如掬燥泥。”为了撰成《千字文》，周兴嗣竟至鬓白、目盲、心碎！《千字文》先时只供梁代宫中王子学习使用，至隋代，已开始在民间流传使用。由于其早于唐代的《三字经》和宋代的《百家姓》，故被推为中国儿童蒙书之冠。1500年来代不断章，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时至今日，仍是国内最为畅销的儿童读物。

从医年代的记忆与遗忘

——沈兆波三、五事

惠东波

1、记忆和遗忘，是伴随人一生的生理现象。常有人讲起此类故事：有科学家或教授下班会忘记回家的路，买东西忘记身上有没有钱，但在这同时，他却可以对自己研究领域的数百成千个数据脱口而出，或不用讲稿滔滔不绝上几个小时的课，保持着一贯的精准、严谨和确切。

可见，记忆和遗忘总是相互伴随的。

一位大作家为此说：“遗忘是记忆的最好伙伴。”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该忘的你就把它忘掉，该记的你也就记住了。

沈兆波似乎就是这样，又似乎不完全是这样。

2、沈兆波是临沂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是1997年的副主任医师，是2003年的主任医师，是神经科主任，是脑血管病诊疗中心主任，是市人民医院十佳医生、劳动模范，是临沂市卫生



系统先进个人，是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是从医31年的医生。

30多年不短了，都干了些什么难忘的事，举个例子说说？他答，整天忙忙碌碌，就干了一个医生该干的事，要说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例，肯定有，可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呢！

3、前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沈兆波正和同事们在医院忙着，一位农村老汉扛着一个足有5公斤以上的大南瓜，楼上楼下找沈主任，沈兆波忙去打招呼，见老汉流着汗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堆满了发自内心的笑，口头一再念叨着“谢谢沈主任，谢谢沈主任……”说是沈兆波给他开了花费很少的药，治好了他几年不除根的病，他感激呀，忘不了呀，这不自己种的南瓜熟了，摘了一个送来您尝尝，从蒙阴老家扛来的呢。

望着老汉，沈兆波无法不感动，他忙接下南瓜说，这个瓜我收下了，我一定不送人，一定自己吃。他觉得应该感谢的是这位老汉的质朴，多大的事还让他念念不忘，以至用自己的方式风尘仆仆地来表达？

送走老汉，沈兆波却一脸茫然：老汉什么时候来看的病？什么病？我开的什么药？好像有点印象又好像没有印象，心里直嘀咕。

4、沈兆波干了9年急诊，从2005年起任脑血管病诊疗中心主任。又是8年，记忆清晰甚至刻骨铭心的事和理，不计其数。神经科患者80%是脑血管病，数不清的病例在他脑海中却是定量的。凭着积累，他概括出脑梗塞为第一位，脑出血为第二位，分别约占75%和25%。二者发病时临床症状极其相似，在没有CT的年代里一般误诊率为30%。而对于他，凭着大脑中日积月累的沉淀，利用对大脑深处临床经验的快速翻阅，却可以把误诊率降到最低。

知识的沉积在适当时候总会产生智慧的火花。在应邀去莒南县人民医院的一次会诊中，沈兆波遇到一个脑干梗死病人，处于睁眼昏迷状态，既动不得也说不出，所有意思只靠眼球的转动来表达。他经过详细询问，全面分析临床表现，确定其为“闭锁综合症”。这种病非常罕见，病人家属将信将疑，又转诊济南。省级医院给予了同样的结论。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一个市级医院的大夫，也能够在千奇百怪的中风类型中，那么准确地给出判断，不由得竖起大拇指。

5、医生的自信，总是需要高超的医术支撑。在急诊室期间，一位值班医生向他紧急求援：一位中毒症状患者，出现严重心衰，而其家人都矢口否认有毒物接触。沈兆波仔细观察后，确认其为敌敌畏中毒，当机立断采取相应抢救方案。人救过来了，经过不厌其烦的激活患者的记忆，才得以真相大白：原来患者的上衣曾在劳作时遭敌敌畏污染，家人洗过后收了起来，隔了一段时间后患者又穿上这件衣服，在劳动中出汗，毒药吸收，造成中毒。

这一涉及人的宝贵生命的案例，在沈兆波头脑中超大容量的临床个案储存里，被记下了。

6、沈兆波从泰山医学院毕业后即从事神经内科专业，主攻脑血管疾病，先后在上海长征医院和北京协和医院进修，也是这个方向。然而，他却在急诊科一干就是9年。急诊科只有内、外科的大分类，他作为内科大夫，却会遇到各种情况，其特点一是涉及专业门类杂，再就是危重。

这些年，他似乎淡忘了自己的专业，牢记的却是病人的痛苦和求生的欲望，家属的焦急和信任的眼神，沉重的责任促使他聚精会神、心无旁骛。根据急诊经常接触到的中毒、急性心肌梗塞、脑梗死、脑出血等患者，孜孜以求地学习相关的抢救治疗技术，努力成为一个内科多面手。

7、在科室成为骨干，便不仅仅是值班，而且要“听班”——就是不值班期间，虽在家休息，但随时应值班医生所求，迅速返回医院处理危重患者。于是，沈兆波夜间休息时，习惯于把电话放在枕边，随时应声而起。作为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市的中心医院，

“听班”主任一夜无事几乎少见，多时每夜可达四五次。夫人往常早早起来揉着惺忪的眼睛，半真半假地责怪：你听班，我陪着睡不着觉，你们医院应该给以补偿吧。他总是歉意地一笑，匆匆做着上班前的准备。该上班时上班，听班的辛苦好像又被忘记了。

不仅仅这些。一天，几个久违的朋友见面了，自然约好晚上下班后一聚。久别重逢，大家高兴异常，端起酒杯，准备展开来聊聊近况，说说心情，谈谈见闻。可刚喝下一杯酒，电话响了，急诊室来了20多个亚硝酸盐中毒患者。他甚至来不及和朋友说明一下告别的理由，火速返院。他看到的是这群人一样的全身发青，嘴唇发紫，呼吸艰难。没有一刻犹豫，便立即制定抢救方案，紧急调度了几十个医生护士，集中器械为患者同时推维C美蓝。转眼天快亮了，病人们陆续脱离了危险，他才松了口气，朋友相聚和自己早退的情景在记忆中像没发生过一样了无痕迹。

8、沈兆波所在的是神经内科，自有清晰的界限划分。但国人却由于惯有的心理问题，把譬如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也归于神经内科，有很多此类病号也来寻医问药，面对这种局面，他没有一推了之，而是热情对待，沟通病情，从心理和生理的不同方面，努力为患者诊治。在这类患者中，经他手治疗有效或痊愈者不乏其人，而他对目前众多的抗抑郁药品也可以如数家珍。

有一位小有成就的房地产开发商因失眠和抑郁求医于他，他在认真观察和交流后，心中产生了不详的预感。在开出药品后，他背着患者告诉陪同人员，此病号有明显自杀倾向，一定要好好陪护，耐心开导，按时服药。几天后，不幸的消息传来，那位患者出差到北京时，跳楼自杀了！

这件事他再也忘不了，甚至有痛心疾首之感。他说他真想知道这是怎么了，如按期服药，该见效了；如认真陪护，该能觉察他的自杀意向，怎么就出了这个悲剧呢？

9、沈兆波觉得，自己有限的记忆，就应该用于临床经验的积累，用于知识构成的优化，用于对学科前沿的认知和探索。这些年，他先后开展了超早期静脉溶栓治疗急性脑梗死，超早期动脉选择性溶栓治疗急性脑梗死，脑动脉支架植入成型术，侧脑室引流及尿激酶治疗自发性脑室出血，早期应用呼吸机抢救重度有机磷中毒并呼吸衰竭等，还开展了经皮气管切开术，填补了临沂市的一项空白。他主持进行的“肌萎缩侧索硬化症F波和神经传导研究”，参与的“急性心肌梗死急诊溶栓与住院溶栓的对比研究、低钾性同期麻痹患者红细胞膜 $\text{Na}^+ - \text{K}^+ - \text{ATPase}$ 活性变化及相关因素研究”，均获得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已经成为临沂市医学科学发展史上的记忆，经过对大批青年骨干的悉心培养，成为绵绵不绝的集体记忆。

10、沈兆波有些记不住的工作与努力，却在科室发展中以物化或精神的方式被记载。他担任科主任后，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团队，像诲人不倦的导师为年轻同事传授着技艺，像和煦的春风以自己的行为默默地做出良好医德的表率，他所在的科室多次被评为院先进科室，2011年获得“山东省重点专科”称号。2005年，医院新设立脑血管病诊疗中心时，仅有20个床位，现在已发展到200多张床位，在全省市级医院中名列前茅。

11、30多年的从医生涯，所遇到的事情不可数计。沈兆波对此有些记不住，其实是不想记，完全顺其自然，但是却在有些人心里扎了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2011年6月初，市人民医院收到一封寄自日照市巨峰镇刘为兰家的感谢信。信是专为沈兆波主任写的，先是不惜篇幅叙述了刘为兰老人因患脑梗塞三次找沈主任看病的经历：

第一次，2008年秋，刘为兰在日照市某医院治疗17天没有改善，慕名而来，原文如下：“我们未曾找熟人，未曾找关系，和沈大夫未曾谋面，让我们感动的是，当天并不是沈大夫坐诊，当我们找到正在查病房的他说明来意时，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拿着他给我们开的300元的药回家……过了七天头疼和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老太太感叹：真神奇。”



第二次，2009年秋，刘为兰又感身体不适，信中写道：“我们再次去临沂市人民医院，直奔沈大夫，尽管不记得一年前我们曾找过他，沈大夫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开了药方……药到病症消失。老太太再次感叹：真是神医！”

第三次，2011年春天，刘为兰感觉头晕得厉害，几乎站立不稳，口舌麻木，就近寻医无效，信中描述：“无奈之下我们又来到临沂市人民医院，再次找到沈大夫，又是一副药，药到病除。老太太不断地夸：真是华佗再世。”

信的最后不无动容地写道：“这三次沈大夫也许并不记得我们，因为我们只是他千万个患者中的普通一员，但是每一次我们却能清晰的记得沈大夫那平易近人、和蔼善良的笑容。”

这封信里，患者家属三次提到沈大夫不认识、不记得他们了，但他们对沈大夫却清晰地记得，个中原因当然不言自明，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中得到了感悟并作了如下表达：

“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能有这样的医院，能有这样的科室，能有这样的大夫，实乃百姓之福。”

美好的记忆弥漫开来，便成了生活的美好。

12、在人的生命中，记忆与遗忘现象，是个生理科学问题。沈兆波的记忆与遗忘，不会脱离这个范畴，却让我们感到可以超出这个范畴。

他可能记不得多长时间没有和妻儿度周末了，但他肯定记得重点病号怎样治疗。

他可能记不得经过治疗已经痊愈的患者，但他却记得转院的患者，一定要搞清楚诊断结果和治疗效果。

他可能不记得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但是他记得：医学上基础东西不能丢啊，治病的硬功夫还要靠逐年积累啊！

……

关于白衣天使的责任与光荣，这或许也是一种体现方式。

试论徐建寅与中国近代兵法

徐 泓 包正义 顾敏立

一、引言

19世纪起，英国政府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入侵中国，从此，世界列强欺凌、侵略中国事件连续发生，殖民主义的幽灵驱之不散。中国人民要求富国强民是必然的。徐建寅就是那个时代爱国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

1866年7月，徐建寅随父亲徐寿由南京奉调上海江南制造局，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军事学著作。父子俩翻译引进西方书籍逾五百万字。

徐寿（1818—1884）字雪村，无锡人，著名科学家。他为中国近代科学、中国科学技术近代化鞠躬尽瘁，《锡山徐氏宗谱》载：曾国藩曰徐寿为“天下第一奇士”；李鸿章谓先生“讲究西学，实开吾华风气之先”；丁宝祯谓先生“杜门不出，于欧洲器物最精”；左宗棠称其“绝学无双”。

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著名科学家，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上占



右一徐寿
右三徐建寅

有重要位置。世人评价：“徐建寅堪称中国近代科学之父，中国科学技术近代化奠基人，中国近代海军战法之父，中国近代海军军事学主要奠基人。中国近代造船、造舰、造蒸汽机和军事工业奠基人，中国近代兵事业主要奠基人。”

“徐建寅堪称中国近代兵法之父，中国近代军事学奠基人。”

二、考察军制兵制

1875年10月（光绪元年九月），徐建寅离沪赴鲁，奉调创办山东机器局任总办。1879年6月，徐建寅告别山东机器局，被派驻德国二等参赞，赴欧洲订购定造两艘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

1885年7月3日，造毕竣工，滞留已久的两艘铁甲舰终于在溪耳港起航驶回中国。是年10月抵达大沽，两舰为北洋海军主力舰，“定远”号为旗舰。

1879年10月（光绪五年九月），徐建寅由吴淞口出洋，9月25日，途经新加坡逗留时，观看了英国炮台。徐建寅在其著《欧游杂录》书中记载称：“同苏委员、陈翻译号敬甫往观英国炮台。其制与所译《攻守制宜》所载相同，有外斜坡、子墙、外墙。”

光绪五年八月，徐建寅到达德国柏林，观看了德国炮台图，并调研了德国军制。他在《欧游杂录》书中写道：“二十二日（光绪五年十二月），与王牟得胜观炮台图。询以德军制，据称：凡民年至二十，即调充兵，操练三年（每民月饷十九马克，另给馒头），遣归为民，仍执本业。”

书中接着写道：“队长管二十五人，由民兵之操练精熟而自愿充当者挑补。既当此差，不遣归农，满二十年，方准告退，给以恩俸。如当差不满二十年而告退者，恩俸减少。此队长与所辖之兵同房寝食，严加管束，不率教育者可任意扑责；惟不能升作武官。合十队为一哨，共二百五十人，领以哨官一员、副哨官三员、哨长一名。此哨长亦由队长挑充，亦不能升作武官。盖武官必由武学堂正途出身，非比中国有营伍、军功二途，亦可荐升武官也。”

徐建寅还考察了军器博物院的理念和功能，并在书中详述制作过程。他在《欧游杂录》就考察德国军器博物馆记述说：“往观军器博物院。院系新近落成，墙壁内面尚在彩绘。楼屋三层，皆用环盖，不用横梁与楼板。环盖面上，皆用赛门敦石灰，嵌以小石块而磨光之，即为楼房内之地面。造此院之前，预作小样，与大院丝毫无异。小样彩绘，亦与大院壁面逼肖无差。先作墨笔小稿，以布置大局。再作墨笔大稿，尺寸与面壁所绘者同，以得神气。此大稿分开各段为之。再作小稿，加彩色以配合颜色。于是绘于壁面，照墨笔小稿之布置，又照墨笔分段大稿之神气。再加彩色小稿之颜色，以成全壁。院内排列旧式军器，及法国各城镇要隘之木样，其地面高低，房屋位置，皆与真同，无丝毫遗漏。使武官常往观之，可以熟悉地理。”

徐培根在《无锡徐寿徐建寅父子与中国之兵工业》中称，“先生（徐建寅）在德期间，遍访各国军事工业与造船各厂，搜集其精要图样与书籍、制造技术以及新式机器等……先生又以德国陆军优良，潜心加以学习，因译著《兵学新书》十六册，《测地捷法》一册，遂得尽窥德国陆军奥秘。”徐建寅在德国考察将制、兵制，步、骑、炮三兵种大操，以及对西方军事科学的关注和研究，为徐建寅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建立打下了基础。

1894年9月17日，日本海军在我国大东沟口外黄海海面与我国北洋海军发生海战，中国战败，震惊了朝廷，也震动了全国。

是年11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徐建寅，要他前往北洋查验船械、弹药，还面谕将海军一切情形，一并访察，回京禀报。归京后徐建寅任督办军务大臣公署章京（高级参谋）。1896年，徐建寅奉调赴福建船政局任提调。

三、撰写兵学兵法

兵学兵法是研究打仗之法，是研究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限度的胜利，战胜敌人之法。

徐建寅在福州船政局，用公余时间，博考中外群书，折中外各国兵家之长，撰《兵学新书》16卷（另有附卷），20余万字，插图100多幅，该书阐述了创立新兵学的主张，立议章，设学堂，讲兵学。



福州船政局

在《兵学新书》凡例中说：“泰西各国讲求兵学，久有成法，愈新而器械愈利，兵学愈精。其书有兵部之章程，有各家之著述，门类纷繁，新旧杂出，汗牛充栋，浩如渊海。欲取所长，折中一是，殆非易易。中国士子未讲求此学，古来兵书半多空谈，不切实用。戚氏纪效新书，虽述实事，而语焉不详，难以取法。”

《兵学新书》系采集各国军政，实事求是，择精语详。自募选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至军事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一切关于军者，无不绘图系说。时人称这部书“集近时兵学之大成”。该书揭西国新兵法之精理，分叙军制、训练、战法，尤其是对步、骑、炮三兵种合成战法的研究，成为创立中国近代军事理论体系之根本。

我国古代虽也有军事类书，那是在冷兵器作战情况下的总结。古代兵法难有作为，难以适应近代火药枪炮的战争。因此必须引进、研究各国“新法精理”，以创立新的军事学说。这个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新军诞生的时期。徐建寅著《兵学新书》，实为中国军事学上的一件大事。

徐建寅提出建立新的军事理论，必须进行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革。也就是他所指出的弊端。他主张在兵源、选将、通讯、训练乃至后勤供给诸方面进行更新或创立。他在《兵学新书》后序和凡例中指出了不愿讲兵学和轻视兵书、兵法的人。

有些人主张割地偿金换取和平。他指出，这种人“其割之地，系国家之版图，其所偿之金，系民间之脂膏……乐得慷他人之慨，大作人情，以图显达，并可以从中染指，而牟其利”。

也有人主张先富强后讲兵学，徐建寅指出：“中国积弱之名已布，四邻覬覦之心日亟，若必待人才学成而后致富，已富而后自强，是犹从容拯溺，揖让拒寇。”

清皇朝的兵制很是混乱。它由八旗兵（清廷贵族子弟）、绿营、乡勇等构成。各部门将弁，非亲即故。其兵源是召募而来，他们多数为丧失土地的农民、无业市民和游民，加上吏治和将弁的腐败，吃空额成风，几乎遍及清军。

清皇朝军制也存在许多弊病，如指挥系统混乱，各省大员自行其事，可谓“军制冗杂，事权分歧”；兵役制度陈腐，兵员长年用世袭制和募兵制，兵丁文化水平低，军纪涣散，极易溃败，“一经临阵，望风而遁”；将弁升荐，军官以行伍出身为主，多属旧式武夫，无法从事指挥近代火药枪炮战争；粮饷供应，军官层层克扣，兵丁挨饿；武器配置，没有章法，各自为政，武器新旧相杂，型号各异，配件短缺，临阵接战，如何对应；将弁不明列阵战法，兵丁缺之训练。如此种种，在战争中如何克敌制胜。

《清史稿·志·兵》称：光绪五年（1889年），左宗棠、杨昌浚疏言：“军兴未收制兵之效，由饷薄而额多，不能应时情，亟宜量减可裁之兵，以节饷需，即以所裁军饷加所留之兵，庶可再责其勤练。”

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上奏折，虽对清廷绿营腐败有评说，但却没有提出治理腐败的良策。

光绪一十七年（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奏汰绿营，言：“绿营官皆选补，兵皆土著，兵非弁之自招，弁非将之所亲信，既无恩义，自难铃束。以传舍之官，驭世业之兵，亦如州县之于吏役，欲其整饬变化，服教从风，此必无之事。沉绿将弁，薰染官习，官弁且不易教，况于兵乎！层层积弊，已入膏肓，既甚骄顽，又极疲弱，本难练成可用之兵，自非裁汰不可。”文中虽然道出了绿营将弁薰染官习之顽疾，却又主张“兵为弁自招，弁为将所亲信”。

徐建寅就此指出，“召募之法兴，而养兵之费钜，坐养年久，精壮渐变老羸，徒糜钜铜，一旦有事，常养之兵权归无用。”因此必须创立新的兵学，改革兵制、将制、兵法。

列强战胜中国的事例，列次统计表明，中国将领不懂兵法，敌军均用迂回我军侧后而得逞。这类惨痛的事件，血的教训，应当杜绝。因此徐建寅主张，“集中国有识之士，自行讲究兵学之精义，必不能训练兵士，使成劲旅也”。

徐建寅在《兵学新书》后序中，论述了用其军火，在乎人之精，讲兵学，乃为根本，军火之利，抑其末也。

“各国窥我兵学之未习，兵力之积弱，挟其所长，伺瑕抵隙，威力协制，割地攘利，纷纷扰扰，不可究诘。疆场兵将，摄其军火之威，望风奔溃，莫敢相抗。于是彼胆愈壮，彼气愈骄，直有非吞吸全尽不止不罢之概。我将士未讲兵学，误为彼兵之强，在其军火之利。牟利之徒，游说当轴出巨金以多购军火。殊不知用其军火，在乎人之精讲兵学，乃为根本，军火之利，抑其末也。”

《兵学新书》促进了我国军事学由古时向近代转型，实为中国近代兵学之基石。书的内容涉及到国际军事学的各个领域，诸多方面，谓“集近时兵学之大成”。论述西方军事学各领域，如兵源、选将、通讯、指挥、训练、供给保障等。该书涵盖了兵、骑、炮三种兵种及其合成作战诸多方面。该书系统又全面，具有实战性。

在《兵学新书》的凡例中，徐建寅提出：在战时挖沟墙，达攻守皆宜，遂“论挖筑沟墙，以明数十人至数万人防守攻取之法，以避枪炮弹子飞击伤人之惨。”他指出“铁路为战时所用，并列出了要求和规定，遂“论以铁路运兵之章程，及仓卒毁坏铁路，不资敌用，及攻城平行沟之小铁路，并军所用制造机器之大略。”此乃论述战时铁路的重要性。

古代战争往往是“两军相接勇者胜”，近代战争是“枪炮先施”，多兵种合成作战，有运兵、设防、布阵、进攻、退回等诸多要素。靠武艺和勇敢，且不明战法，必然会导致重大伤亡或败北。创立新兵学是近代战争的必须，是古代军事学向近代军事学转变的一个突破，是质的飞跃。是中国社会近代化，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和标志。

《兵学新书》是陆军军事学。包括步兵、马兵、炮兵三兵种。对全书的章节的安排，徐建寅写有概说：卷一为一旗初操，系哨队官长操兵之法，及一旗之制。卷二、卷三为一旗阵式及运用，系旗哨官长操兵之法，皆步兵也。盖战阵虽兼用步马炮三兵，而以步兵为之主。步兵又以一旗为始基，故详说焉。卷四为一营阵式及运用，系营旗官操兵之法，并及一营步兵之制。卷五为一军制阵式及运用，系统领分统布阵之法，示以进攻布置之程式以及军制，并总论用兵要诀。卷六为马兵列阵运用及马兵一旗一合营之制。卷七为炮兵，一旗先操，一炮之用法，次操六炮之走阵，以及运用之法，炮兵一旗之制。卷八之为步马炮合用之法，以及考证古来战争之要，并调度方略之用。卷九为挑民兵，集民饷之制，以每个壮丁二百人内挑一人为兵，即令壮丁二百人每日各出制钱一文，共得二百文，以公养一兵，国有养兵之费，民无苛敛之苦。次为教训官弁兵丁之制，使之品端学邃，皆成正人君子，各坚其忠君爱国之心。不必孳孳求富，而国用自足；不必纷纷培才，而人才自成。卷十为粮饷衣食之制，军市转运之法，使之军无缺乏，而士饱马腾，锐气常新。卷十一论枪炮军械，皆新法适用之件，其旧法粗笨及过于纤巧不适于实用者，皆置不录，以免鱼目混珠，徒乱人意之病。卷十二论挖筑沟墙，以明数十人至数万人防守攻取之法，以避枪炮弹子飞击伤人之惨。卷十三论行军旷野预备宿食之法，俾不受行役之苦。卷十四论造望台、筑通路以瞭远处而利遄行。卷十五论行军铁路造筑之法，因当今铁路为行军最要之事也。卷十六论以铁路运兵之章程，及仓卒毁坏铁路，不资敌用，及攻城平行沟之小铁路，并军中所用制造机器之大略。

徐建寅在欧洲曾仔细调查、考察西方的兵制，看到兵役制的优越性。他主张建立新的将制、兵制，建立新兵学；建立武备大学堂，精讲兵法。

改革兵制：废除八旗兵的世袭制和募兵制，而改成择兵制，“三年有成，遣散回家。”

改革将制：废除将领世袭制，改革选补将领采用冷兵器年代有武艺的“勇将猛夫”制。他主张仿效“德国将官首重学问”的做法。军队办事官、将领必须由武备大学堂毕业，不能沿用以营伍出身和军功为荐升军官标准。

《兵学新书》中，有多卷论述了粮饷、军械、药弹房、宿食等是军队的支撑。兵书卷十指出，在军事活动中，应做到“军无缺乏，而士饱马腾，锐气常新。”他强调“行军旷野预备宿食之法，俾不受行役之苦。”的特别重要性。此种论述，优于“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的程式。

《兵学新书》的面世，具有在中国军事学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意义。徐建寅堪称中国近代兵法之父，中国近代军事学奠基人。时称“人诵其著述，咸称救世奇士”。

1894年，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中方战败。北洋大臣李鸿章推动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创卖国条约之最，割地台湾、澎湖列岛等，严重破坏我国领土主权。又赔款二亿两，使我国财力大伤。日寇财力猛增，其侵华野心疯狂。

经过鸦片战争失败之耻，徐建寅在反对外国入侵中国的态度上，他在1879年出使德国旅欧考察时已有表述。徐建寅在《欧游杂录》中写道，往观德国军事博物馆时，“院内排列旧式军器，及法国各式城镇要隘之木样，其地面高低，房屋位置，皆与真同，无丝毫遗漏。使武官带往观之，可以熟悉地理。”此意既是告知彼方，己方随时准备打仗。具有威慑作用；军事博物馆对法国城镇要隘地形的展示，也具有实战意义。

此意还表明，敌我之战，仅仅把敌军拒在国门之外，是不够的。必须要克其进攻，一战成功，歼灭敌军；尤其要把战火引进敌方本土。既然是反侵略之战，就要进入敌国境内。然后，敌我谈判，我方撤兵，索取赔偿。则谓“横逆之来，非兵威不足以慑强暴”。

1900年，徐建寅受湖广总督张之洞再次邀请，来到武汉，“受委派鄂省营务总办兼任教吏武备总教习。”



徐建寅主张，将领首重学问，军队办事官和将领必须由武备大学堂毕业；不能沿用营伍出身和军功为荐升军官的标准。在治军方面，徐建寅特别强调军事训练和弁兵素质教育。

《兵学新书》卷五中说：“弁兵在兵房中每日训以立品爱国，使其尊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训以历代名将古来勇士之功业流芳史册，以励其效慕欣赏之心……，必言者历历如绘，听者娓娓怠倦。”

四、结束语

从兵书卷十一中，可以看到，徐建寅对枪炮军械的精良尤为关注。徐建寅是兵法学家又是武备专家。他深知，“保帮御侮，端在练兵。而非械无以制胜，械非药无以利用。是故有兵而械不精如无兵焉。有械而药弗良如无械焉。”所以徐建寅撰著兵书、兵法，试造枪炮，研制火炸药，造船、造舰，伴随建寅公的一生。

徐建寅断言，“欲图存，须自强，欲自强，须备战；备战必练兵，练兵必立法，非此不可为国。”徐建寅称，“横逆之来，非兵威不足以慑强暴，此乃《兵学新书》之所由作也。”此为徐建寅兵学之理念和思想。

如今，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已为社会所共识。科学精神是求实精神。崇尚实证是科学的首要特征。由此要求实验的可重要性和假说的可检验性。这一理念，备受学界推崇。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建寅所著《兵学新书》，堪称是中国近代兵法的滥觞，中国近代兵法理论的典范。



徐寿、徐建寅译著选

临沂市旧志考述 (下)

解修丽

3、郯城县志

郯城历代修志共有四种，其中有目无书者一种，为明万历年间纂修；存世者三种，皆为清代纂修。下面对这四种志书作简单介绍。

明万历年间，湖南长沙人颜若愚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任郯城县知县，纂《郯城县志》，教谕邱问礼主修。此志早佚，已无考。

清康熙年间，福建樵川人冯可参于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任郯城知县时始修县志，三韩人张三俊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任郯城县知县时《郯城县志》修成。笔者所见该志为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阅览室藏本，十卷，康熙十二年刻本。一函四册。版式为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半页9行，每行18字，小子双行同。卷首录有颜若愚、张世则等人撰旧志序，该志序有张三俊等撰，志跋为冯可参撰。图8幅。目录为：第一卷舆地志：沿革、星野、形胜、山川、景致；第二卷建置志：城池、公署、铺舍、驿传、坊牌、道路、津梁；第三卷户赋志：里社、户口、田土、赋税、徭役、驿寺、兵防、河防、土产、风俗；第四卷祀典志：文庙、坛塘、祠庙、寺观庵附；第五卷学校志：儒学、祭器、书籍附、社学、学田、文会所、射圃、义仓、养济院、漏泽院、官庄官牛；第六卷政教志：官师、名宦；第七卷人物志：乡贤、流寓、孝行、贞烈；第八卷选举志：科贡、荐举、例监、武备、封荫、省祭、恩例；第九卷杂稽志：古迹、灾祥；第十卷艺文志。此志为郯城县现存最早的志书。

据《（嘉庆）郯城县志》吴堵序云：“郯城县志始于前明万历十三年，知县颜若愚、教谕邱问礼同辑，续志创于清朝康熙八年知县冯可参，成于十二年张三俊。又续志稿创于五十年荆文康，成于五十五年知县魏敬胜，未刊行。”说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有修《郯城县志》，但仅为志稿，而未刊行，早佚，不可考，只在此提过。

清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直隶深泽人王植任郯城知县时，主持修纂《郯城县志》，志成后未刊行，仅见王植所撰序录于《（乾隆）郯城县志》。乾隆二十六年，直隶南皮县人张金城任郯城知县后，继王植续修郯城县志，乾隆二十八年成，十二卷，刊印并发行。卷首有山东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尹嘉铨、知县王植、知县张金城、邑人王恒等人撰序五篇，并录有明万历邑人张世则、明万历邑令颜若愚、清康熙邑令张三俊等人所撰旧志序三篇。其中郯城知县王植序先是简单阐述了



是时一些郡邑志书在体例、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对纂修郯城县志的情形也有比较详尽的记述。后有郯城县志纂修续修姓氏，卷首有例言八则，并有县图。

目录为：卷一恭纪巡幸；卷二輿地：星野、沿革、疆域、形势（八景附）、山川、沟渠、风俗；卷三编年，记事从周秦起至清朝；卷四建置：城池、公署、公所、驿递、乡社（市集会场附）、道路、桥梁、坊表、陵墓、古迹、兵防、墩台；卷五食货：户口、田赋、杂税、仓储、物产；卷六秩祀：庙坛、各祠、学校；卷七秩官：郡守、同知、知县、县丞、典史、教谕、训导、裁官、宦绩；卷八选举：辟荐、进士、举入、明经、贡例、武胄、武科、封赠、恩荫、省祭；卷九人物上：名贤、儒林、孝友、义烈、隐逸；卷十人物下：烈女；卷十一艺文：文、诗、赋；卷十二附余：杂记、寺庙。

此志共分十二门，内辖五十六目，参考旧志，续以近事。如卷二輿地志内山川、沟渠目详载本地水利设施建设情况。“江南邳、宿等邑皆受沐水之害。本朝康熙二十八年总河王新命奏请以竹络载石，筑坝堵御，水患始息……”其中山川目记录有康熙以来郯城地区在县境内的沐水、沂水、武河、涑河、燕子河、芙蓉河、白马河等处进行水利建设十余次，卷十一艺文志亦收录有总河王新命《筑禹王台石络告疏》一文，详细记述了沐水的水利建设情况，并对沐水的情形作了详细分析。艺文志还收有郯城知县王植《郯邑水利事稟牍》一文，该文详细分析了郯城县境内各河的水利状况，并针对防洪防涝提出了解决方案。其他诸门诸目，记人记事，亦多考证，可作为比较可信的参考资料。

此志有两个版本，一为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刻本，一为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张忠亮重印本。

《（嘉庆）郯城县志》为续《（乾隆）郯城县志》修，所以也称《续修郯城县志》。嘉庆十五年（1810）始修，同年修成刻板发行。10卷。版式为四周双边，白口，单黑鱼尾，半页10行，每行22、23字，小子双行。志前有时任郯城知县吴堦所撰序，记载了纂修志书的情形，卷首有凡例十则，列出了志书编纂时所遵从的标准。后有纂修姓氏。

目录为：第一卷巡幸志，记事从乾隆三十年（1765）始至嘉庆二年（1797）；第二卷田赋志，后附仓储和淤地；第三卷祭秩志；第四卷建置志；第五卷职官志，继前志所记而始记；第六卷选举志；第七卷人物志；第八卷烈女志；第九卷著述志，第十卷艺文志。

4、蒙阴县志

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山东地方志联合

目录》、《山东地方史志纵横谈》及《山东方志汇要》等文献统计，蒙阴县地区历代修志共有四种，其中有目无书者一种，为明代纂修；存世者三种，皆为清代纂修。

明万历年间，杜洽任蒙阴县知县时修《蒙阴县志》，然此志早已亡佚，仅据清《（宣统）蒙阴县志》沈黻清序载：“东蒙旧志创自前明杜君洽，沦于兵燹靡有事遗。”杜洽撰志序录于后志。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河南人屈逸乘任蒙阴知县，奉旨主修《蒙阴县志》，蒙邑岁贡王运升纂。此志继明万历志而作，当年修成梓行，共四卷。这是现存最早的蒙阴县志，已无完本。现存志目为卷之二选举、例监、吏目、恩荫、祀典、名宦、乡贤、兵防、要隘；卷之三艺文及补遗；卷之四杂诗。卷后有蒙邑岁贡王运升撰忠跋一篇。

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河北文安人监生刘德芳任蒙阴县知县，修《蒙阴县志》八卷。此志版式为四周双边，白口，单黑鱼尾，半页9行，每行20字，小子双行同。卷首有蒙阴县知县刘德芳撰志序。凡例十则。列图为四境图、城池图、县治图、学宫图、八景图。志目为：卷一封圻志：沿革、星野、乡社、集市、形势、道里、物产；建置志：城池、官署、仓库、兵防、桥梁、邮铺、坊表、恤政；赋役志：户口、人丁、地政、赋税、盐课、集课。卷二山川志：诸山、诸水、古迹、八景；学校志：儒学、武学、社学、书院；风俗志：古俗、近俗、时尚；祠祀志：祀典、寺观、陵墓。卷三职官志：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学职、巡检官；选举志：征辟、进士、举人、贡生、例监、赠封、恩荫、武科。卷四人物志：名猷、隐德、孝义、武功、流寓、方伎。卷五人物志：贞烈；艺文志：五言、书序、赋诗。卷六艺文志：碑记。卷七艺文志：疏引、古诗。卷八艺文志：律诗、绝句。杂稽志：祲祥、灾异、兵燹。卷后有松川渔人叶泽森撰跋一篇。

《（宣统）蒙阴县志》由知县沈黻清修，陈尚仁纂，清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刻成。卷前有沈黻清撰序，载：“东蒙旧志创自前明杜君洽，沦于兵燹靡有越予遗。康熙十四年，屈君逸乘始纂成书，越十年刘君德芳继起重修，迄今二百二十有五年，续辑无人，板籍顿没。黻清下车时仅拾得民间钞本，残缺不全，豕鱼莫辨，即拟增修。”志目为：卷一封圻志：沿革、星野、乡社、形胜、物产；建置志：城池、官署、仓库、兵防、邮铺、坊表、恤政；赋役志：户口、人丁、地亩、赋税、祭祀、盐课、杂课。卷二山川志：诸山、岭、谷、水、泉、古迹、附八景；学校志：儒学、乡贤祠、

先儒、名宦祠、忠义祠、乐器、乐章、学额、武学、社学、书院、社会。卷三风俗志：古俗、近俗、时尚；祠祀志：祀典、寺观、陵墓。卷四、卷五人物志：宦绩、名献、隐德、孝义、武功、流寓、方外、贞烈、节孝。卷六、卷七艺文志：五言、书、序、赋、辩、碑记、疏引、志传、详文。卷八杂稽志：祲祥、灾异、兵燹、外记。共十一门，内辖六十六目。此志体例严谨，门目分明，编次有序，内容详略得当。如卷四、卷五人物志所收录的人物大多有传记，精于考证。卷六艺文志之序收录有魏可简、屈逸乘、王运异、叶泽森、刘德芳等五人所撰旧志序跋六篇，为了解旧志情况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此志有四种版本，一为清宣统二年刻本，一为清宣统间抄本，一为民国间抄本，一为据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抄本晒印本。

5、沂水县志

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山东地方志联合目录》、《山东地方志纵横谈》及《山东方志汇要》等文献统计，沂水县历代修志共有三种，其中有目无书者一种，为明代纂修；存世者两种，皆为清代纂修。

明万历年间，蒙阴县人公鼐曾修《沂水县志》，但《沂水县志》只是稿本，未刊行。根据《（康熙）沂水县志》黄胪登序云：“县志始修于万历丙申蒙阴进士公鼐。”公鼐所撰志序收于《（道光）沂水县志》，但此志志稿已佚，不可考。

清康熙年间，黄胪登纂修《沂水县志》。黄胪登，福建龙溪人，举人，康熙十一年（公元1671年）任沂水县知县，修成《沂水县志》六卷，这是现存最早的沂水县志。版式为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半页9行，每行21字，小子双行同。卷首有知县黄胪登撰序。志目为卷一邑名、分野、封疆、山川、古迹、掌故、城池、险要；卷二为里社、市集、官署、儒学、祀典、驿递、铺舍、桥梁；卷三为仓储、田赋、户口、物产、风俗；卷四为职官、宦绩、科目、乡贤；卷五为孝行、节烈、祥异、寺观；卷六为艺文。此志平列篇目，记注简约。里社、田赋、户口、物产、风俗等类目内记明代村社编制、田粮赋税、人丁户口及民俗物产，是书中比较具有特色的部分，对于研究明代经济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道光七年，江苏丹徒人张燮任沂水知县时，主修《沂水县志》十卷，邑拔贡刘承谦纂。清道光七年刻成。志前有知县张燮撰序，并收录有明万历举人蒙阴人公鼐、清康熙沂水县知县黄胪登所撰旧志序两篇。县图三幅：疆域图、城郭图、学宫图。并有修志姓氏和凡例十二则。志目为：卷之一地輿：邑名、星野、沿革、疆

域、山川、险塞；卷之二輿地：古迹（附古迹考）、风俗、建置、城池、衙署、坛壝、仓储、里社、市集、桥梁、寺观；卷之三食货：田赋、户口（附存运额外）、蠲赐、恤政、盐法、物产；卷之四礼制：学校一（学宫、学额、学田、书籍、祭器、碑碣、附学基考）、学校二（社学、书院、义学、附试场）、秩祀；卷之五兵防：营汛、教场、军器、墩台、驿递、铺舍、职官、文职、戎秩、宦迹；卷之六仕进：征辟、进士、举人、贡士（副恩拔、岁优例）、考职；卷之七仕进：武科、武弁、事例、封典、荫典、人物、名献（仕绩、忠节、孝友、耆德、义士、经学、文学、隐逸）；卷之八人物：贞节（附贤孝）、坊表（附耆寿）、冢墓（附冢墓考）方伎；卷之九人物：坊表（附耆寿）、冢墓（附冢墓考）、方伎、方外、侨寓、纪事、掌故、详异；卷之十艺文：文、诗。后附沂水县知县所撰总记一篇。

此志体例严谨，熔裁旧志，博采近闻，记注周详，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志书輿地志内山川、古迹及礼制门内学校诸篇，考前志之疏漏错讹，补前志之未收，详明精审。艺文收载也较丰富，内不乏有价值之文献。如内载明代高名衡《更生吟并序》。高名衡，沂州人，明崇祯时任河南巡抚。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十五年，李自成起义军三次围攻河南开封，高名衡以巡抚身份率军与其对峙。事后，高名衡回忆所历战事，不禁惊叹“更生”，由此有《更生吟并序》。该诗记录了当时的战斗场面，为考证李自成起义军发动“开封之役”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



中国“摩擦学金奖”第一人： 薛群基

高雪萍



薛群基，1942年11月出生于沂南县，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1967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67年至今在中科院兰州化物所工作，先后任课题组长，研究室主任，1986—1998年任中科院兰州化物所副所长，1999—2003年任中科院兰州化物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长期从事特种润滑材料和摩擦化学的研究。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薛群基是我国材料化学和特种润滑材料领域主要的学术带头人之一，多年从事特种润滑材料及材料化学研究，他创建并领导的固体润滑重点实验室（1987—1999年担任实验室主任，1999年至今担任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在1992年、1997年、2003年和2008年连续4次在国家组织的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实验室。20年来，他主持参与或领导了兰州化物所高技术用特种润滑材料工作，为航天、航空登高技术国家重点工程研制提供了20余种关键的润滑材料及技术，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应用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薛群基在材料摩擦学、摩擦化学和新型材料的设计与制备方面有丰富的积累和较高的学术水平，先后参加或主持30余项国家重点课题，获国家及省部级奖励20多项，发表研究论文300余篇，合作出版专著3部，授权专利20件，培养博士50余名。他是全国先进工作者和甘肃省劳动模范，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4年应邀在著名的（美国）高尔登会议上作“陶瓷材料摩擦化学”大会报告。2002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2009年获中国摩擦学最高成就奖。

2012年2月27日，英国驻华大使Sebastian·Wood（塞巴斯蒂安·伍德）勋爵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代表国际摩擦学理事会将2011年度国际摩擦学领域最高奖“摩擦学金奖”授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薛群基。这是该奖项自1972年设立以来第一次授予中国科学家。



“薛群基院士是40年来世界上最杰出和有影响力的摩擦学家之一。”英国机械工程协会在颁奖词中肯定了薛群基院士在摩擦学领域的杰出成就，并对其创建的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降低成本、能源消耗、摩擦和磨损、提高工业设备的可靠性等方面的突出贡献以及在空间领域应用的出色研究工作给予了积极评价。

“摩擦学金奖”在国际摩擦学界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被看作是摩擦学成就的世界最高奖励，由国际摩擦学理事会遴选，英国机械工程学会负责，每年奖励一位在全球摩擦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该奖项创立于1972年，至今已授予了来自12个国家的39名科学家。

摩擦学这门看似象牙塔之中的学科，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薛群基曾说过：“摩擦学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产品质量、人类健康、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和材料等。其效应是巨大的，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在上世纪就提出，摩擦损失了世界一次性能源的三分之一，润滑材料可减少这种损失，在经济、环保方面对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贡献。”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关于摩擦学的研究较少，薛群基工作的兰州，更是条件简陋：实验室仅100多平方米，只有12个人，科研经费更是短缺。薛院士打趣地说：“兰州这个地方在很多方面比沿海地区落后，但在环境上没那么多诱惑反倒更利于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地潜心于科研。”他带领团队瞄准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需要，牢牢把握这一领域的国际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结合兰州化物所已有的工作基础，确定并实施了三项措施：明确以材料的摩擦化学为主攻方向。2008年中国工程院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年，在8个工业领域由于摩擦磨损造成的损失占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约9500亿人民币。如果有效应用摩擦学研究成果，可节省其中的三分之一。目前，薛院士正带领团队致力于将摩擦学的研究推广到民用领域，如汽车、电器等先进制造业，用新型润滑材料降低汽车摩擦损失，延长家用电器使用寿命。同时，他正在组织应用于海洋环境中的新型润滑和防护材料的研究工作。

薛群基不仅有丰硕的科研成果，更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导师。他先后培养博士毕业生60多名，指导的中青年学者已有30位晋升为研究员或教授，其中有的还担任了大学、研究所或实验室的负责人，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团队。



他常常用这样的观念教育学生，一个人大学、硕士、博士所学的都不足以应付今后几十年来科学技术上的挑战，惟有不断学习，善于捕捉新的知识，才能保持在前沿上；学会学习的方法，学会思考要比写一篇论文还重要；如果有人质疑你的学术观点，一定要吸收问题中合理的部分，这样才可以吸收不同学科的营养；做学问像做人一样要有包容之心。他说：“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有机会也去听硕士生的学术报告。人家可能花了1个月完成的学术报告，而你花了20分钟就听到，是占了很大便宜啊。”

2002年，他将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的20万港元全部捐给兰州化物所设立青年创新奖励基金。他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年轻人进一步发展摩擦学这个领域，同时在成长学习中要善于学习和思考，一定要牢记国家的需求，这个非常要紧。不论是基础研究还是成果转化，说到底都是为了国家的发展，这个追求体现了一个科学家的责任和良心。国家培养了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领域中为国家做出贡献。”

2012年，在“深海极端环境下材料腐蚀科学理论与关键实验技术”香山科学会议第423次学术讨论会上，薛群基指出：加速深海材料腐蚀研究迫在眉睫。海洋材料应该像航空航天、生物材料那样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进行专门研究。而未来海洋材料的研究需配合国家“巩固近海、拓展远海、探索深海”的海洋战略要求，“巩固近海才能维护我们的生存环境，扩展远海才能维护我们的领土完整，探索深海才能惠及我们的子孙后代。”

薛群基更没有忘记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他认为：科普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科普工作是科技工作者的“正务”，在新时期具有重大意义和新特点。科普创作是艰巨的学习过程，应高度重视科普信息化建设。科技工作者应进一步认清事实，承担起科普工作的责任和义务，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积极主动向公众介绍科研最新发现、展示科技创新成果，帮助人们以科学思想观察问题、以科学态度看待问题、以科学方法处理问题，养成健康文明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发挥科普事业主力军的作用。报告旁征博引，分析透彻，实例精辟，内涵丰富，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薛群基院士不忘家乡，多年来一直关心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传播事业，2002年3月受聘为临沂大学特聘教授。



● **朱海涛为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上党课。**3月25日上午，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朱海涛根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学习要求，为市史志办全体党员干部上了一堂题为“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自觉践行党章”的党课。朱海涛从八个方面对党章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和深刻的阐释。朱海涛强调，学习党章是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体党员干部要牢记宗旨意识，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严格遵守党章的各项规定；要立足本职工作，把党章规定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史志工作这份光荣的事业中。

● **全国史志系统首个微信平台开通。**3月下旬，市史志办官方微信“沂蒙史志”正式开通。这是史志信息化建设的创新之举，标志着市史志办在运用新媒体拓展服务渠道、延伸服务手臂，更好地发挥史志“资政、教化”功能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是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措施。据悉，这也是全国史志系统首个官方微信平台。读者可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或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沂蒙史志”加关注即可。

● **市史志办组织干部职工到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基地现场学习。**4月2日，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朱海涛带领干部职工到费县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馆，现场接受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此次现场学习活动，让市史志办干部职工在震撼与感动中接受了心灵的洗礼，也极大地鼓舞了干部职工在史志工作中践行群众路线的干劲。

● **市史志办组织干部职工到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参加悼念革命烈士仪式。**清明节前夕，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朱海涛带领干部职工到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参加悼念革命烈士仪式。

● **市史志办传达学习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4月22日下午，市史志办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传达学习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会上，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传达了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讲话和王伟光院长所作的工作报告。朱海涛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增强做好地方志事业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增强从事史志工作的荣誉感，真抓实干，促进史志事业更加繁荣。

● **市史志办传达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关文件精神。**5月13日上午，市史志办召开全体人员会议，集中传达学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关文件精神。会上重点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确保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的通知》，以及临沂市委有关文件。市史志办党组书记、主任朱海涛作会议总结，要求全办干部职工，进一步深化对教育实践活动有关文件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领会，并将取得的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动力。

● **市史志办到费县检查指导工作。**4月2日，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带领有关人员到费县检查指导史志工作。朱海涛一行现场查看了费县方志馆建设情况，并听取了县志续修、年鉴编纂、旧志整理、地情网站管理、读志用志等工作情况汇报。朱海涛对费县史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13年以来，费县史志办完成了首部《费县年鉴》的出版，校订出版了康熙年间《费县志》，建成了费县方志馆，这些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和推广。

● **《莒南县志》出版发行。**

● **临沭县史志办认真学习贯彻省史志工作文件精神暨分管县长批示。**4月11日，临沭县史志办召开全体人员会议，认真学习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做好乡镇村志编修工作的意见》和省史志办印发的《关于印发全省第二轮修志倒排工作计划表的通知》《关于表彰全省史志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并传达学习了临沭县委副书记于丽华在听取近期史志工作汇报时的批示。批示中指出：“近年来我县史志工作取得较好成绩，感谢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今后按省里的要求，完成好志书的出版发行及村镇史志的编写指导工作。”根据省史志工作文件精神和领导批示精神，临沭县史志办将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完成好年内计划工作。

● **《临沭年鉴（2014）》组稿方案印发。**5月8日，临沭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临沭年鉴（2014）》组稿方案，并下发相关部门和单位，督促其按年鉴体例要求，认真撰写稿件，确保《临沭年鉴（2014）》顺利编纂出版。为确保编纂质量，《临沭年鉴（2014）》组稿方案对篇目设置、行文规范及各供稿单位撰稿分工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以更全面、直观地反映2013年临沭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